

炎黄春秋

第 **5** 期
2006年

田纪云：改革开放的大功臣万里

两位木匠在1969年的遭遇

《海瑞罢官》导演谈《海瑞罢官》

沈元：一代知识分子的伤痛

蒋经国与国民党的转型

目 录

春秋笔

- 1 万里：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功臣……………田纪云

怀人篇

- 8 耀邦与我们共青人……………蒋仲平
13 王稼祥是我的第一位老师……………丁 盛

往事录

- 16 《海瑞罢官》导演谈《海瑞罢官》……………田 耕
25 蒋经国与国民党的民主化转型……………王也扬
28 两位外出木匠在1969年的遭遇……………闻 章

亲历记

- 35 沈元：一代知识分子的伤痛……………刘志琴
39 王洪文、王效禹采访追记……………金 凤
43 我在西路军的经历……………全 璜

人物志

- 46 邓拓逝世四十年祭……………袁 鹰
52 带头上书反对毛、江婚姻的“党内海瑞”
——忆王世英同志……………余宗彦
56 工作着是美丽的——纪念陈学昭百年诞辰……………钟沛璋
60 逆流而行：杨度与君主立宪思想……………傅国涌

一家言

- 66 中国社会名流皈依佛教现象剖析……………吴 江
71 毛泽东总结一生的谈话……………于光远
73 现代中国民主观念误区之我见……………应克复
76 谁也无法垄断历史……………冯东书

他山石

- 77 中央与地方：郡县制和西方政体……………尹振环

本期执行主编 吴 思

顾 问：

杜润生 李 昌 于光远 李 锐
李耀文

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李 庄 李 普
李一鑫 李冰封 李维民 杨天石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岂之
张文彬 张荣华 何 方 范敬宜
金冲及 钟沛璋 袁 鹰 凌 云
龚育之 萧蔚彬 曾彦修 彭 迪
韩 钢 雷 颐 魏久明

社 长 (法人代表)：杜导正

副 社 长：方 实 徐 孔 (常务)

杨继绳 吴 思

执行主编：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赵友慈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胡竞成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白建钢

秘 书 长：徐 孔

副 秘 书 长：杜明明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 (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ISSN1003-1170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电 话：(010)68522852 (办公室)

(010)68534879 (编辑室)

(010)68523512 (编辑室)

(010)68532048 (发行部)

传 真：(010)68532569

印 刷：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 购 处：全国各地邮局 (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龙源期刊网

网 址：www.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 (E-mail) 地址：

Yanhcq@sina.com

出 版 日 期：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定 价：5.80元

万里：改革开放的大功臣

● 田纪云

万里同志是老一代革命家，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如果说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话，那么，他就是高级工程师之一。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特别是为中国改革开放大业做出的卓越贡献，以及他的无私无畏、光明磊落的高尚品格将永载史册。

1981年，我一到国务院就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万里直接领导下工作，直到他1988年离开国务院去人大常委会任委员长。在长期的共同工作特别是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使我对万里同志有了较深刻的了解，也与万里同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农村改革的倡导者和组织者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万里同志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和在四川任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遥相呼应，带头打破“左”的禁锢，勇敢探索农村改革之路，大胆支持农民的改革之举，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让农民重新获得生产自主权，粮食增产，很快吃饱了肚子。

万里同志是山东省东平县人，1936年5月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担任冀鲁豫区党委二、七、八地委书记，区党委委员、秘书长，解放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部长，国家建设部部长，北京市常务副市长，领导和组织了建国10周年北京十大建筑工程建设。

万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惨遭迫害。在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并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他受命于危难之际，任铁道部长，协助邓小平同志出色地抓

了铁路整顿。

粉碎“四人帮”后，万里同志被派到农业大省安徽省任省委第一书记。安徽曾受到极左政策的严重破坏，本来的产粮大省弄得许多农民没饭吃。

万里在安徽经过大量调查，对农村农民的问题有了深刻了解，他说：“197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的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门窗都是泥土坯（做）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没有了？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见1998年4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

粉碎“四人帮”之后，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两个凡是”、“抓纲治国”等错误口号。“两个凡是”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守。”抓什么纲？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这就是说，“大跃

进”、“人民公社”、“学大寨”等等都是毛主席的决策,都不能变。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在60年代初期是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发建设山区、改变山区贫困落后面貌的先进典型,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却把它变成为在农村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左倾错误的政治工具,搞什么“一批二斗三大干”,“以大批促大干”,“七斗八斗不停步,斗一步进十步,步步斗进一路”,影响深远,危害全国。

万里说:“学大寨实际就是推广以大批促大干,取消自留地,不准搞家庭副业,推行‘大概工’,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搞穷过渡。”“所谓普及大寨县,就是不仅要农业学大寨,连工业、财贸、文教、卫生都要学大寨,大寨有什么工业?有什么文化?据说中学生都没有几个,大部分是文盲,怎么值得全国学习?这样学法只能是越大越公越‘先进’。”(出处同上)对农村实际情况的这种深切了解,我想一定是万里之所以成为农村改革闯将的基本原因吧!

当安徽省有些地方暗地搞包产到组的事情汇报到省委后,万里同志立即批示“我看可以试验。”1979年2月初省委又开会专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不少人因为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挨过批判,不敢表态。万里说:农民普遍希望包产到户。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未必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试验,我主张在山南区进行包产到户试验。

山南区的试验很快见到成果,并传到别的地方,滁县地区很快就有17%的生产队包产到户。农民说,大包干就是好,保证一年能吃饱。1979年虽然安徽遇到旱灾,但农民积极性高,粮食还是增产了。当时还在国务院主管农业的陈永贵说万里是“好行小惠”。安徽干部却说:几千万人有了饭吃,还卖余粮给国家,难道这是小惠吗,与国与民都是大实惠。

后来,包产到户在全国引起争论,农民暗里悄悄地搞,基层干部暗地支持,怕说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在这种情况下,万里是第一个站出来为包产到户正名的。1980年1月,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万里说:“包产到户原则上不同于分田单干,虽然形式上与分田单干相似,而生产资料所

有制并没有变,土地所有权仍然是公有的,生产队有权根据情况加以调整。”不久,四川、内蒙、河南、贵州都普遍推行包产到户。因此,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赵)紫阳第二,周惠第三。”1980年4月2日,邓小平同志同万里谈话时,充分肯定了安徽的做法。同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在另一次谈话中又一次称赞安徽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邓小平说,“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由于当时国家农委主要负责人不大赞成农村搞包产到户,中央于1980年3月调万里同志任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万里上任后,首先组织农口各部门大批干部赴各省农村调查,倾听农民意见。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农民和基层干部赞成包产到户。已包产到户的增产明显。

在摸清全国情况的基础上,万里主持召开农委党组扩大会议,分析形势、统一思想。在这次会议上万里批评了左倾残余思想在农村改革上的表现。认为不肃清“左”,农业永远不能翻身。

随后,国家农委起草了一系列文件,总结了很多经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包产到户规范为双层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万里同志在邓小平、胡耀邦等同志的大力支持下,还主持制订了5个“一号文件”,使中国农村改革有序前进,创造出了举世震惊的奇迹——八亿农民平稳地从人民公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谱写新的篇章,农业连年丰收。

万里担任副总理后,仍然主管农业,对全国农村改革把脉定向,对农村工作做出过许多正确的指示。在他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还为全国农村发展制定了许多法规。

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护大包干,围绕农民这一伟大创举的不同声音和争论不绝于耳。特别是当时若干基层干部因失去了昔日大集体、大锅饭时代的权力,对家庭承包经营就是想不通。有的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更多的人则提出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水利工程管理怎么办,大型农业机械怎么办,集体工副业怎么办,农田基本建设怎么办,计划生育怎么办,民兵训练

怎么办,等等。言下之意是“单干不如集体”。

为了实地考察农村改革发生的变化,研究农民在实践中是怎样回答和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的,1982年11月30日至12月28日,在我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分管经济工作的时候,根据万里的指示,我率领由有关部门参加的12人工作组赴山东、河南、四川作了近一



1988年3月25日,万里和邓小平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

个月的农村经济调查,撰写了三篇考察报告。这些调查报告客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农村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反映了广大农民对农村改革的喜悦和期盼,对我任副总理后在领导中国农村工作、坚持和完善农村改革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调查组写的三篇调查报告,万里非常重视,根据他的批示,先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作为内部文件印发,后由《人民日报》连载。这些调查报告,以无可辩驳的大量事实说明:

第一、广大农民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衷心拥护在农村实行的以家庭联产为主的责任制,农村形势一派大好: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连年增产,基本解决了建国三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吃饭、穿衣问题,到处呈现一片兴旺发达景象,新房多,林木多,牲畜多,赶集上会的人多,农村集市贸易空前活跃。所到之处,流传着许多赞美党的政策,赞美现实的顺口溜。例如:“大包干是摇钱树,不出三年都变富。”“过去‘三靠’(即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越靠越穷,现在‘靠三’(即靠三中全会路线),越靠越富。”“过去是:地瓜干当主粮,老母鸡是银行。现在是:粮满囤、油满缸,穿新衣、盖新房,光棍汉子娶新娘,大把票子存银行,日子越过越舒畅。”

第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已扎了根,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完善。家庭承包初期基层干部担心出现的一些问题,有的已经解决,有的正在解决。已经解决的有:水利设施的使用管理;农业机械的使用管理;集体牲畜的分包养用;作物布局的调整;集体债务偿还;烈军属、五保户的照顾;干部报酬;义务工的摊派;农田造林的收益分成等。正在解决的有:地块的调整;各种合同的签订;集体财务的整顿;提留的管理使用;机耕、植保的统包;集体工副业的承包等。

实践证明,广大群众是勇于实践、富于创造的,他们既然选择了大包干等形式的责任制,就一定会想办法完善它,发展它,使之更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

实践也证明,责任制已经不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而是作为一种原则,在种植业以外的各个领域推广。人们说:“责任制是个宝,用到哪里哪里好”,农业包,副业包,社队企业包,商业包,连农村教育也搞包干责任制。一个“包”字,打破了大锅饭、平均主义,大大解放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购买力的提高,提出了改革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作为农村商业主渠道的供销合作体制的必要性,长期实行



1993年6月,田纪云与万里(左)在一起

的由国家“独家经营”的体制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了。报告提出了改革初步思路。

通过这次调查,我们深刻体会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农村改革的必要性及其强劲的生命力。也使我们深刻体会到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物质利益有关”、“物质利益是人们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基本动因”的真正含义。

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党中央并没有下命令,说一定要在哪年哪月全面推开,而是由于各地看到承包以后所显示出来的优越性,很快自发推广的。有的地方想挡也挡不住。结果,实践证明凡是实行了家庭承包的地方,农业生产状况迅速改观,出现了惊人的增长。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在事实面前,绝大多数同志的思想逐渐统一起来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迅速推开,并且在以后的实践中逐步完善,最终形成了现在这种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中国农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项伟大创造。其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使生产力最基本的要素——劳动者获得了第二次解放,而这一解放的实质,又在于使农民获得了对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资料的经营自主权,获得了对自身及其劳动所创造价值(大部分)的自

由支配权。

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之后,有的同志想借社会主义教育之名,否定农村改革的大方向,要让农民重走“一大二公”的合作化道路。万里同志在邓小平同志支持下,与其他同志一道坚决顶住了这股错误思潮。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巡谈话中说:“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稳定。……有了

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已经吃饱了肚子,并日益富裕起来的农民,永远都不会忘记在关键时候挺身而出为他们总结出经验、争得自主权的万里。那时,在中国大地上甚至广为流传“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佳话。当然这不是对几个人的颂扬,而是人民对中共中央正确决策的高声歌唱!

现在,万老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仍然关心着全国的三农事业,不久前还为小岗村大包干展览馆题写了馆名。

80年代,万里是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他与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大思路一致,工作配合默契,在推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也做出了杰出贡献。许多重大改革措施都是由他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并颁布实施的。

积极推进民主法制建设

80年代,万里就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改革的两大主题,要围绕这两个改革的主题推进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和各项工作。

他认为,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是一项根本建设,并在1986年2月的讲话中,深刻阐述了民主

和法制建设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他说：“不讲民主与法制的社会不是文明的社会，也不会是安定的社会。”“非常明显，缺乏民主与法制，往往和愚昧落后连在一起。”“因此，必须把民主与法制看成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根本性的问题之一，要下大决心、花大气力，从根本上去解决。”他强调，民主与法制建设是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由于长期封建社会历史的影响，我们往往只有“人治”经验，而缺乏“法治”的观念。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从根本上增强党内特别是党员干部的民主与法制观念。越是对国家、民族有贡献的人，越应该有高度的民主与法制的观念，自觉地接受群众监督 and 法律的约束。”

1986年7月31日，万里发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这篇讲话不啻于一声惊雷，振聋发聩，在党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强烈反响。他指出，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在我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既有传统价值观方面的障碍，同时也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了我国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我国政治体制上的一个重要弊病，就是领导权力过分集中，决策制度不健全。“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实行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这个讲话最精彩的是指出，为保障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对政策研究、决策研究也要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万里说，“双百”方针不能得到贯彻实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往往把政治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理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的概念带来很大的副作用。事实上，在许多场合下，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是很难分开的。“所以，关键不在于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而在于对政治问题，对决策研究本身，也应该实行‘双百’方针。所有的政治问题、政策问题，都是应该进行研究的，在没有作出决定之前，都是可以讨论、可以争鸣的。”“在领导部门就政策问题作出决定之后，大家都应当执行。”万里把这个问题看作是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重要标志，认为“如果在人民内部政治问题不能争鸣，只能领导人独鸣，又怎能谈得上什么‘高度民主’呢？”

万里接着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广开言路，破除言禁，把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切实付诸实施。堂堂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只要领导路线正确，政通人和，百业兴旺，是不会被几句逆耳之言或别有用心的人借某些问题的煽动搞垮的。”万里还说：“领导人要尊重人们充分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利，不要害怕别人讲不同意见的话，甚至讲反对自己的话。过去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是正确的，但还有点消极。积极的说法应该是：‘言者有功，闻者受益’”。

1988年4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万里当选为委员长。他在这次会议发表的讲话中提出：本届人大必须把保证改革和促进改革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他说：“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支持和保护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新思想、新事物、新制度。要围绕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两个改革的主题，推进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和各项工作。”

在万里委员长主持下，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始终把制定有关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方面的法律作为立法工作的重点，先后制定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海商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产品质量法等对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具有重大影响的法律，并总结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新情况，对土地管理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环境保护法、专利法、商标法等作了修改和完善。还审议了公司法、农业法和科技进步法等法律草案。同时，常委会把制定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放在重要位置，制定了工会法、行政诉讼法、著作权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等一系列法律。还制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也已提请代表大会审议。七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除通过了实行修正案外，共通过59个法律和27个关于法律问题的决定，合计86个。

在监督工作方面，万里委员长提出，一定要把法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同制定法律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每次人大常委会会议都要有一个到两个法律执行情况的检查汇报，把它列入议

程,这要作为一项制度坚持下去。从此,开展执法检查并在每次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听取和审议一到两个执法检查报告,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这是人大监督工作的一个重大发展,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促进依法治国的一项重要措施。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先后对31个法律和6个法律问题决定的执行情况进行了检查,对促进法律的实施起了积极的作用。

万里还非常重视惩治腐败的问题。他说,一是决策是否正确,二是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三是是否为政清廉,四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半心半意。执政党离不开这四条,共产党能不能得到群众拥护,也要看你能不能做好这四条。一定要防止共产党在执政后失去监督,严重脱离群众。为此,就要发挥人大的监督作用,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中国如何做到既不搞多党制,多元化,又能把各阶层、各方面的意见反映到人大和党委来,使我们执政党能接受群众的监督,不搞一言堂,这是个重大问题。他一再讲,一定要加强人大和人大常委会的监督职权,支持监察部门、司法部门的工作,惩治各种腐败行为。1990年,全国人大办公厅根据十三届六中全会决定起草了监督法,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出台。

在党的十四大后,万里最先提出修改宪法,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载入宪法。中央采纳了万里的建议,在1993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对此作了修改。

万里同志关于民主法制建设的思想和实践,证明他是一位无私无畏、具有深邃见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

大公无私,积极培养年轻干部

在这里,我着重讲点个人的亲身体会。

像我这种既无大学或大专文凭又无政治背景、远在边陲当普通财经干部的人,做梦也没有想过会步入中南海,并且当上副总理。但时代的大潮却把我涌入了中南海和副总理的岗位。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正值“文革”结束不久,

一大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革命老干部,在邓小平、胡耀邦领导和推动的平反冤假错案中得到平反昭雪,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他们的交椅尚未坐稳,椅子还没捂热,小平同志又号召干部年轻化。“文革”把他们整了十年,打天下的还没有坐天下,又要让他们让贤。多数老同志高风亮节,从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出发,主动提出退位,让我们这样一些当时还算比较年轻的人十分感动。但也确有少数老同志想不通。他们对新上来的年轻人在冷眼观察,看他们能否顶得下来,有没有治国的本事。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新上来的我们这一批比较年轻的同志,如果没有一些老同志的支持,本事再大也难以开展工作。我在第一任副总理期间,深得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的支持,特别是得到常务副总理万里的具体帮助。

我与万里非亲非故,虽然都是山东人,战争年代我就在他的家乡(东平县)周围活动,但我们并不相识。那时他已是高级干部,我是普通一兵。万里出于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真心响应邓小平关于干部年轻化的号召,积极帮助和支持新上来的比较年轻的人大胆工作。1982年,在我还是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时候,中央决定组建“大经委”,把国务院经济方面的具体事务交给大经委去处理。中央内定,由常务副总理万里兼任大经委主任。万里立即提名我去大经委任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并指定由我和中组部副部长曾志同志负责大经委的组建筹备工作,我的任职,在党内已发了通知。但后来中央又决定,万里不再兼任大经委主任,大经委的职能也相应作了调整。这时,万里又提议并经中央决定,我仍留国务院工作,不去经委了。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我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不久,中央内定要在来年人民代表大会上提请任命我为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要我与一起去天津、河北、湖北等地考察工作,实际也是对我的具体观察、考核。1982年12月,万里又指定我率领有关部门同志去鲁豫川三省调查研究,如何深化农村改革,并回答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万里对工作组写的调查报告十分重视,不少建议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采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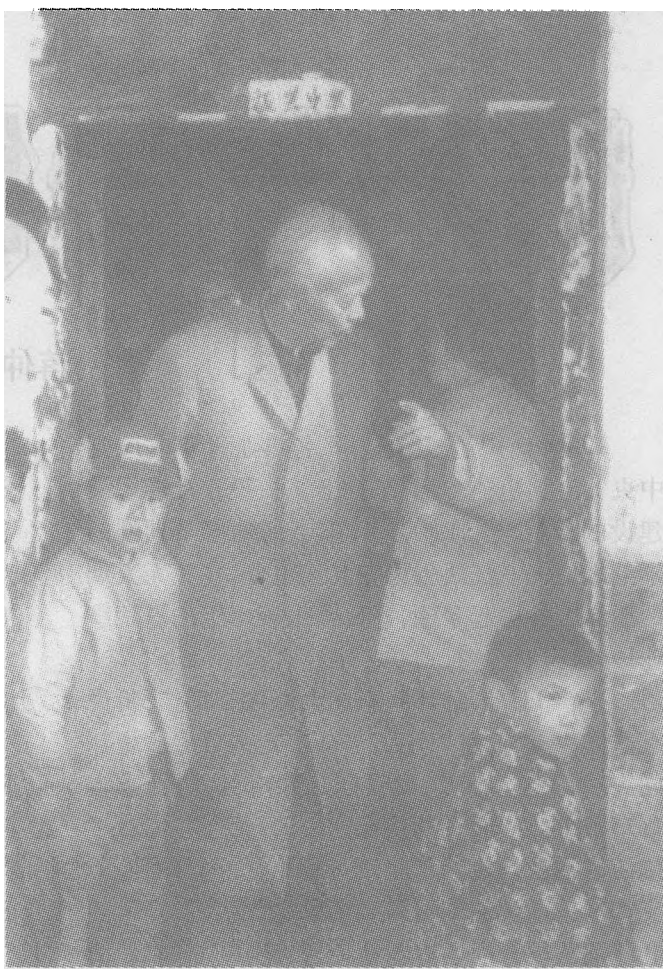
在我担任副总理后,万里更是放手让我工作,并给我加担子,除我分工的财贸金融工作外,他很快明确由他管的农业、劳动工资、民政、物价

等工作也让我负责。1985年,他曾两次对我说,纪云同志,你要大胆工作,有什么事我来承担。又说,我仔细观察,你对一些文件的批示是很得体的,对工作是胜任的。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舞。

1987年5月16日在黑龙江大兴安岭发生了一次开国以来最大的森林火灾。在森林火灾季节到来之前,我曾对林业部作过防火的具体部署,在大兴安岭火灾期间,从救灾到重建,我曾三次亲临现场(最后一次是与万里一起去的),具体指挥部署救灾和重建工作。大火扑灭之后接着就有一个调查起火原因和追究责任的问题,具体讲就是要追究黑龙江省、林业部和国务院分管林业的副总理的责任。6月26日万里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处理对发生火灾负有责任的人员。当有一位列席会议的同志提出应追究国务院有关负责人(当然是指我)的责任时,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有一位姓周的副局长,立即递了个纸条给万里,上写:今年3月纪云同志曾两次打电话给林业部部署森林防火问题。万里同志在会上立即说,国务院对森林防火是作了部署的,救灾也是得力的,国务院是没有责任的。就这样,使我免遭一劫。

1988年6月,万里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当年山东省有人向他写匿名信,诬我插手山东人事安排。万里十分清楚,各省人事安排是由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兼组织部长宋平一手操作,我根本不可能插手,万里当即批示“山东人事安排与纪云同志无关”,又使我免被诬陷。

我想,我与万里的友谊,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对改革开放的共同的信念。特别是在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有人想以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为名,否定农村改革的大方向;想以“反和平演变”为名,否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企图开历史倒车的时候,万里等一批同志挺身而出,坚决顶住了这股逆流。1992年4月,我应邀去中央党校去作过一次报告,主要是讲农业和农村问题,其中重要一部分是讲如何加深理解小平同志南巡谈话,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加快改革



万里在沂蒙老区考察

开放步伐的问题,当时在高层引起不同反响。一天我去看望万里,一见面他就说,你在党校讲话讲得好,抓住了要害,有骨气!给予我极大精神支持。

据我所知,在万里的支持、帮助下成长起来的高层领导干部不乏其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与万里毫无私人关系。

万里的大公无私、光明磊落,胸怀坦荡、勇于负责的品德和精神,对改革开放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巨大贡献,使我终生难忘,这也是使他成为广大群众最崇敬、爱戴的领导人之一的根本原因。

万里对人生是乐观的。1992年下半年,在万里即将卸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前夕,我们一起吃饭,万里哼了几句顺口溜,道出了他晚年的期盼。当时我用毛笔记录下来:退休不发愁,桥牌加网球,一批好朋友,国泰民安久,晚年乐悠悠。

万里同志今年已九十高寿,我衷心祝愿他寿比南山!

(责任编辑 杜晋)

耀邦与我们共青人

● 蒋仲平

1955年10月18日,98名热血青年响应党中央关于到边疆去、到革命老区去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号召,告别大上海,志愿来到鄱阳湖畔的不毛之地——江西省德安县八里乡,在荒无人烟的滩涂野岭搭起茅棚,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垦荒事业。

这年11月,耀邦同志在上海检查工作,听说有这样一支志愿垦荒队,当即决定去看望。耀邦同志一行风尘仆仆,经浙江赶到南昌,再换乘吉普车于11月29日抵达德安。前行无路,当日下午便搭乘铁路轨检车前往九仙岭。

这正是大家创造新生活的第39天。当年的老垦荒队员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耀邦同志衣着简朴,穿着深蓝色中山装,一到垦荒队,不顾路途劳顿,就沿着山间小道登上荒坡,一一察看队员们住的茅草棚。

当天,耀邦同志和大家一起,就着咸萝卜干、黑泥豆,一起喝了顿稀粥。黑泥豆小得筷子夹不住,他索性用手抓着吃,边吃边和队员们聊天。他关切地问:“茅草棚能住得惯吗?”

队员们说:“住得惯。”

一个队员补充说:“茅草棚是我们亲手盖的,我们要永远住下去。”

这时,旁边的一个队员又兴奋地喊了声:“茅草棚万岁!”

耀邦同志笑道:“茅草棚是临时的,不能永久住下去,它只能三岁,不能万岁,将来要盖更好的房子,用上电灯电话。”

喝完粥,耀邦同志问大家有什么要求,垦荒队长说:我们这儿还没名字。耀邦同志沉吟道:“噢,还没名字,那就起个名字吧,叫共青社怎么样?”

队员们都叫好,纷纷要求耀邦同志题写社名。可是,垦荒队有纸有墨却没有毛笔。女队员王宝华从厨房拿来一根筷子,敏捷利索地抄起把菜刀,在筷子一头劈了个口子,夹上一坨药棉,又从被子上扯下一根线缠住刚劈开的裂口。

耀邦同志接过一看,做得还真像毛笔,夸奖说:这笔做得有创造性。说罢,用“笔”饱蘸墨汁,写下了“共青社”三个遒劲的大字。接着,他又应队员们的请求,分别在个人的笔记本上题词签名。队员们至今仍然十分清楚地记得,耀邦同志在39个人的本子上都题了词,但给每个人题词的内容都不相同。

那天,耀邦同志和队员们谈理想,谈未来,越谈兴致越浓。临别时,他亲切地嘱咐大家:“战胜困难,多想办法,一定要把共青社办好!”

深切的关怀、恳切的话语,像一团火温暖着队员们年轻的心,激发起他们勇往直前的斗志,由此谱写出共青人创业的壮丽篇章。

回到北京20多天后,耀邦同志的心还牵挂着共青社的垦荒队员,他用自己的稿费买了篮球、排球、胡琴、喇叭及其他文体用品,寄给垦荒队员。他还多次要求有关方面经常去看望垦荒队员。

创业之路并不平坦。“文革”时期,耀邦同志被“打倒”。有人说共青社是“胡耀邦树的典型”,于是一场接一场的政治风暴也向青年垦荒队袭来,垦荒队一会儿被合并,一会儿又被搬迁,加之受国营农场体制的束缚和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制约,共青社面临极大的困境。人们的热情在折腾中渐渐消退,一批又一批的垦荒人含泪离去,留下无限的依恋和未酬的壮志。但耀邦同志的谆谆教诲却始终扎根于共青人心中,化为无穷

的动力源泉，激励着共青团人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

1969年7月，共青团社实行场社分家，老场部让给了公社，共青团社则搬迁到了南湖分场——现址所在地。好不容易积攒下的一点家底，部分被无偿划拨给了公社，他们只分到了几台旧拖拉机、板鸭生产加工设备及工具。共青团社的牌子都没地方挂，队员们就把它挂在电线杆上。

当时，我在共青团板鸭厂任厂长。我带领团员、青年组成了突击队，驾着自扎的木排和小船，顶风遏浪，奋战数个昼夜，完成了搬迁任务。我们战胜洪水的袭击，重建了板鸭场，当年加工了11万只板鸭，出口香港9万只，盈利9万多元。

背水一战赚得9万元，救活了全场，也引发了大家对前途和命运的思索，我们耳畔又响起了耀邦同志看望垦荒队员时语重心长的话语：“现在中国还很贫穷落后，我们面前还有两条大河，这就是愚昧和贫穷。这两条大河我们还没有闯过去，但我们一定要闯过去！”

是啊，我们苦没少吃，劲没少使，可为什么一直闯不过愚昧和贫穷这两条大河？为什么鸭子经过加工做成板鸭就能增值几倍？只抓单一一种地，不搞农副产品加工、多种经营，这难道不是愚昧？难道不是甘愿受穷？不，我们一定要闯过这两条大河，世上本来就没有路，路是人走出来的！

正当我们刚刚缓过一口气来的时候，1970年春天，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上级又派人来宣布：共青团垦殖场要下马，工资口粮一律不发，职工可以投亲靠友、自谋生路，也可以哪里来哪里去。

真的就这样解散吗？垦荒队员们想起了当年的血书誓言，想起了耀邦同志

来看望慰问时的谆谆嘱托。

我们共青团人开了三天三夜会，一致决定，上面不承认，我们自己承认，耀邦同志树起来的旗帜一定要扛下去！

当时德安县委对共青团人的事业十分重视和支持，派了一批批干部到共青团社加强领导。

我们共青团人牢记耀邦同志的教导，不断发扬垦荒精神，埋头苦干，一面继续垦荒，一面改变单一农业格局，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走农工商发展新路。没有田自己造、没有厂自己办、没有城自己建，在水洼山丘插秧种树，在泥塘湖畔养鸭捕鱼，在荒滩野岭修路建厂。靠板鸭起家、靠羽毛发家。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硬是把鄱阳湖畔当年钉螺为患的不毛之地，发展成一座颇具规模的垦殖业、养殖业和加工业相结合的综合型生产基地和新兴小城。共青团人用智慧和汗水创造了“鸭鸭”牌羽绒服以及板鸭、啤酒和瘦肉型猪等拳头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创汇1200多万美元，人均产值达16000多元，实现了经济全面发展。

这是多么令人振奋的变化呀！

1978年秋天，团的十大召开前夕，团中央王照华、李海峰同志到江西考察并受耀邦同志嘱托



胡耀邦和本文作者（左一）



胡耀邦为共青城题名

专程来共青社看望。当时我任德安县县委副书记兼共青垦殖场党委书记、场长。他们看到共青社经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不但没有垮,而且处处欣欣向荣,新城拔地而起,深受感动。考察结束时,他们动情地说,耀邦同志一直十分关心共青社,请你们立即向耀邦同志写信汇报这里的发展情况。我听后激动不已,敬爱的耀邦同志日理万机,还始终惦记着我们共青人!我立即布置并派两同志专程赴京将报告送至耀邦同志的警卫秘书李汉平手中。耀邦同志看信后非常高兴,称赞说:“共青社不但能够生存下来,而且发展得这么快,真是奇迹,你们真不容易。”并当即接受请求,第二次为共青社题写了场名“共青垦殖场”。题词送到我处,全场振奋,大家奔走相告,欢呼雀跃。

1984年国庆节,经省、市批准,我应邀以共青人的身份赴京参加新中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庆典系列活动,登上了观礼台,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那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啊,我为做一个共青人感到无比的骄傲!

1984年12月12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耀邦同志,来到阔别29年的江西德安,再次看望我们共青人。

那时我已调任南昌市委副书记。接到省委办公厅通知后,我立即赶到共青垦殖场。又一次见到耀邦同志,我紧紧握住他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耀邦同志亲眼目睹共青垦殖场的巨大变化后,感慨万千地对大家说:“今天是12月12日,历史上有过西安事变,张学良是有志者事不成。如今不同了,你们是有志者事竟成。”

在接任共青垦殖场党委书记不久的老垦荒队员于维忠那个

纸张发黄的笔记本上,29年前耀邦同志题写的是“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而今,他又挥笔写下:“有志者事竟成”。

视察结束时,应共青人的要求耀邦同志第三次欣然挥毫,题写了“共青城”三个大字。

耀邦同志联想起第一次到这里的情景,动情的说:“记得1955年我来这里,当时你们生活很苦,我也无力提高你们的工资,只好陪着你们喝稀饭,吃咸菜,吃的还是你们的口粮,心里难受啊!现在你们生产上去了,人均产值这样多,真让人高兴!你们要注意改善职工的生活,工资争取年年都要有所增长。”他鼓励大家:“可以搞自费工资改革!你们搞集体福利,我赞成。但你们的工资差别不大,要拉开档次,把岗位责任制同工资挂钩,这样才能提高大家的积极性。”

沉吟片刻,耀邦同志又说:“几十年来我们的许多干部在指导思想上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想扩大生产,而不关心职工收入的增加,把这两件本应互相促进的事情对立起来了。现在我们要大大提倡干部同工人、农民同呼吸共命运,把这个观念牢固地树立起来,还要把人民生活的改善作为刺激生产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我们国家乃至各个单位才有希望。”

这时，于维忠请求说：“明年是我们青年垦荒30周年，我们准备开个庆祝会，想请总书记来参加。”

耀邦同志幽默地问：“你们30岁就祝寿？”

他接着说：“纪念还是要纪念，不要搞什么庆祝大会，叫回忆联欢会嘛。把分散在各地的老垦荒队员和他们的子女请来，还要请萝北的垦荒队员，请那些去大陈岛、海南岛、新疆、西藏工作的青年代表，请朱伯儒、张海迪，请30多年来的青年英雄人物，请大学生代表。总之，以青年人为主，不要请好多领导人来，不是向我们表功，而是向青年人进行教育，这是很有意义的事。这些青年是下个世纪我们国家的栋梁、骨干。这是真正的智力投资。”

于维忠点点头，说：“总书记，我们想请你在我们场里住一晚，同大家合个影。”

耀邦同志行程很紧，还要去其他地方视察，他说：“这次不住了，下次再说吧。”随即欣然和新老垦荒队员合影留念。

共青人没想到，在共青垦荒30周年纪念日前夕，收到了耀邦同志写给新老建设者的一封信。耀邦同志在信中充满激情地写道——

亲爱的共青垦殖场的同志们：

在你们为了祖国振兴而坚持垦荒整整三十个春秋的时候，我高兴地向你们和你们的亲人们表示热烈、诚挚的祝贺！

三十年前，你们中间的老一代人响应党的号召，高举向困难进军的旗帜，发扬坚韧不拔、艰苦创业的垦荒精神，勇敢地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三十年来，你们在鄱阳湖畔的荒滩野岭上安家落户，生根开花，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创建了生机勃勃、繁荣富裕的共青城。这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青年的一个富有教育意义的创举。

今天，在我们党领导十亿人民进行改变自己

命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仍然需要大力发扬你们这种极可宝贵的垦荒精神。一切有理想、有抱负、有出息的当代中国青年，都应该从你们的奋斗历程中悟出一个不朽的真理：中国青年的光明前途要靠自己用双手去开辟，中国人民的光明前途要靠自己用双手去开辟。让我们继续往开来，再展宏图，一往无前地为共产主义壮丽事业英勇奋斗！

祝共青城的创业者们继续奋发进取，建功立业！

胡耀邦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五日

纪念日那天，共青人按耀邦同志的建议，把庆祝会改为垦荒30周年回忆联欢会，向青年一代进行艰苦奋斗的传统教育。

在共青人的整个创业过程中，虽然耀邦同志没有批给过我们一分钱，但是，他带给我们的精神食粮成为了共青人锐意进取的力量源泉。

1989年4月15日，全国农垦战线十大创汇企业之一的共青城，正在为中国鸭鸭（集团）公司成立祝贺。朝气蓬勃的共青城彩旗如云，横幅如虹，欢声笑语，到处洋溢着节日般的欢乐与喜庆。

当晚，电视里突然传来耀邦同志去世的噩耗，两万多共青人一天的喜悦顿时冻结了。大家简直无法接受这个无情的事实，整个共青城沉浸



李昭与本文作者（左）及钟起煌（时任江西省委副书记）在耀邦墓前

在万分悲痛之中。

当时,我正在中央党校学习,更早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我痛苦万分,眼泪不断地流。敬爱的耀邦同志,您怎么说走就走了呢?我们共青人还眼巴巴盼您再来呢!我立即把共青垦殖场驻北京的负责人找来,请他尽快报告共青垦殖场党委。

值得我们共青人欣慰和自豪的是,经中央批准,耀邦同志亲手创建的共青城成为他长眠之地!

对耀邦同志怀有深厚情感的共青人本打算将自己最好的地方——七墩林作为其墓地,但耀邦同志的家人坚决不违背耀邦同志生前的一贯原则,最终选择的是一座荒山。此地虽是共青垦殖场的最高点,且面向浩瀚的鄱阳湖,但却是一座光秃秃的红土小山包,十分荒凉。耀邦同志的夫人李昭同志及子女反复强调不要大兴土木,但忠诚的共青人不会亏待自己敬仰的领袖,坚持要为耀邦同志建一座墓地,并请专家先后设计了六个方案。而耀邦家人选择了其中最简单的一个,并将小山包命名为富华山,寓意耀邦同志的一生追求——富我中华!

如今,这片昔日的荒丘野滩,已被我们共青

人建设成了一座满目青翠的壮丽林园。

墓地依山面湖,墓碑庄严简朴,山上苍松翠柏,花红草绿;鄱阳湖水清澈如镜,碧波荡漾。顺着富华山坳向东望去,满眼葱郁,绿林如海,一直伸向烟波浩淼的翻阳湖。在那湖光山色里,鹭群晨飞如霞升腾,鹤阵暮归似锦飘落。鄱阳湖对面的茂密树林里,过去极少见到的鹭鸟和从没见过的白鹤、天鹅,成群结队地飞来筑窝结巢,栖息繁衍。夕阳西下,成群的白鹤飞回栖息在浓绿的树枝上,上白下绿,鹭鸣鹤唱,飞鸟洁白高贵的生命,使这片绿林红土生机盎然,充满灵性。这里成为了共青人最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的圣地!

伫立墓碑前,阳光下,墓碑上耀邦同志的浮雕头像熠熠生辉。凝望耀邦同志那慈祥的面容,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共青城是耀邦同志指引共青人创造的,这里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耀邦同志的巨大关怀,共青人对耀邦同志无比敬仰,怀有深深的依恋。耀邦同志永远和我们共青人在一起,耀邦同志的精神像太阳的光芒永远辉映共青城,激励我们迈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作者为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责任编辑 杜 晋)

“八荣八耻”是中国传统美德的承扬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召开学者座谈会

4月14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在北京召开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座谈会。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东方道德研究所等单位的教授、学者在座谈会上说: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反映了中央治国安邦的全新理念。

学者们认为,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八荣八耻”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新世纪的继承和发展。从舜的“孝感天下”,周“礼”八百载,管仲的礼、义、廉、耻,孔子的智、仁、勇,孟子的仁、义、礼、智,董仲舒的仁、义、礼、智、信,宋程朱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到孙中山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现在的“八荣八耻”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新承扬。它作为新世纪中国道德教育和建设之纲,必将载入

史册。

在我国的传统道德中,荣辱观主要体现在对辱的认识上,知耻乃做人之本,是传统美德的核心。有的学者提出,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有许多是非、荣辱、美丑被颠倒,在一部分人中,道德观念淡薄,说假话成风,羞耻之心麻木,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社会主义荣辱观把“荣”与“耻”切实对应起来,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如何贯彻社会主义荣辱观?与会者强调,必须使“八荣八耻”形成长效机制,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社会主义道德观的建设,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效,切忌一阵风,热闹一阵,就风平浪静了。有的学者还对如何有针对性地加强大中小学荣辱观教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王志光)

王稼祥是我的第一位老师

● 丁 盛

我 1913 年出生于江西于都一个农民家庭，家里很穷，从小就没有上过学。1930 年秋，陈毅任军长的红二十二军下面的一支部队，转辗到我们家门口。那时，我才 17 岁。我们村里连我在内有六个小孩，平时一起玩、一起放牛，总觉得我们家里太穷太苦太累，大家合计好，去当兵，脱离这个环境，找个地方有饭吃。在家乡打土豪，我们都是看到了的；红军来了，分地主的浮财，杀猪宰羊，我们也是看到了的。咱们就去当兵，参加红军。

就这样，我们六个人，当红军过来时，就跟着红军走了。当时各家的父母都是不知道的。所以，那个时候当兵，我是想不起来有什么革命思想，就是为了有饭吃，打土豪，杀猪宰羊有肉吃，就行了，就是这样当的兵！是在陈毅的部队，红二十二军一纵队特务连。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参军后，各家的父母都很担心，我的母亲多次到村外的山坡上去望，想我回家。

我们六个当了兵，跟着红军大部队走，愈来愈远，流动游击嘛，也不知道走了多少天。从我们家乡到赣州，现在看来是很小的一件事，不过 100 华里路程。而在那时，转来转去，我们也不知道有多远。因为我们小时候，没有出过门，就在我们村子里，没有出过 20 里地，顶多就是 10 里地，我们家乡到于都县城只有 20 多里地，我们也没有去过。现在随着大部队转啊转啊转，也不知道转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走了有多远，连东南西北也搞不清楚。

一个星期后，行军到赣州附近，打了一下，没有打赢，国民党部队追出来了，追得我们很远。这样一追之后，我们六个人中间有两个人就吓跑



王稼祥 (1906—1974)

了，回家去了；我们四个人没有跑，我们不跑，继续在部队里当兵！

这样越走越远，从我们于都县，走到了信丰，后来由信丰到了上犹、崇义。在这个地区，当时对付红军和游击队的，是国民党的地方武装，保安团这些东西。国民党的正规军是不出动的，他们的部队也顾不过来，因为赣州是个中心区，国民党的正规军就驻在赣州。

从 1931 年 6 月开始，我们在上犹、崇义一

带,呆了大约有三四个月。第三次反“围剿”后,我们这个师(红十一师)在整编中取消了。因为这次反“围剿”中,高兴圩战斗打得很艰苦,部队伤亡很大。这个期间,红军很长时间没有打仗,在驻地住下来,训练上上课,有时也出一下操。第三次反“围剿”,部队没有刺刀,也没有手榴弹,这个时候,部队开始重视这个东西了,训练比较正规一点了。高兴圩没有打下来,原因是国民党军队有刺刀、有手榴弹,而我们没有!人去冲,他不动,你没有办法。

我这时生了病,全身长脓疮,脸上、脚上都是脓,没有任何药,每天自己去池塘里洗,自然痊愈了。

十一师取消了,我们调到红四军政治部,我还是通讯员。这时有个战友、同事叫吴兴,上世纪80年代我在江西干休所见到过他,后来去世了。还有一个战友,现在还健在,就是当过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的王东保,他当时是勤务员,我是通讯员。

1931年底1932年初,江西苏区有很大变化,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到各军去调人。1932年初,我就从四军政治部调到总政治部,我们两个人,还是通讯员。所以我这个通讯员是从1931年起,经过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之后,于1932年调到总政治部。总政治部驻瑞金,主任是王稼祥,我经常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送信。1932年,我当了通讯班长,任职一年。在这之前,我加入了共青团,并转入党。

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是从苏联回来的。一开始,我和王主任联系不多。后来打赣州,机关移动,在移动的路上,每到一个宿营地,就帮助王主任的勤务员搞房子,卸个门板,打扫卫生,因为当时的领导人就只有一个勤务员,没有警卫员,更没有什么警卫排。总政治部只有个通讯排,送信是他,警卫也是他。我从出发到打赣州,打完之后往福建走,一路上又像勤务员又像警卫员,在王稼祥身边就做这么个工作。后来又打了广东的水口,走路行军,回到江西宁都,召开宁都会议。我当时是通讯员,不知道内容,后来周总理给我讲过这些事情。宁都会议后,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来了,当时是1932年的初秋,天气都有

点凉了。总政治部机关跟着战斗部队走,第一次就消灭了敌人两个师,占领了黎川,这是江西比较大的一个县。

有一次,王稼祥主任散步时,我跟着他,他问我:“你是什么地方人?”我说:“我是江西人。”当时部队里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江西人,一部分是湖南人。王主任说:“你还是江西亲老表嘛。小老表嘛。”这以后他就慢慢跟我们说些话。以前他没有和我们说话,我们也不敢和他说话。自从到了黎川后,他就了解我一些了。只要他外出,在我们这个通讯排里,无形之中就是跟着他。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1933年4月下旬,总政治部驻在乐安县的一个村子叫谷岗。有一天,国民党的飞机轰炸总部机关,那时防空没有经验,也不知道往哪里跑,乱跑。这次轰炸,王稼祥负伤,弹片打进腹部,取不出来,以后一直没有取出来。王稼祥负伤之后,要从前方护送到后方,护送到瑞金,由我带了一个班护送。

护送王稼祥到瑞金,除了我这个通讯班外,还做些什么人呢?我记得,还有位医生,这位医生叫陈志方,很有才气,建国后在广州当过副市长,后来又先后当了驻几个国家的大使;还有一名马兵,带一匹骡子;一名管理兵,就这么几个人。回到瑞金后,住的那个村子叫白城子,大地主家,很大的一幢房子。

王稼祥的伤很重,经过治疗,过了一段时间,慢慢地好一些,可以起来了,搬个凳子在门口坐一坐。有一次,他坐在门口把我叫去,同我谈谈,问我:“家里情况怎么样啊?”我说:“我不知道。”“怎么会不知道,你没有写个信回去?不通信?”“没有,我不会写字,写不了信。”“你们还很年轻,很小,要学学文化。”“我们什么也没有啊!”我当时指的是没有纸,也没有笔。王稼祥说:“这个没有关系,你们拿个棍,在地下划嘛,找个识字的人,教你们几个字,你们写,不就学了嘛,我们在苏联的时候,也很困难,吃的是黑面包也要学习。你们还年轻,要学文化。”

所以是王稼祥第一次要我学文化。我们当时也没有什么事,大家就划哟划哟,带一个班划。所以我后来认识几个字,写得不好,现在写几个字像鸡爪子爬的一样,就是这个原因,没有用笔来练啊。后来到延安学文化写字。现在我会写,是在

延安练的。

第二件事,因为王稼祥主任也没有钱,他也很困难。有一次下雨,我们江西那个地方,小水沟、水田特别多,一下雨,那些两个指头大的鲫鱼会从水沟、水田里面跑出来。我们就会抓鱼。雨一停,把小水沟上下一堵,把水搞干净,就可以把鲫鱼抓起来。抓起来以后,我们就搞来吃。我拿到伙房,叫炊事班做,没有油炸,就搞点水煮,煮一碗汤,送给王主任吃。王主任就问我们勤务员:“这个鱼是哪儿来的?”勤务员说:“是班长那里弄来的。”王稼祥就把我找去,问:“小老表,你这个鱼是从哪里弄来的?”我说:“我在小沟里面捉来的。”他问:“你怎么能够捉得到的啊?”我说:“这个很简单,我们当老百姓,这是我们的里手,我们很会抓这种小鲫鱼的,把水一堵,把水搞干净,就把鱼抓起来了。”“噢,是这样来的,你可不能要老百姓的东西,不能抓老百姓的鱼啊,你知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我知道不能拿老百姓的东西。”王稼祥点点头,很高兴。

王主任常常坐在门口,看看田里的稻子、庄稼,和我随便聊聊,因为那时也没有别人。后来很熟了,我觉得他对我还是很器重的。他对我说:“现在前方战斗很激烈,基层班干部伤亡很大,你去读学校。你当了两年多的通讯兵,一年多的班长,也是一个比较老的同志了。你去读学校,学习学习,学点本事。”

去读哪所学校呢?当时在中央苏区有两所步兵学校。一所是在瑞金的彭杨学校,一所是在于都的公略学校。彭杨是彭湃、杨殷;公略是黄公略,红三军军长,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牺牲了。这两所学校都是为了纪念先烈而命名的。

王主任是很关心体贴人的。他说:“你到公略学校去,公略学校在你家乡,你可以回家看一看。看看你的父母,看了以后再去学校报到。”我向他辞行,他再次叮嘱我到家看看,到学校好好学习。

随后我到公略学校学了三个月,学习内容很多,有平时政治工作、战时政治工作等等。毕业后,我回到瑞金,回到总政治部报到:“主任,我回来了。”“回来了很好,休息几天。”几天后,王主任把我叫去:“你学习毕业了,学了些什么东西?”他听了我的汇报后,指示说:“你还是到前

方去,前方需要基层干部。”

我当时没有表示马上去,没有这个态度。他看我有些犹豫,不大想去的样子,实际上我也确实不大想去。我不到前方去,在总政治部当个通讯排长是不成问题的,所以就没有表态。王主任讲:你还年轻,住了一期步兵学校,你虽然过去当过兵,现在到前方去锻炼一下好。我说:“我在这里挺好的。”他说:“没有关系,你去吧。以后有机会你可以回来看看我。”我们已经有了了一定的感情了。讲到这样,我也没有什么话好说的了,好吧,那就去吧。

第二天,他给我一封介绍信。信上怎么写的,我也没敢看,让我到彭德怀的三军团政治部报到。到了三军团政治部,他们看了介绍信后,就让我到第六师一个团的卫生队当指导员。我在这个卫生队当了一年多的指导员,没有到连队去。在卫生队,和步兵连就不一样,伤亡情况也不一样。卫生队嘛,不是在前面真刀真枪的干嘛,主要是接收伤兵。而伤兵主要是敌人飞机轰炸的,敌人的炮弹打的,子弹打的并不多。

就是这样,我没有当过排长,直接当了指导员。我从指导员到团政委也是这样的,中间没有当过教导员。我当指导员不久,红军就开始长征了。

(作者1999年病逝。这是他1997年所作自述历史的一节,题目是原有的。)

(责任编辑 致中)

敬告读者

2005年《炎黄春秋》合订本已装订成册,可汇款邮购。历年合订本价格如下:

2005年精装	75元;	简装	70元
2004年精装	75元;	简装	70元
2003年精装	75元;	简装	70元
2001年精装	75元;		

注:以上均免收邮费

汇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68532048

《海瑞罢官》导演谈《海瑞罢官》

● 田 耕

引 子

《海瑞罢官》是历史学家、北京市前副市长吴晗为马连良新编的历史剧，于1960年8月定稿，1961年初开始公演。由于是历史学家写京剧剧本，所以当时廖沫沙写的评论文章《史与戏》，称赞吴晗“破门而出”，说他破了历史学的本行门户，跑到戏剧行当里面去了。但是，从戏剧创作和演出效果上来看，此剧在当时并未受到戏迷的热烈喝彩，更未引起轰动效应。

1965年2月，江青心怀叵测地跑到上海，与张春桥共同谋划，由姚文元执笔写成长篇评论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于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诬蔑该剧是影射现实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并把对此剧的批判演变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和导火线。这样一来，《海瑞罢官》就成为名扬四海、全球皆知的著名剧目了。

十年浩劫结束后，1979年3月2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作出决定，为吴晗这一冤案平了反。但是，《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饰海瑞的演员马连良，在“文化大革命”中，均已被迫害致死，目前只有导演王雁还健在，然而也已进入风烛残年，只有他一人能说出此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个中的某些情节，是鲜为人知的，若不抢救下来，这段珍贵的史料就有被湮没的可能，于是，我就找王雁详谈了八次，现将访谈记录和笔者看到的有关资料，综合整理披露出来，公诸于世，以飨读者。

马连良恳请吴晗写海瑞

1959年，《人民日报》等报刊一连发表了好几篇宣扬海瑞的文章。其中，有吴晗写的四篇：一、《海瑞骂皇帝》（以刘勉之为笔名，1959年6月16日发表于《人民日报》）；二、《海瑞的故事》（1959年7月1日刊登于《新观察》1959年第十三期）；三、《清官海瑞》（以赵彦为笔名，1959年7月22日发表于《北京日报》）；四、《论海瑞》（1959年9月21日发表于《人民日报》）。

马连良先生在富连成科班学戏时，曾演过一出戏叫《大红袍》，写的也是海瑞的故事。说海瑞一生清正廉明，到他年老故去的时候，身无长物，家中只剩有一件大红袍。马连良既然演过《大红袍》，又看见报刊上连续发表了几篇有关赞扬海瑞的文章，就很感兴趣。

1959年年底，有一次全国政协开会，马连良、吴晗两位政协委员碰到一块，谈起了海瑞。马连良问吴晗：“我在报刊上看到您写的有关海瑞的文章了，报刊上为什么要连续发表宣扬海瑞的文章哪？”吴晗说，“1959年4月，党中央在上海开会，毛主席看了湘剧《生死牌》，剧的结尾出现了海瑞。毛主席查阅了明史海瑞传，对海瑞给嘉靖皇帝上疏，敢于直言不讳的精神，表示欣赏。就在会上称赞海瑞，说海瑞这个人，刚正不阿，敢说真话，不畏权势，值得今人向他学习。所以《人民日报》等报刊，才发表了好几篇赞扬海瑞的文章。”吴晗又说：“根据毛主席在上海这次讲话的

精神,钱俊瑞和胡乔木先后都曾来找过我,说毛主席一再号召大家学习海瑞,你是明史专家,对海瑞很有研究,应当写几篇关于海瑞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经过钱俊瑞和乔木同志的提示,我认为宣扬海瑞,义不容辞。我对海瑞的人品和精神,也非常钦敬,他有很多值得后人学习的地方,所以就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马连良对吴晗说:“我在富连成科班学戏时,曾演出过一出《大红袍》,对海瑞也十分佩服。在民间和戏曲界有一个说法,‘南有海瑞,北有包公。’包公是由黑头扮演的,海瑞是由老生扮演的。我曾唱过《大红袍》,有条件演海瑞,您能不能写一出表现海瑞的新的京戏,由我来演呢?”

吴晗说:“我是学历史的,写文章还比较省劲,因为我对海瑞研究过,对他的事迹,比较了解。但是,叫我写京剧剧本有困难,第一,我对京剧不熟悉,看的很少,不懂京剧;第二,写剧本和写文章不同,我从来没写过剧本。所以叫我写宣扬海瑞的京剧剧本,实在无能为力。”马连良认为吴晗讲的确是实话,就说:“您对海瑞一生的事迹都很熟悉,他的哪一段事迹适于写成剧本,能不能给我们拉一个提纲,我们再找剧团其他的人,协助您一块写成剧本哪?”吴晗表示,拉一个提纲倒还可以。这样,就达成了初步的协议。

这是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与历史学家的一场普通而恳挚的对话。以上的过程,是当年马连良先生对王雁亲口讲的。

很快,吴晗就把他写的有关海瑞故事的提纲给马连良送来了。马连良把提纲拿给北京京剧团的政治协理员魏静生、编导王雁、琴师李慕良看。魏静生对京剧很有研究,在延安曾唱过老生。经他们四人研究后,一致认为吴晗提供的提纲,故事还很完整,适于写成剧本。但是王雁,感到自己对明史缺乏研究,没法根据这个简单的提纲,写成一出戏来。所以,马连良、魏静生、王雁、李慕良四人,就一同到吴晗副市长家中拜访,请吴副市长根据提纲,先提供一个文学脚本,然后,再由王雁改为京剧演出的舞台本。在大家一再地恳请下,吴晗最后勉为其难地答应试一试。

由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吴晗写有关海瑞的文

章和写京剧《海瑞罢官》,都是应人之约才动笔的。十年浩劫结束后,有的文章在记述此事时,说京剧《海瑞罢官》是吴晗自己主动写的,与实际情况不符。现特把马连良当年对王雁的叙述,和王雁介绍自己当时亲身参与此事的经过,披露于世,以正视听。

《海瑞》改名《海瑞罢官》

吴晗给北京京剧团写的有关海瑞故事的提纲是:明朝隆庆三年(1569年)六月,隆庆皇帝任命海瑞为应天(江南)巡抚,海瑞便服走马上任,一路调查研究,关心百姓,路遇乡民喊冤,诉说疾苦,从百姓的控诉中得知,从相位告老还乡在华亭县的老上级徐阶家有两大恶行,一是强占民田,二是他儿子徐瑛横行霸道,欺男霸女。经过深入了解,海瑞想解决此案。但是,徐阶与海瑞有点特殊的关系。京剧有一出戏叫《海瑞上疏》,麒麟童(周信芳先生)曾演过此剧。内容是讲:海瑞



田耕(右)与王雁合影

给嘉靖皇帝上疏,指出皇帝的缺点,嘉靖大怒,认为海瑞胆大包天,竟敢骂皇帝,就想处死海瑞。当时,徐阶在朝为相,就劝皇帝,说海瑞上疏的言辞虽然尖锐,但却是为了国家好。嘉靖的怒气才消了一些,没有杀海瑞,但仍把他关在大牢里,直到嘉靖皇帝驾崩,新即位的隆庆皇帝,才把他释放,官复原职。故此,过去徐阶对海瑞有救命之恩。现在,华亭县的老百姓,状告徐家霸占民田,儿子欺男霸女,草菅人命。海瑞对如何处理此案也感到为难。矛盾尖锐,戏就在这里。海瑞究竟应当如何处理此事?是袒护恩人徐阶家?还是秉公处理,为黎民百姓申冤?据吴晗讲,海瑞对他母亲非常孝顺,海瑞清正廉洁,和他母亲对他的教诲有关。在吴晗提供的提纲中,有一个情节,就是海瑞遇到此难题,就请教他母亲。老太太教育他说:个人恩怨是个人恩怨,百姓疾苦是百姓疾苦,不能把两件事混为一谈。你身为巡抚,理应把百姓疾苦放在前面。不应考虑个人恩怨。这样,就坚定了海瑞为民除害的决心,矛盾就尖锐化了。徐阶见海瑞不买他的账,就责备海瑞忘恩负义。说:过去我救了你,现在我有为难之处,你就一点情面也不讲了,未免太绝情了。海瑞就说:你对我的恩情,我记着哪!但是,百姓的疾苦,我不能不管,更不能因为你对我的恩情,我就徇私舞弊。这样,冲突就激烈了。徐阶虽然不在朝里为相了,但是,当时他的门生故吏掌权的还很多。徐阶就通过他的故旧戴凤翔,给隆庆皇帝上了好几本奏折,诬蔑海瑞

任巡抚后,纵容暴民状告乡官,使得地方不得安宁。隆庆皇帝偏听偏信,认为海瑞纵容暴民欺侮乡官,于是,海瑞上任才半年,就被隆庆皇帝罢了官。

吴晗作为一位历史学家,非常重视历史的真实,他表示,他提供的材料,“无一处无出处,无一字无根据”。他认为历史剧首先是历史,为了不给后人造成错觉,他不赞成在历史剧中掺杂虚构的情节。

但是实践证明,照吴晗的意见办,把戏照历史原样搬到舞台上行不通。原来剧本写的是,海瑞被罢官后,老百姓的冤案,不了了之,海瑞带着老母和家人,灰溜溜地走了。海瑞离任之际,华亭县的老百姓,自动组织沿途护送,依依难舍,怀念海瑞为老百姓做的好事。这要是写成文学故事,读者看后,还可能受感动,但是,作为戏剧,前半段矛盾尖锐,冲突激烈,结尾却不了了之,不能满足观众艺术欣赏上的需求,大家就难以接受。

1960年,《海瑞》在北京市工人俱乐部彩排,请了文艺界、历史界、教育界的许多名人和吴晗的老朋友来看戏,老舍先生也来了。之后,在北京市府大楼召开了一个由部分名流、学者、行家参加的座谈会。大家一方面肯定并鼓励吴晗创作的剧本,另一方面,也提了许多建议。主要的意见有两点:一、剧本前半段矛盾冲突尖锐,但结尾却有点虎头蛇尾。二、吴晗写的剧本原名《海瑞》,有人(植物学家蔡希陶)认为此剧只写了海瑞任



粉碎四人帮后,北京京剧院复排《海瑞罢官》

江南巡抚半年左右的一部分作为,并非写海瑞一生的事迹,所以叫《海瑞》,显得题目大,内容少,不如改名为《海瑞罢官》,更为确切。吴晗对这两点意见都欣然接受。不再坚持“无一处无出处,无一字无根据”的原则了,反问大家怎么改才好。

北京京剧团王雁等人七嘴八舌地建议,在剧本结尾处,增加一个情节,即海瑞在交印之前,先把残害乡民性命的徐阶之子徐瑛斩了,然后,再移交权力。这样,观众才感到出了一口恶气,正义战胜邪恶,戏剧达到高潮,演出效果就大大不一样了。吴晗同意剧名改为《海瑞罢官》,剧尾以斩徐瑛结束。

王雁导演搞了《海瑞罢官》舞台本

王雁对《海瑞罢官》最大的贡献是,把吴晗提供的文学剧本加以京剧化,改写为京剧舞台本。比较重要的建树,有以下三点:

(一)按照戏曲艺术规律的要求,将原来松散的故事结构加以集中,删繁就简,剪去多余的枝蔓,淡化次要的情节,突出主要矛盾,使主线更加清晰,戏剧冲突更为激烈,人物性格更为鲜明。

王雁认为,清代戏曲作家李渔(李笠翁)在编写戏曲剧本时,所提出的原则是很有道理的,即:“始终无二事,贯彻只一人”。李笠翁主张:一出戏,所表现的事件不能过多,只能突出一件事,不要节外生枝;而且要突出主要人物,把一切矛盾冲突,都和主要人物挂起钩来。这样,戏剧性才更强,观众才爱看。

吴晗最早提供的文学剧本中,讲海瑞做了三件事:一是治水救灾,为民造福;二是退田还民,维持百姓生计;三是除暴安良,平反冤案。

关于歌颂海瑞治水救灾的功绩,最初是通过勘察灾情,修筑河渠,欢庆竣工等情节表现的,在庆功一场戏中,舞台上出现了耍狮子、舞龙灯的场面,表面上看着虽然很热闹,但是和京剧的传统表演风格很不协调,另外,全剧也显得枝蔓过多,结构松散,平铺直叙,缺乏戏剧冲突,反而降低了舞台效果。所以王雁就建议把兴修水利的戏彻底删掉,仅在海瑞母亲的道白中,顺便讲了一段,就带过去了。

关于退田还民,原来吴晗最初提供的文学脚本,是作为主线来表现的。用较大篇幅来描写海瑞下令,强迫乡官退还强占百姓的田地,引起乡官的联合反对,被罢官还家。除霸只作为故事穿插,作为退田的陪衬。王雁认为海瑞下令众乡官退田,对立面较广,矛盾分散,建议把这一情节,改为副线,一笔带过。把除霸、平反冤案二者合并,作为主线。

经过几易其稿,最后的故事改为:徐阶的三儿子徐瑛,霸占了洪阿兰家的田地,气死了洪阿兰的丈夫,在清明节,洪阿兰带女儿赵小兰上坟,徐瑛又把赵小兰抢走,之后,徐瑛又勾结知县王朋友,做伪证,在公堂上打死了洪阿兰的公公赵玉山。这样,把霸田、抢女、逼死苦主等矛盾,都集中在海瑞为民除害,为洪阿兰一家人平反冤案上,以此为主线,从头到尾,贯彻始终,戏就显得紧凑了。同时,把海瑞下令让徐阶和众乡官将霸占的大批田地,一律退还农民,改为在道白和唱词中表达,如海瑞在和徐阶的对白中,要求徐阶退出霸占的农田二十万亩;在后来的唱词中,海瑞又激昂地唱道:“江南大害是乡官,强占民田稼穡难,冤狱重重要平反,退田才能使民安。”这样,就突出了除霸、平反冤案的主线,淡化了另外两条副线,使全剧脉络更为清晰,人物更为集中,矛盾冲突更为尖锐,戏剧性更强。实践证明,根据王雁的建议,修改后的剧本,演出效果,提高了一大截。

姚文元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中,用很大篇幅攻击吴晗在《海瑞罢官》中大写退田还民,是歌颂“三自一包”,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唱反调。实际在公演的《海瑞罢官》中,剧本只用了很少的笔墨谈退田,主要矛盾写的是除霸和平反冤案。即使提到“退田”,也是令恶霸退出强占农民的田,与“三自一包”何干?

(二)搞出这出戏的特点,使之有别于其它的海瑞戏,勿重复他人。

海瑞历经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表现海瑞的戏很多,如《大红袍》《海瑞上疏》《海瑞背纤》《生死牌》等等。鉴于上海搞的《海瑞上疏》,讲的是海瑞在嘉靖时期的故事,为了避免雷同,吴晗在构思《海瑞罢官》时,选的是海瑞在隆庆时期的故事,此其一。

其二,别的戏中的海瑞,大部分是表现海瑞的刚正不阿,敢于骂皇帝,敢于抗旨不遵,敢于得罪权贵;或是表现海瑞的廉洁奉公,安于清贫。《海瑞罢官》中的人物关系就和其它海瑞戏不一样。海瑞曾和徐阶同朝为官,当时徐阶是宰相,是海瑞的老上级,对海瑞比较赏识,向皇帝推荐重用他。过去海瑞曾上疏批评过嘉靖皇帝,嘉靖罢了海瑞的官,并要杀海瑞,徐阶曾救过他,是海瑞的救命恩人。两人的关系很不一般。所以,海瑞要惩处徐阶之子徐瑛时,内心是有一番激烈的斗争的。



王雁

其三,《海瑞罢官》在表现海瑞时,不仅刻画他坚持原则的一面,更注意表现了海瑞说理的一面,这样一出戏,和其它的海瑞戏就有所不同,特色比较鲜明。如在“求情”一场戏中,海瑞和徐阶的对话,就很精彩。徐阶向海瑞求情说:“海大人啊,老夫长子次子都已去世,膝下只此一子,还望俯念残年,从宽发落。”海瑞反驳他说:“老太师此言差矣!老太师你有爱子之心,想那老百姓,谁无父母兄弟?谁无夫妇子孙?骨肉之情,谁不悲痛!如今洪阿兰一家,她的丈夫被人逼死,公爹在公堂上惨遭杖毙,幼女被抢,我若循情枉法,上违国朝律令,下何以对得起那些孤儿寡母,屈死的老百姓!”徐阶说:“当年海大人囚在天牢,老夫也曾先在皇面前,婉言解救……”海瑞说:“当年海瑞触怒先皇,确蒙太师解救。但是海瑞上本直谏,忠君爱国,何罪之有?徐瑛欺男霸女,草菅人命,触犯刑章,法在不赦,两件事明明不同,如何能相提并论?”

(三)根据京剧观众欣赏习惯的要求,突破所谓“历史真实”的拘泥,力劝吴晗在写京剧脚本时,要有所虚构,不再受“无一处无根据,无一字无出处”的束缚,对原来文学剧本的情节,要大胆增删。

最大的改动,就是王雁建议吴晗把《海瑞罢

官》的结尾,变为先斩徐瑛和县官王明友,然后再交大印。这样,能大胆跳出史实的约束,就能把戏剧推向高潮,海瑞的性格更加鲜明,形象更为高大,也更易于为观众所接受。

通过这次改动,吴晗对历史剧的看法有很大的变化。如他于1962年6月18日在《戏剧报》(1962年第六期)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原来的标题是《历史剧是艺术,也是历史》,然而后来在收入《学习集》时,就改名为《历史剧是艺术,但是和历史有联系》,在内容上,也做了一些改动。显然,后一个标题,比前者更符合实际,也更

科学。在观点上,也和初写《海瑞罢官》时,有了很大的变化,不再主张写历史剧,要“无一处无根据,无一字无出处”了。而主张:“……历史剧是戏,不全是历史,应该有虚构、夸张、集中,通过艺术手法,达到更高、更美、更动人的境界。”

吴晗提供的文学脚本中,也加入了虚构的情节,如戴凤翔本是在朝中弹劾海瑞、令海瑞被罢官的人,是江南乡官在朝中的代言人。但是,为了便于表现,在戏中就把他安排为宣布罢官圣旨和接替海瑞做江南巡抚的人了。

《海瑞罢官》文学剧本的发表与出版简况

经过王雁的建议,并动手搞了舞台演出本之后,《海瑞罢官》的故事,就定下来了。但是,王雁搞的《海瑞罢官》的舞台脚本,只供北京京剧团排演用,对外并未发表。吴晗写的文学脚本,汲取了舞台演出本的优点,在情节结构上和道白、唱词的京剧化上,均做了许多重大的改动。到1960年11月13日,已改过七稿。于1961年1月4日,先在《北京文艺》上发表。同年8月8日,吴晗于北戴河又亲笔改出了定稿,1961年11月,

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改定本)的单行本。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于1979年3月,北京出版社重新出版了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单行本。1984年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吴晗史学论著选集》,收入了《海瑞罢官》剧本。另外,1988年4月,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吴晗文集》第四卷中,又收入了此剧。

《海瑞罢官》公演后的反应和遭遇

1961年2月,《海瑞罢官》开始正式公演。以后在陆续公演的过程中,剧本还做过若干小的改动。当时,观众看了之后,并没有强烈的反响。特别是京剧戏迷,感到在戏曲艺术上并无太大的突破。但大家一致认为演员的阵容比较硬(由马连良饰海瑞,裘盛戎饰徐阶,李多奎饰海母,周和桐饰戴凤翔,李毓芳饰海瑞妻),观众对他们的表演艺术比较满意。饰主角的马连良先生,尤其受到推崇。观众觉得他成功地塑造了刚直不阿的海瑞形象,表现了海瑞公私分明,不徇私情,不畏权势,秉公执法,为民除害的精神风貌,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然而,历史界、教育界、文艺界等知识分子阶层中的反响却相当热烈,认为吴晗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一位副市长,能写出京剧剧本,是难能可贵的,一致感到新鲜,所以认同廖沫沙的“破门而出”的评论。

江青一再要批《海瑞罢官》

1962年3月上旬,江青提出要看《海瑞罢官》,把戏调到民族文化宫演了两场。江青看了之后,就不准此剧再演了。当时剧团的导演和演员都感到惊异,纷纷向有关领导打探此剧被“枪毙”的原因。但是当时,谁都弄不清楚。过了好长时间,后来慢慢才打听出来,江青诬蔑此剧是借古讽今,影射现实。理由是:一、剧中提出“冤案重重要平反”,是暗指社会主义社会冤案重重,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二、海瑞退田到户,说“退田才能使民安”,是歌颂“三自一包”,鼓吹“包产到户”,反对社会主义合作化。江青指责以上两

点都是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唱反调的,是大毒草。所以,《海瑞罢官》公演了不到十场,就被禁演了。奇怪的是,1960年写成的《海瑞罢官》,竟然是反映1961年的“单干风”、“翻案风”的;而且,批判“单干风”、“翻案风”,明明是1962年的事。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事后才知道,早在1962年,江青就曾找过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遭到拒绝。江青不甘心,在1964年下半年,又找在北京的评论家批判《海瑞罢官》,对方表示不愿接受。于是,在1965年初,江青又跑到上海,与张春桥阴谋策划,伙同姚文元,多次秘密商量,炮制出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经过毛泽东审阅并修改后,于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吴晗说: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在1960年预见到1961年要“刮风”

吴晗看了姚文元的大批判文章之后,感到与事实不符,心中不服,于1965年11月14日说:“姚文元说我的《海瑞罢官》作品产生于1961年‘刮风’的时候,这是错的。我的《论海瑞》发表于1959年9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海瑞罢官》是1960年写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预见到1961年要‘刮风’。”这段话载于《光明日报情况简编》第362期,标题是《吴晗看了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后的反映》。毛泽东看了此材料后,批道:“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但是,对吴晗还是照批不误,而且不断升级。

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和现实情况对不上号,许多历史学家,看到姚文元对吴晗进行莫须有的政治陷害,都很气愤,为吴晗打抱不平,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进行反驳。元史专家翁独健教授说:“姚文最后一段议论提出《海瑞罢官》影射现实,过了头,超过了学术范围,姚文元给吴晗下‘反党反社会主义’结论,这是莫须有的罪,和秦桧陷害岳飞时的理由一样。你姚文元把海瑞的平冤狱、退田同现实模拟,请问你是什么存心?你存心这样套,是不是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北京

大学副校长、历史系主任翦伯赞教授说：“吴晗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难道吴晗要退田？”“思想批评要联系个人历史，要看他是什么样的人，吴晗早在抗日时期就参加了民主革命。”“凡事也有个‘一分为二’，一个同志写文章，难道就没有一点正确的东西？”“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此外，上海《文汇报》收到的批驳或质问姚文元文章的信件，就有三千多封。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费时八个月炮制的黑文，一拳打了个空，怎么办？为了摆脱尴尬局面，毛引用了康生所进的谗言，康生诬蔑《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为1959年9月在庐山会议上被罢了官的彭德怀翻案。

于是，就引出了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对陈伯达、关锋等人的谈话，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指发表于1965年12月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该文不点名地批判了翦伯赞的历史观）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后来又说：我说过吴晗文章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向我讲的，是康生的发明权。“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在多次讲话中，也承认此点。）

在《海瑞罢官》剧本中，罢海瑞的皇帝是隆庆，不是嘉靖

据史书记载，海瑞生于明正德十年（1515年），卒于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一生历经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代皇帝，被罢官降职前后共三次。

海瑞第一次被罢官，是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任浙江淳安县令时。

当时，宰相大奸臣严嵩和他儿子严世蕃的亲信鄢懋卿，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以督察使、钦差大臣的身份，出京总理两浙、两淮、长芦、河东盐政，一路威风十足，地方大小官员，都要跪着迎

送，不仅要送丰厚的贿赂，还要铺张招待，用锦缎做厕所垫子，用银子做便壶。当时监察官、钦差出巡，照例都要张贴告示，说明来意和地方注意事项。告示内少不得要说些“力戒铺张，务从节俭”之类的冠冕堂皇的话。海瑞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给鄢懋卿写信说：“细读您的告示，知道您一向喜欢俭朴，不喜欢逢迎。您说：‘凡饮食供应，都应俭朴，不要过分奢侈，浪费人民钱财。’您又说：‘现在民穷财尽，宽一分，人民就得一分好处，一定要体谅。’您的种种恳切教导，说的很多。我相信您的话是为国为民，是从心里说出来的，决非空话。”义正辞严，话又说得很委婉。鄢懋卿看了气得直哆嗦，又奈何不得海瑞这个名气大的清官，只好批：“照布告办”，严州也不去了。但他恨极海瑞，叫他管下的巡盐御史袁淳想法报复。恰好这时海瑞已得朝命，升任嘉兴通判（知府的副职），他们便找茬说公文上有一个手续不对，结果把海瑞调任江西兴国知县。

海瑞第二次被罢官，是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担任户部云南司主事时。

这次被罢官的原因是海瑞上疏，批评嘉靖迷信道教，妄想长生，挥霍无度，不能纳谏，二十多年不上朝理政，贪官污吏遍地，横征暴敛盛行，百姓穷苦不堪，暴动四起，天下人民都说：“嘉靖、嘉靖，家家都净！”嘉靖看了气得发抖，把奏折扔在地上，叫左右立即把海瑞抓起来，千万别叫他跑了！宦官黄锦在一旁说：“听说海瑞自知活不了，已和妻子诀别，并托人买了棺材，仆人吓得都跑光了，他不会逃。”嘉靖一听海瑞不怕死，反而愣住了，又把奏折从地上拣起来，一边读，一边叹气说：“这人倒比得上比干，只是我还不是纣王啊。”后来，刑部论处海瑞死刑，嘉靖也没批复。过了两个月，嘉靖病逝，隆庆即位，徐阶为海瑞求情，海瑞被释出狱，官复原职。这段故事，被上海京剧院改编为《海瑞上疏》，由周信芳饰海瑞。

海瑞第三次被罢官，是在隆庆三年（1569年）担任右金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时。

隆庆三年六月（公元1569年），海瑞以右金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驻在苏州。此年江南遭到严重水灾，农民缺粮逃亡。江南本是鱼米之乡，但因粮、差负担特重，故而百姓生活十分困苦。加上近二十年大地主占有土地很多，尤其是松江，为

两京十二省之冠。海瑞一上任,告乡官夺产的老百姓就有几万人。海瑞一面救灾,一面治水,所用款项,都是从各方张罗来的,没有给百姓增加负担,兴修了水利,战胜了灾荒,老百姓高兴、感激。但要大地主退田还民,却相当困难。海瑞认为“擒贼要先擒王”,便先从松江下手,让江南最大的乡官徐阶弟兄做榜样,勒令退田。徐阶反抗,通过门生故吏,向隆庆进谗言,结果,海瑞只做了七个月的巡抚,就被隆庆罢了官。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反映海瑞这一段经历的。

由以上情况,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来,吴晗的《海瑞罢官》剧本,明明写的是隆庆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康生却把京剧《海瑞上疏》中,海瑞骂嘉靖皇帝,海瑞被嘉靖罢了官,用“移花接木”的手法,栽在吴晗头上,说《海瑞罢官》是影射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被毛主席罢了官。从以上情况不难看出,康生纯粹是混淆史实,张冠李戴,用莫须有的罪名,陷人以死地,这样,吴晗就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从此就拉开了帷幕。

北京新华书店并未抵制定购和发行批判《海瑞罢官》的小册子

后来(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巴卢库时说过:“文章(指姚文)在发表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

但是,据1965年担任新华书店北京分店业务科长的孙忠铨回忆,事实真相并非如此。当时他是主管全店图书购进工作的,是此事的当事人。他亲口告诉笔者:1965年11月24日,上海新华书店发来征订姚文元评《海瑞罢官》小册子的电报,要求我们请示市委宣传部后,迅速回电,报订数。当时书店的许多同志都感到此事非常蹊跷,认为一本文艺评论书的订数,为何要求我们请示市委宣传部?1965年11月25日,孙忠铨带着电报到市委宣传部去请示,市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夏觉接待了孙,留下了电报。11月26日,夏觉打电话通知孙忠铨:“同意订购。”孙问:“订



吴晗

多少合适?”夏说:“这是您的正常业务,自己决定。”11月27日,北京正准备给上海回电报,恰巧上海来长途电话谈别的事,北京新华书店的同志就顺便告诉上海,订购五千册。并于11月29日,又用电报正式答复了上海。11月30日,小册子就运到北京了。上海是根据北京11月27日的长途电话告诉他们的订数发的货。这次北京答复订数,速度比平时还快。当时主管新华书店的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张治,在他写的回忆录《一桩公案的真相》一文中,所讲的情况,和孙忠铨的说法完全一致。但其它有些记述“文化大革命”史的文章,引用“文革”期间出的《大事记》,说北京未订姚文元的小册子,后来被迫订了书,又不发行。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应当澄清。

批判《海瑞罢官》造成悲惨的后果

《海瑞罢官》被批判了,和此剧有牵连的人士,均难逃厄运。首当其冲的是作者吴晗,虽然姚

文元的文章没有打中要害,康生的谰言是张冠李戴,都与事实不符,但是,他本人仍天天挨斗,后被关进监狱,遭受百般摧残,他的夫人袁震也被送去“劳改”,袁、吴二人于1969年3月18日和10月10日先后悲惨死去,吴晗时年仅60岁。女儿小彦,由于受到过度刺激,精神失常,后也被抓入狱,于1976年9月23日含冤死去。这样,吴晗一家四口死了三口,只有儿子吴彰是幸存者。主演马连良先生受尽批斗与折磨,于1966年12月含冤致死,享年仅66岁。导演王雁,经过十年的批斗,虽然死里逃生,侥幸活下来,但已是伤病累累,苦不堪言。以后又被分配到剧团资料室工作,一直不能从事戏曲的编导业务。甚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彭德怀的冤案均被平反了,王雁的问题还没有及时得到解决。直到1979年下半年,为纪念吴晗逝世十周年,北京京剧院重排《海瑞罢官》时,王雁方才被平反,并以导演的身份复出,荒废了13年的业务,才得以重新拣了起来。《海瑞罢官》的作者、主要演员、导演的遭遇如此,其他沾边的人士,处境也很不妙。就连曾经为这出戏说过几句公道话,或写过评论文章的史学界、教育界、文艺界、评论界、出版界的一大批人士,在“文革”期间,也都在劫难逃,遭到株连,受到程度不同的批斗、折磨、摧残。为吴晗鸣不平的历史学家翦伯赞被迫害致死。想把批判《海瑞罢官》引向学术争论的邓拓,被诬蔑为是“假批判,真保护”,与吴晗同为“三家村”“黑店”人物,逼得邓拓含冤而死。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琪,受《海瑞罢官》冤案株连,也被迫害致死。北京出版社因为出版了吴晗的《海瑞罢官》、邓拓的《燕山夜话》、廖沫沙的《分阴集》,被诬蔑为是“三家村”的黑店,出版社被砸烂,多人被斗争、批判,全社人员被下放劳动。这一震撼全国、惊动世界的大冤案,株连之广,至今回忆起来,都令人感到惊心动魄,刻骨铭心。万幸的是,1979年3月2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已为吴晗的冤案平反昭雪。以后,其他被株连的人,也先后获得平反。这是大得民心的,也可告慰吴晗、马连良及其他冤死者的在天之灵了。

《海瑞罢官》重排复演,反应强烈

第一次重排复演是在北京。1979年上半年《海瑞罢官》被平反,下半年,为纪念吴晗逝世十周年,北京京剧院重排《海瑞罢官》,就把王雁请出来继续担任导演。海瑞由著名老生赵世璞扮演,徐阶由花脸罗长德扮演,海母由老旦王树芳扮演。重排的《海瑞罢官》于1979年重新公演时,比过去要轰动得多。原因之一是,广大观众都知道“文化大革命”是由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但是很多人并未看过这出戏,都非常想看看《海瑞罢官》究竟是怎样一出戏。因此,戏票卖得很快,上座率很高,在北京市工人俱乐部和中和戏院连演了一个多月,盛况始终不衰。

第二次重排复演是在上海和杭州。马连良先生的弟子安云武非常喜欢《海瑞罢官》,曾请教过王雁,问能不能指点指点他,把《海瑞罢官》排练出来。王雁把当年马先生演出的舞台脚本和录音找出来,和安云武反复聆听,并给他说戏,安云武感到获益匪浅。1995年,吴晗先生的义乌同乡——上海万顺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王政安先生鼎力相助,慷慨解囊,斥资十几万,赞助演出。上海市的有关领导,也大力支持。由上海电视台、上海京剧院联合主办了纪念吴晗编剧《海瑞罢官》创演三十五周年活动。由刘复之、汪道涵、陈沂任组委会荣誉顾问,刘复之先生题写剧名。《海瑞罢官》当年的原导演、北京京剧院一级导演王雁先生,亲自赴沪执导,由马连良亲传学生安云武饰海瑞、上海京剧院二团的花脸唐元才饰徐阶、老旦孙文元饰海母、沈漪朗饰海妻。此次复演也获得了极大的轰动。

第三次复演在台湾。1999年6月,北京京剧院纪念建院20周年,应台湾之约,组团赴台湾宝岛献艺,台湾观众点名要看《海瑞罢官》。海瑞一角,仍由著名老生赵世璞扮演,徐阶由花脸刘建元扮演,海母由老旦赵葆秀扮演,青衣阎桂祥饰海妻,小花脸白其麟饰徐瑛,小花脸黄德华也参加了此次的演出。剧团在台北公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海瑞罢官》特受欢迎,其它剧目均演出了一场,《海瑞罢官》则演了两场,听说台湾知名人士辜振甫先生两场都看了,由此可见一斑。

(2006年3月1日)

(责任编辑 吴思)

蒋经国与国民党的民主化转型

• 王也扬

自去年春天胡锦涛总书记与连战主席穿越 60 载历史风雨,实现握手以来,国共两党的交流与对话热络起来。国民党,这个对中国大陆地区民众既熟悉又陌生的话语,又回到了人们中间。所谓既熟悉又陌生,是说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们了解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往事;但现在的大陆民众,却几乎都不大知道国民党去台后的情状。而要叙述国民党在台湾的历史变迁,就不能不讲蒋经国与国民党的民主化转型这个重大历史话题。

—
让我们先交待几则历史背景。

1945 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全岛人民曾热烈欢迎自己的“国军”前来接收。可是不久,国民党独裁、腐败的劣迹便引起民众的反感。1947 年 2 月 27 日傍晚,国民党专卖局缉查员在台北街头查抄私烟摊,一名中年寡妇下跪哀求不要没收她的东西,被蛮横的缉查员打昏在地,旁观的路人很是愤慨,围住施暴者责问,又遭缉查员枪击,当场死亡一人。第二天,数万民众上街示威,要求“惩凶”,后酿成全岛范围的“民变”,国民党当局动用武力血腥镇压,导致一万多人丧生的惨剧,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二二八”事件,它在台湾人民心中埋下了深深的恨。

大陆失败的教训,被蒋介石总结为是集权不够。于是到了台湾,国民党变本加厉地实行一党专政。在“反共戡乱”的旗号下,从 1949 年 5 月 19 日起,台湾开始了长达 38 年的“戒严”,人民的基本民权利被“冻结”。老百姓只要有一句话不慎,就可能以“通共”罪逮捕枪毙,“白色恐怖”笼罩全岛。当局对思想言论的控制更是无以复加。《自

由中国》杂志因宣传民主思想被封,发行人雷震入狱,杂志支持者胡适受到批判;作家柏杨、李敖等也皆因文字获罪而判重刑。

国民党迁台后,从大陆带去了大量的资金和人才,加之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援助、投资,在几十年和平环境里,台湾经济创造了不俗的表现,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但经济发展的“一俊”难遮“百丑”,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台湾社会官商勾结贪污丑闻不断,且愈演愈烈。官员们以权谋私,利用工程承包、土地买卖、融资贷款,拿贿赂、得干股、发横财是公开的秘密。国民党历来党国不分,许多国营企业和物业作为“党产”,其巨额利润归党任意支配,更是成为金权结合的典型。

1972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中美发表上海公报说:“美国认知到台湾海峡两岸全体中国人都声称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此一立场没有异议,它重申它的利益在于台湾问题由中国人自行以和平方法解决。有鉴于此,它重申其最终目标是把全部美军及军事设施撤离台湾。同时,它将在区域紧张局势减低的情况下,逐步减低其驻台部队及军事设施。”这一事态对台湾国民党当局的震动可想而知,中美关系正常化、大陆与台湾走和平统一之路已是大势所趋。

二

1975 年 4 月 5 日,蒋介石病逝,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主席,三年后又当选“总统”,成为台湾地区的最高领导人。蒋经国作风务实,常深入民间,头脑也清醒,他上台后推出所谓“政治革新”,大力反腐倡廉,任用新人,提高行政效率;同时对社会矛盾,采取相对温和的解决

办法,并明确提出以“一步一步来”的渐进方式向民主与法制过渡。这样,台湾社会开始步出专制独裁的“白色恐怖”时代,进入到比较开明的“威权政治”时期。

蒋经国生活朴素,深恶腐败,他要求自己的子女不得经商,规定各行政部门停建办公用房、严禁公款吃请、官员不得出入娱乐场所,并派警察到这些地方去检查。他还亲自过问一批经济犯罪的大案要案处理,惩办了“行政院政务委员”兼“中央银行总裁”徐柏园、“行政院研发委副主任”王正谊、“高雄市长”杨金虎等人的贪污案件,其中王正谊还是蒋家的亲戚,他也毫不留情。然而,国民党的腐败是体制问题,靠“严规”、“严打”难以根治。1985年,全台湾最大的信用合作社——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因官商勾结,非法放贷,造成巨额亏空而倒闭的事件爆发,案件牵连到国民党许多高级官员,导致蒋经国最亲密的助手、国民党秘书长蒋彦士被迫辞职。舆论认为,这是自当年上海“打老虎”失败后,蒋经国反腐败的又一大失败,败是败在制度上。“十信弊案”对蒋经国刺激很大,他终于向党内发出了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治理腐败,那么“党员都会流失”,总有一天“人民会抛弃党”的重话。

利用黑社会和特务统治,来维持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是国民党的老传统。大陆时期,国民党特务暗杀《申报》主编史量才和民主派教授李公朴、闻一多,曾造成社会大哗,民心大失,加速了蒋氏王朝的败亡。来台后长期任职情治系统的蒋经国不会不知这种黑幕的弊端。但恰恰在他主政期间,又发生了国民党特务勾结黑社会暗杀旅美作家江南的事件。1984年10月15日,《蒋经国传》作者江南(即刘宜良)在美国旧金山家中车库被枪杀,美国警方查明刺客是台湾“竹联帮”头目陈启礼等人,他们是按照台“国防部情报局”的指示所为,进一步查下去又牵涉到蒋经国的儿子蒋孝武。此事成为国际间轰动的大丑闻,给当时与美国已无外交关系的台湾当局和蒋经国本人以极大困扰。蒋经国不得不下令严厉查处,结果“情报局长”汪希苓和陈启礼等凶手被判无期徒刑,蒋孝武则被变相放逐到新加坡而退出政坛。此事也使蒋经国进一步感到,如果不加

快“民主化”进程,他推行多年的革新事业及其自身历史形象有毁于一旦的可能。

当时中国大陆所发生的一切: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亿万民众迅速脱贫致富,社会政治迈向民主与法制的轨道,更是给了蒋经国以促进,使他看到了祖国统一“既不是梦想,也不是幻想”,如果有一天台湾能与日益强大的大陆结合,则“中国会有伟大的未来前途”。关键在于如何建立一个可行的政治架构。反思国共争天下半个多世纪,总跳不出兵戎相见,“我吃掉你”或“你吃掉我”的传统路数。现在,一个切实可行的政治架构正在形成之中,这个架构必然是个民主的政治架构。在这个政治架构之下,大陆人民有权选择是要共产党、国民党,还是其他政党来主持政府。(蒋经国语)此时,邓小平透过李光耀,向“我在莫斯科的同学”蒋经国问候的信息已经传到,两岸的敌意在化解,蒋经国告诉身边人,不要再说些什么“共匪”,说共产党就可以了。他对将要执行其政治改革重任的助手李焕说:“我们必须采取主动,踏上统一之路。台湾和大陆终究必须统一。两岸若不统一,台湾恐怕将越来越难独立存在。”

三

蒋经国长期患糖尿病,1985年后其病情恶化很快,眼睛几次手术,看东西已非常困难。腿脚也疼痛难忍,靠吃止疼药才能入眠,不久便因走不了路而卧榻。他自觉来日无多,加紧了欲为之事的步伐。其时台湾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且贫富差距有所缩小;全岛早已普及义务教育,中产阶级人群不断增多,公民社会意识蔚然形成;基层行政领导人和民意代表的选举扩展到了县级,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渐渐成熟。

1985年12月25日,蒋经国在一次会议上离开预先准备的讲稿,公开宣布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一任“总统”,从而结束了他身后的“蒋家王朝”。次年3月,他又主持召开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要以党的革新带动全面革新”,把中央民意代表及机构改革、省市长选举、解除“戒严”、开放民间组党等问题提上议事

日程,这意味着国民党终于准备放弃一党专政,向现代民主政党转型。1987年7月15日,在台湾维持了38年的“戒严令”解除,党禁、报禁等对人民基本民主权利的限制随之取消,台湾地区的政局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触及各方既得利益集团,引来种种反对和阻力。蒋经国用不同的方式加以应付。对党内高层,特别是中常委们的不同意见,主要采取认真讨论、凝聚共识、较长时间沟通的办法。为了安抚一些元老,他甚至拖着病体,坐轮椅上门拜访,耐心求教。“立法院”“国民大会”里的年迈委员和代表,多来自大陆,当年国民党并没有进行过认真的民选,其合法性早就受到质疑,现在对中央民意机构的改革,他们反对最力。蒋经国则指示:好好对待他们,但改革要坚定。蒋经国长期经营军队和情治系统,高级军官及情报首长均为其亲手提拔,这些人中有的对改革虽存疑虑,却不敢公开抗拒,对他仍毕恭毕敬。这样,蒋经国以其强有力的领导权威,推动改革取得突破,并保持了政局的稳定。

“解严”后不久,全台湾就有60多个政治团体申请注册成立政党(其中20个获得审查通过)、200余家新出版物向当局办理登记。由于国民党的长期统治积怨很深,这些新政党和新出版物大都矛头对准当权者,重炮轰击。街头的群众示威活动也此起彼伏,有人甚至当着蒋经国的面打出“老贼下台”的标语,国民党官员们显得张惶失措,蒋经国却似乎不大在意,对抗议者还面带微笑。他告诫党内干部,国民党今后要在台湾争取民众的支持,就必须以民主的方式,展现它比对手更能符合人民的日常需求。他希望党的领导结构能够更开放、活泼,中常委们应该多发言,多讲话。他还呼吁大众“同舟共济,推诚相与,以忠恕致祥和,以理性化偏激,聚合全民的意志和智慧为推进全面革新的动力。”这样,台湾社会虽然比“解严”前不平静了许多,政治冲突时有发生,但政党间基本还是维持了和平相处,人们的行为举止总体上也未出法制的大格。

1987年11月,台湾当局宣布了一个顺应民



蒋经国宣布台湾地区自1987年7月15日零时起解除戒严

心的政策举措,那就是开放岛内居民赴大陆探亲。自国民党退守台湾,海峡两岸便断绝往来,成为咫尺天涯,无数家庭骨肉分离近40年难以团聚,实为民族的一大悲剧。开放探亲没几天,就有数万台湾居民申请前往大陆旅行。官方起初限定的旅行目的为“探亲”,但这个限制很快便被突破,成千上万的台胞(包括台商)涌向了海峡对岸,台北《自立晚报》记者李永得、徐璐也来到北京,发回了在大陆采访的新闻报道。接着,台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大陆冒了出来。中华民族之团圆振兴,终于成为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历史洪流!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午睡中突发胃肠道大出血,经抢救无效病故。中共中央发了唁电,对他的“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后来,台湾局势日益演变。邓小平曾感慨地说,如果蒋经国还健在,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作者附识:本文写作时曾参考新华出版社出版的《蒋经国传》([美]陶涵著、林添贵译)、《国民党下台内幕》(王建民、刘红等著)等文献,引文均系转引。读者如有兴趣,可参阅这些著作。】

(责任编辑 吴 思)

两位外出木匠在 一九六九年的遭遇

● 闻 章

编者按：

此文朴素真切，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就是这么回事。近来听到一些赞美文革的议论，仅就经济政策而言，赞美者恐怕不是木匠之类的劳动者，或者不熟悉情况。设身处地替木匠们想一想，他的文革观该是什么样？

本人在旧货市场淘得一堆“烂纸”，抱回去仔细翻检，竟梳理出几件有头有尾的“投机倒把”案。现在来看这些当时所谓的案件，真令人哭笑不得。现在越是哭笑不得，越能显出当年的荒唐。不信你看这件拉锯案。

事情发生在1969年的下半年，河北平乡县的两位年轻农民，到山西左权境内拉锯解木板。他们的手艺不错，很受当地农民欢迎，由此挣到一些钱；另外他们的人缘也不错，与当地人相处得很和谐，有的甚至成了朋友。他们走了好几个地方，最后在一个叫霍家沟的村子里呆了20多天，在准备回家的时候，在左权县城被工商局查获。下面按照时间顺序将这件事罗列出来，奇事共赏。

一、法规背景

先说下背景。投机倒把本意是指利用非正当手段获取利益的行为，但在后来，投机倒把竟成了做生意的代名词。文革期间，更是左得出奇，甭说做生意，就是自家种的青菜也不准买卖。通过1970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中可见一斑。

《指示》重申：一、除了国营商业、合作商业和有证商贩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从事商业活动。二、集市管理必须加强，一切按照规定不许上市的商品，一律不许上市。三、除了经过当地主管部门许可以外，任何单位一律不准到集市和农村社队自行采购物品；不准以协作为名，以物易物；不准走“后门”。四、一切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地下俱乐部都必须坚决取缔。

再看1969年河北某县革委会发出的《关于加强市场管理严厉打击投机倒把分子的通告》，通告规定：“凡投机倒卖国家统购统销物资、工农业生产资料、倒卖布票、粮票、油票和其它各种票证以及长途贩运，私设地下工厂、商店、从事地下运输，进行黑市交易，私包转包工程，雇工剥削、走私行贿和其它投机倒把活动者，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犯罪行为，要严肃处理；对无证商贩和无证手工业户，必须坚决取缔；弃农经商的，私自外出的，必须立即返回原地，参加集体生产活动；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办的副业及生产服务行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反对变相单干，不准经商；生产大队、生产队统一组织社员外出承包工程所得款全部归队；应征收工商统一税，免征所得税；向队交款记工是一种变相单干，应照章征收工商统一税和所得税。耕畜只准生产队自养自卖、自购自用，外地人来我县买牲畜，必须持县革委会证明，在指定的地区进行采购，不准擅自到农村套购；农村‘四坊’（油坊、粉坊、豆腐坊、弹轧花坊）只准集体经营、只准代

国家集体加工或代社员来料加工,不准买原料卖成品,更不准以副业为由搞商业活动;棉花、油脂、油料一律不准进入集市贸易;社员的自留粮,如果出售,必须卖给国家或通过粮食部门进行交换;一律不准私自买卖和交换土特产品,干鲜水果、木材、蔬菜等一律实行归口收购;工矿企业、机关、团体等单位,一律不准到集市和农村社队乱购物资;城市职工、居民和集体伙食单位,一律不准到农村或黑市套购粮食、油料。”

平乡县的这两位农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拉锯手艺的,真可谓大逆不道,难怪要受到处罚了。

二、外出证明

1969年7月31日和8月4日,这两位农民先后从各自的村里开了证明信。

其一:证明我队张某某、吴某某二人出外搞集体副业拉大锯,二人都是贫农,历史清白,希各地负责同志见信给予工作为盼。平乡县郭桥人民公社小章庄大队革命委员会(公章)

其二:最高指示: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最后一句似是杜撰)。证明信:我大队吴某某(下中农成分)历史清白,现年31岁,外出搞集体副业交款,经大队和小队批准,希各单位见信参加是荷。平乡县郭桥人民公社晁庄大队革命委员会(公章)

笔者的话:这两个人怀揣着村里开的介绍信,背着行李和工具,出门向西,去太行山区谋份生意。那时生活极端贫困,没手艺的人没办法,有手艺的人自然憋不住,想法外出打工。村干部们的态度也是积极的,因为他们能上交一些钱。你看,小章庄的村干部

竟然把他们都写成是“贫农成份”,这有意无意间是在袒护这两名工匠。吴的村里开出的是“下中农”。但据后来左权县外调的结果,吴是中农。这下麻烦了,属于伪造证件。

三、家乡来信

外出的这几个月,家里外面情形如何?我们不敢妄测。左权县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扣留了吴的妻子从家乡写给吴的几封信,通过这几封信可看出个大致:

其一,吴的妻子9月6日来信:

某某同志(看夫妻间的这种称呼,后来人恐怕要喷饭):你好,握手。近来的身体健康吧,工作顺利吧,这些都是我时常之挂念的。

你的来信我收到了,内情尽知。都不必挂念。现在咱全家都很好,秋粮食已经下来了,生活上没有一点困难了,请你放心为盼。

下面把咱村的情况向你介绍一下。自你那回走后,公社里也没有强调叫往回叫,主要原因就是现在备战,这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所以把外出劳力这一项就松下来了,不过(村)革委会在每次开会的时候,都点名叫往回叫。现在小三和振山他们回来了,因为他们都是县里基干团(员),其他别人都没有回来。小队里给要了一次



四川西充县农民在晒场上演唱“样板戏”

款,我说不知你在哪的,等你给邮来在(再)交。不过这是退此(推辞)话罢了,别人如果交款咱就交,别人不交咱也不交。现在的秋粮已分了20斤谷子、30斤玉米棒子,是咱们俩(两)个人的。村里的情况没有什么变化,请放心。

再者,你外面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安心工作,不要挂念家里。家里的一切都很好,四妮子和我做伴,我每天在地里参加劳动,割草,我和咱母亲现在和(伙)吃饭,生活很好。

你来信不是说让我给你准备棉衣和鞋吗?我现在就动手准备,下次给你邮去。希放下心来。另外再来信时把你工作情况详细介绍一下。只要你在外面住食各方面没有困难,我就放心了。你还需要什么东西来信说明。

你一人在外,里外多多保重……别不多谈。

代我向当地革命干群问好。

其二,吴的妻子11月5日来信:

某某同志:你好,工作忙吧?

你的两封来信我都收到了。两次邮来的共50元钱全收到了,希你不必挂念。你信上不是谈到买布的事吗?我可一切都照你的话办到。你说你10月底回来,我很同意。不过我多少参加一点意见:就是你如果是没活干就回来,如果是光为买这点布,我看你就别回来了。原因是咱村里很快就要来宣传队了。你如果回来,看样子一定村里就不让走了。别人都没有回来。我准备把你所要东西买齐以后去你那里一趟,你还要什么东西,请来信,我可以给你一下代(带)去,看你是否有意见。

下面我把咱家的情况向你告知一下:今年秋季咱这里的收成一般,原先生产队把外出的全家口粮全部扣下,每月18元钱。谁交够就叫谁把粮食分走。别人都交了30多元也没让分给。我看咱一定也交不够了,一共交给队里8元钱,我想别人要分我也要分。后来队里听说要来宣传队,考虑扣这些粮食也无法处理,就又全部都分给了。这一切我非常高兴:家里的一切都好,希望你不要挂念。生产队给我要了好几次款,我只说等你回来交齐。现在家里秋季分的东西我都弄好了,光剩下菜了。我有心去看你一趟,希望你来信把走哪里,路过什么车站来信说明为盼。

买东西用很多钱,你如果有钱,邮回来我接

到钱就去。

其三:吴的妻子11月28日来信:

亲爱的某某同志:

你好,代我向当地的革命干群问好。

你的来信我已收到,希不必挂念。你信上所要求东西,我已基本上给你办好了。咱处市场管理很紧,布很不好买。我现在只给你买了三丈白布两接(截)(一块10尺,一块20尺),黑色条荣(绒)和代(带)花的都没有,就有一样兰(蓝)色的,买了七尺。希你收下后暂用,等有了再给你买。白布每尺0.65元,条荣(绒)每尺1.35元,布票每尺0.45元。我听你信上谈到朋友结婚用,我很想多买点,只因条件所限,难以达到目的,希远(原)谅。

下面,我将你给我邮钱的支出向你汇报一下。你两次共邮来50元,买白布用去10元,买条荣(绒)布和锉用去10元,交队里8元,我买了一个条荣(绒)裤子用去8元8角,以前借用别人的还了2元,买大盐腌菜用去了2元,给你做鞋买布用去1元,现在给你邮东西又用1元多,我现在手里只剩下7块多钱了。生产队强调每月交18元,这个规定谁也不能改变,你考虑一下,你这几个月共得往生产(队)交多少钱。你如果能交够你就在外边,如果交不够你就回来,别人都交了80%,咱共交了8元,太没法交代。队长一在(再)给我要款,闹的我实在没有办法。秋季东西队里完全分给了,要是不给人家交款,这也太说不过理去。我在家里实在太节约了,还怕你交不够款。这个问题望你自己考虑。

现在队里全部劳力都在挖河,男的女的都去。今年的菜分得很多,咱两个人共分萝卜500多斤,白菜800多斤,这些菜都是分的哇,都得个人刨个人往家运。今年可把我累急了,我也实在想念你。如果你在家可用我费这样大的力气?现在我也可能挖河去,也可能不去。你还要什么东西来信告知。你那里有棉花没有,如有的话,我可给你邮布,希你在那里做条厚棉裤,咱家的棉花很缺。

今天给你寄去的邮包内有白布三丈,兰(蓝)条荣(绒)7尺,棉鞋一双,袜子一双,锉两支,都收到后速来回音为盼。

笔者的话:那时外出打工是违法行为,虽说

村里给开了证明信,但村里每次开会的时候,还要点名让其返回。这一是形势所迫,二是做样子给人看。胆小的人有可能就回来了,胆大些的,就可以装听不见,在外面冒险。这一点也像拉锯,相互试探着两头抻。

当时全国都在“斗私批修”,可是你看,人们的私心仍旧很重。挣了钱不想交集体,能拖就拖。为什么这么大胆?还是因为利害关系,交的钱与分到的东西不成比例。可是,这位农民的妻子是多么通情达理的女人,一旦把东西分到手,又担心交不够队上的钱了。

信中提到买布一事,干什么呢?远在左权的丈夫,正跟霍家沟等几个村的村干部打得火热,他想买点送人。往下看,一切都明白了。

四、审讯记录

1969年12月20日,这天对平乡县这两位农民来说,是黑道日。正当他们坐着当地村干部到县城开会的车,欲返回河北时,被左权县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扣住。扣住之后,20日审了一次,21日再审。请看审讯记录:

20日,单独审讯吴。

问:你们两个谁是主管?什么时间出来的?

答:张是主管,今年阴历六月出来的。

问:你来时带的什么东西?你的布票是哪里来的?

答:什么也没带。布票是从我家寄来的布,给了春元后,春元给的布票。

问:写回信后家中邮来什么东西?

答:家中邮来土布三丈,蓝条绒七尺。

问:布给了谁?

答:七尺条绒给了岂春元(岂春元和以下一些人的名字,都是当地的村民或村干部),土布岂春元一丈,刘先明一丈,张联明一丈。

问:给你些什么东

西?

答:联明给5斤粮票,刘先明给了11斤粮票,岂春元给了三捆麻,刘先明给了二捆麻、一条毛巾。岂春元给了两双袜,刘先明给了一双袜。

问:为什么你给他们土布不要钱?

答:我去拉板,他(们)对我都不错。

问:你的语录本是谁给的?

答:一本是岂春元给的,一本是霍正云给的。

问:你给正云什么东西?和她什么关系?

答:我什么也没给她,和她见过面。

问:挣了多少钱?你分了多少?怎么分?

答:不知道多少,每天一元多,我们俩对半分。

问:你拿了多少?各邮回多少?他拿多少?

答:我拿的115元,邮回50元;他邮回40元。

问:你给了其他人多少钱?还给其他人什么东西?

答:谁也没给他们钱,没有给什么东西。

问:刘先明还给了你什么东西?你还给了刘先明什么东西?

答:没有什么东西。

问:谁给你的山鸡?

答:岂春元给的。

问:你出来带多少粮票?

答:带12斤。

问:你买粮来没有?

答:没有买粮,到什么地方都管吃。



人民公社集体劳动场面。田间里挂着毛主席语录以鼓舞干劲

21日再审,这次审的是两个人,问的人也变了。

问:你二人是什么时候来左权的?来左权干什么?在哪些地方?

答:是七月初来的,来左权拉板,在殿上、王家庄、师岩、霍家沟。

问:你出来有证明没有?

答:没有证明(指的是县里的证明,没县一级的证明就算违法)。大队叫出来的。

问:你们拉板是怎么拉的?

答:有是包工的,有是日工的。

问:包工怎么样?日工怎么样?

答:包工每一尺是3毛,日工是每工一块五毛。

问:你们带粮食没有?

答:没有,在哪里拉,在哪里吃饭。

问:你们二人一共挣多少钱?

答:一共是四百元钱。

问:你们来左权带什么东西?

答:有锯,一个平锯,还有行李。

问:你们来左权干过什么?

答:什么也没有干过,来左权这是头一次。

问:你们给干部送过什么东西?

答:给了魏家庄张联明土布三丈。是我自己的(吴)。还给霍家沟岂春元。先明一丈,春元一丈。

问:这些干部是什么职务?

答:张联明是师岩革委会主任,岂春元是霍家沟革委会主任。

问:你为什么要给他们布?

答:有几天下雪,我们没有活,在他们家吃过饭。

问:这些干部给过你什么东西?

答:联明给过我五斤粮票,春元和先明给我麻一斤。在师岩,春元、霍正云各给我语录一本。春元还给我一丈山西布票。

问:你还给过他们什么?

答:还给春元七尺青灯芯绒。

问:在魏家庄放的什么?

答:一个锯,一个铧。

问:还有什么?

答:没有了。

笔者的话:都交待了。谁敢不交待?不仅仅是两位农民老实,那时的政治形势实在是太厉害了,再说他们自己也知道投机倒把是什么罪过。别说你搞了什么,就是不搞,有手艺本身好像就与资本主义有了勾连。不过,纵然是都交待了,有什么呢?不就是干了点苦累活,挣了点血汗钱,再就是与当地村干部相互交换了点东西,以物易物,如果说给干部的多点儿,那也情有可原,因为这两位农民是外地来客,孤单无依,政治上需要庇护,精神上需要温暖啊。不过,拔出萝卜带出泥,这一交待,与两位工匠有了瓜葛的人就有了麻烦。他们都被“县打办”请到了县里,且还要办学习班,作检查。

五、个人检查

12月21日刘先明的检查。

检 查

关于我和这个巨(锯)匠的问题向领导检查一下。关于这个巨(锯)匠在我村住了26天,在这26天当中,我和他熟习(悉),在这当中他要和我成朋友,我也没考虑到他是什么人,我很麻疲(痹),所以就和他成了朋友。在这成朋友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丈白土布,我还给了他一块手巾,一双袜(袜),我父亲给了他二支麻。在那时候我只是想到五湖四海,但没考虑到他是什么人,这应该受到领导的批评。

另外在19号我坐车要来县里开会,在这时候,他也坐车回河北,我和他就坐在一个车上。来到城里下了车,我们和他就到了招待所。在晚上他就和我们住在一起,到了20号早上,他叫我送他到车站,我就借了个车去送他。到了东饭店,他给了我钱和粮票给他买饼。我给他买饼,他往车站走。没有到了车站,就被领导同志拦住。结果领导把我和他叫回去。我是个民兵连长、革命委员会委员,又是团员,做的这个事真是危险啦。这应该受到领导的批评。这个批评是对我以后工作的巨大帮助,使我以后再不犯这个错误。

以后我不但不犯这个错误,如果发现这种人,我一定向领导报告。我以后一定要提高警惕,再不能麻疲(痹)大意,发现坏人破坏捣乱立级

(即)报告。

这样的认识好像不够深刻,因此在22日这位民兵连长又检查了一次。这个检查大体内容是一样的,为了深刻,他在最后这样写道:

……没到车站就被领导拦住。现在正在备战期间,阶级敌人称(乘)机钻空,破坏集体材(财)产,投机倒把是称(乘)机钻空,在这时候我不但不制止,反而还和他搞关系,所以我犯了这么大的错误,真是对不起党对我的关怀。

以后我一定不犯这个错误,反而发现这种情况一定向领导报告,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加强战备,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一定做到五保卫,为战备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而奋斗。

12月25日,小学教师霍正云(女)的检查。

最高指示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自己有了错误,要做自我批评。

检查书

由于自己平时学习(毛)主席著作不够,政治思想觉悟不高,识别是非能力差,所以于本月16日将我在县学毛著积极分子会议上赠给我的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本)送给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这个人据说是河北的,是个锯匠,大队用来给拉板的。当天晚上,这个人到了学校,发现我桌子上放着这本最高指示,他说:老师,你送我一本高级语录本吧。我说:毛主席语录还有什么高级不高级的。他说:你这本语录就顶高级的,就把他(它)送给我吧。他连说带拿,就把这本最高指示拿上了。当时我有些犹豫,觉得不答应吧显得我有点小气,况且我还有好几本,于是就答应了。他拿去语录本大约一个小时后,便叫一个木匠给我



大寨大队的政治夜校

送来一块毛巾。当时我不要,他便糊里糊涂给放下了。到17日我便请假回家准备结婚了,一直到本月23日,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叫我时,我才恍然大悟,如同梦中一惊,感到我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并且盖着县革命委员会的印,送给了一个不明身份的人,是多么危险啊。对于这样的投机倒把分子,不但没有协助政府给予打击,反而把这样宝贵的东西送给他,岂不是助长了这样的坏人吗?这个坏人拿到这本最高指示及革命委员会的印,一定作为政治资本或合法手术(续),进行投机倒把破坏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后果不砍(堪)设想。

通过这件事情,对我的教育极大。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这样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情况下,阶级敌人是用尽各种手法进行破坏的,并妄想尽各种办法,捞到一点政治资本作为他的护身佛(符),进行破坏活动。可是我的政治觉悟却是这样的糊涂,紧(警)惕性这样的不高,受了坏人的骗。如果不是政府对我的教育,说不定以后会犯多大的错误,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多大的不幸。

我今后一定要更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擦亮自己的眼睛,提高紧(警)惕,随时打击一切坏分子,卫(维)护国家和人民

的一切利益，在阶级斗争中很好地锻炼自己，改造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强战士。

我所犯的错误极大，请求上级给我予应得的处分。

笔者的话：不要笑，不要以为这位老师故意用大话在调侃。不是的。对于一个年轻女孩子来说，她肯定是被吓坏了。她只有把检查写得深刻再深刻，才有可能免她一难。因此她是极其严肃地来检查自己内心深处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她真的悔不当初。当时她送给木工语录本的时候，可能没多想什么，她并没把他当成阶级敌人对待。一个外地民工而已。且又是那么执着，真心喜欢一本精致的毛主席语录，这不但没错，还有几分可爱。况且自己有好几本，送他一本也未尝不可。并且他是个多么通情达理的人，马上送来一块毛巾作为回报。做了这件事，不用说心情是愉快的。双方都是愉快的。没想到，县上把这个外地民工抓了，这个民工是坏人，坏人即阶级敌人，阶级敌人即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即你死我活。她是人民的教师，怎么能够包庇坏人呢？因此她把自己说成是“我犯的错误极大”，是紧缩着心说的，肯定害怕极了，只有老老实实交待，才有可能“坦白从宽”。

六、往来公函

这真的是一件大事，把人扣住之后，一方面有关人写检查，办学习班，同时，左权县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给河北平乡县市场管理部门写信调查这个吴某人到底是什么人。12月25日，平乡县财政革命委员会税务市场办回函：

最高指示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山西左权县打办室：

所查扣我县晁庄吴某某，170元，经了解，是私自外出，中农成分，没有其它问题。我们意见，除照章征税外，余款归本大队取回归集体，当否，希酌情处理。（公章）

12月29日，左权县打办室给平乡县市管会写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最高指示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河北省平乡县市管会：

贵处来函收到，内情尽知。

关于你处郭桥公社晁庄大队吴某某归结你处城关公社东庄大队张某某二人在我处作案一事，据你处了解该是私自外出，中农成分，但本人持有该大队证明，是下中农成分，这证明该是隐瞒成分伪造证件（伪造二支证明，其中一支是私改的）该人不仅违犯国议字19文件第二条一款，从事无证手工业，并且还破坏国家棉布统购统销政策，携带白土布、条绒等物资拉拢、腐蚀干部。并抢劫该所在地小学教员（女）县革委召开学毛著会议赠给的毛主席语录，该人存心不良，妄图利用此语录本上的县革委公章，再伪造证件，搞投机倒把活动。我处根据党的政策，以为情节严重，所以特将扣留现金没收150元，给予批评教育。妥否？请考虑为盼。

笔者的话：你看，本是做活，做木工活，在这里已经成作案。与当地人的物物相换，也已经成了拉拢腐蚀干部的罪恶行径。跟老师要了一本毛主席语录，竟然成了抢劫，不仅抢劫，而且还推理为他要利用语录上的公章伪造假证件，好搞投机倒把活动。因此，他的钱就该扣留没收。这便是当时的逻辑，可笑吗？可笑，却又是这么一本正经。

七、处理结果

12月29日，开具吴的市场违章案件处理卡片。罪名：无证手工业，走私行贿，伪造证件，认识不好。处理结果：对该批评教育，没收非法现金150元。

12月31日，开具张的市场违章案件处理卡片。罪名：非法流窜，伪造证件，认识一般。处理结果：对该批评教育，没收非法款100元。

笔者的话：这两个农民，在外做工近5个月时间，辛辛苦苦，战战兢兢，梦想着挣一点钱来维持生活。谁想到，最后的结局竟是这样：钱被扣了，交生产队的没了，这就意味着挣不到工分，没有工分，年底结算时又得亏很多。想挣钱，却拉下一大堆饥荒，来年的日子更不知怎么过。思及此，不由心内一酸。（责任编辑 吴 思）

沈元：一代知识分子的伤痛

● 刘志琴

看到刘再复先生的《一个年青学者之死》，久久不能平静，那是深藏在我心中的一个结，这个结我不想轻易打开，因为关在闸门后面的是汹涌的心潮。

沈元，这使近代史所大喜大悲的年青学者已经离世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足有两代人之遥，现在所里的人大多不知道他，认识的人也极少谈到他，有谁知道这被遗忘三十年的人，曾经在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中掀起一阵阵风潮。

我与沈元并非同事，也与他没有交往，但我比他的同事更早地接触到他的问题。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处工作，协助领导处理学术事务。沈元是他的姑母推荐给学部负责人刘导生的，刘导生主管近代史所，就把沈元推荐到黎澍的门下。按那时的人事常规，一个从北京大学历史系三年级被开除的右派学生，即使摘了帽子，也不可能调进最高学府，有幸的是，刘导生和黎澍都是有胆识而爱惜人才的领导，那时又正值三年困难的调整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相对宽松，沈元才得以走进近代史所的大门。

风波起自1963年第3期《历史研究》发表沈元的《〈急就篇〉研究》一文，这是一篇对汉代儿童启蒙读物《急就篇》进行社会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文章展现了作者对史学、文字学和音韵学的深厚功底和新颖的视角，这在言必称阶级斗争的当时的学术界中是一缕春风，使人耳目一新；该文从经济生活来分析社会思想，也颇具历史唯物主义的特色。无论从国学或马克思主义史学来考察都是一篇佳作，尤其是一些老学者对该文倍加称赞，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的老师周予同先生，他一说起沈元就眉飞色舞，兴奋不已；郭沫

若甚至赞叹说：“这样的文章我也写不出”；在年轻学者和大学生中也有议论，议论最多的是沈元成了右派才有时间读书，写文章，尽管这是人们的妄加揣测，更不了解右派的辛酸，却把当右派看成可以赢得时间读书的机会，而对自己疲于政治运动，没有时间读书的经历非常感慨，甚至为此愤愤不平。

在大学或研究所没有时间读书！现在看似是不可思议的事，却是当时一代人的由衷之言，试看从1956年入学，1957年就投入整风和反右派运动，如火如荼；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不间断地下乡下厂劳动，热火朝天；1959年的交心运动，拔白旗，反右倾，接踵而来，人人如坐针毡。我所在的复旦大学历史系连毕业论文也甬做了，就草草毕了业。五年制的大学真正埋头读书的时间又能有几何？研究所也不例外，虽说它以著书为本职工作，可都是集体撰写，个人若背着集体私下写作，称为“地下工厂”，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批判，更甬说有独立思考了。几十万字的一本书，十多人参与，相互扯皮，多年不能定稿，成为马拉松。有一年近代史所上报一年的成果统计，全所上百名研究人员却只发表两三篇了无影响的文章。为此哲学社会科学部曾经进行“近代史所为什么出成果少”的调查。在这种情况下出了个沈元，怎能不引人注目！

沈元来研究所不久，1963年第1期《历史研究》又发表他《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长篇文章，同年2月12日《人民日报》用一整版刊载他《论洪秀全》一文，建国后《人民日报》从未以这样大的版面刊载学术文章，沈元得此优遇，再次博得满堂喝彩，一时间从南到北的学者，人人争说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说。这“沈

元道路”的说法,据说是来自北京大学,其时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报刊这样发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扬白专道路,对抗党的教育方针,这对担任党团工作的学生干部是严重打击。可这“沈元道路”的说法一传开,反响强烈,复旦大学的周予同在课堂上声称“我举双手赞成沈元道路”,先生的本意无非是强调学生要有时间读书,别无深文大义。可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引起舆论大哗。沈元问题有人控告,有人赞叹,沸沸扬扬,这一下引起主管宣传部门的注意,为此也要有个说法,周扬亲自发话要学部就此问题进行调查,就这样我参与了这项工作。

被调查的对象是近代史所的老中青研究人员,凡被调查的对象对沈元的为人和治学都有所称道。黎澍喜滋滋地说:“近代史研究要有十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观。”对一个小辈作出如此高度的评价,实在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此人又曾是右派分子,此言一出所引起的震撼可想而知。调查结果认为,对沈元的使用完全符合党的政策,本人努力改造,积极工作,在街道监督劳动期间表现良好,来所前已摘掉右派帽子,那就不应该以右派论处,文章的检查也没有发现政治错误。其实这一调查仅限于沈元个人,而对社会反响最激烈、最尖锐的“沈元道路”避而不谈,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保护沈元,息事宁人的唯一办法,这也是从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到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处的默契,作为参与调查工作的成员,也乐于保护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其时沈元又写成《马克思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一文,但已不用本名而用“张玉楼”的笔名在《历史研究》发表,《人民日报》并加以全文转载。改用笔名也是有关领导在调查后的建议,可这一举措并未完全平息风波,有些人在得知沈元还用笔名发文后,又再次告状,甚至告到毛主席那里,不依不饶,一直到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再也不让沈元发表文章为止。

其实,以笔名发表的这篇文章,仍是响应党的号召的奉命之作,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完全符合主旋律的,告状的信也绕开文章的本身,直指他脱帽右派的身份。按当时的政策,“右派”这顶帽子,是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特殊称谓,摘掉右派帽子,是矛盾性质转化的标志,这

就意味着从敌我阵营,回归到人民队伍,理应享受人民的待遇,再也不应受到歧视。然而这在当时被誉为毛泽东思想一大创造的政策,并非如实奉行,在极左思想的引领下,对这批人依然是冷眼相对,若有对此心存疑虑的,一句话,脱帽右派还是右派,就驳得你哑口无言,更何况帽子还在别人手中,随时可以再抛过来。所以一旦当了右派,脱帽不脱帽,都是档案中永远抹不去的“污点”,背负终身,政治运动一来,又会陷入千人踩、万人踏的境地。从这里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对摘帽右派紧抓不放,为什么顾准直至临终也要拒绝脱帽。问题是,沈元被追堵时并非是运动时期,他是一个出身书香门第,腼腆少语,循规蹈矩的书生,从来没有得罪任何人,也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只默默地做一份应职的工作。一些知识分子也与他无仇无怨,又何以这样咄咄逼人,置人于绝路?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份尚属圆满的报告是由范楚玉执笔起草,文革前她已调离。当“文革”风暴来临之际,我担心这份报告会给一些人带来灾难,就私自销毁了,尔后在“文革”翻江倒海的查抄中,再也没有了它的踪影,但这记忆却永远埋在我的心中。

事实上“沈元道路”,也就是当右派才有时间读书的道路,是无法作出结论的伪问题。沈元骄人的成绩,是他的才华和努力的 result,作为右派成为另类,有可能被某些政治运动排除在外,省下参加政治运动的时间,但代之而起的是惩罚性的劳动和精神折磨,同样要耗去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所以“沈元道路”,并非是赢得读书时间的出路,实际上这是知识分子对政治运动厌倦不满而又无奈的臆想,长年被剥夺研究时间的抑郁,无法作出研究成果而又无处诉说的痛楚,都借助“沈元道路”的发挥,一吐为快,这是知识分子被扭曲的心态,强加给沈元的声名,谁又知道这在文革中加重了沈元多少灾难?!

文革到了,为沈元问题多少人遭受折磨!周予同被打得跪在地上认罪,刘导生、黎澍不知挨了多少批斗,沈元可想而知。

文革结束后我调到近代史所,那时沈元已按投靠苏修的罪名处死有年了,到所后我从人事处处长陈恕那里得知,沈元之所以逃往苏联大使馆,实在是被逼无奈,文革中他已经结婚,寄居在

亲戚家,红卫兵运动一来,将他们一家扫地出门,迫使他们到处躲藏,走到哪里红卫兵就追到哪里,所里也根本不可能接纳他,沈元与他妻子连栖身之地也找不到。他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姐姐早已自顾不暇,又哪能再接受一个“反革命”?现在的年青人可能很难理解,那种被亲朋故旧抛弃的痛苦,那呼天天不灵,呼地地不应绝望,蝼蚁尚且要惜生,更何况是一个有灵性的年青生命!1956年在他还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名学生时,凭着他的聪慧和好奇心,翻译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岂知就是这样一个幼稚、鲁莽的举动,触犯天条,遭受灭顶之灾。反苏本是划右派的重要根据,他竟然在火中取栗,不是极右分子是什么?为此被开除、劳教,流落社会。当初对苏联奉为老大哥,人人都要一边倒,稍有异议的就以右派惩处。殊不知到60年代就已乾坤颠倒,老大哥成为罪大恶极的修正主义,人人都要斥而诛之。又怎能为了了一己的生路,潜逃到苏联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当初为伊沦落到地狱,今朝又梦想伊能救他于水火,殊不知愚蠢的他,又一次犯了幼稚、鲁莽的错误。他用鞋油涂黑面孔,化装成黑人潜逃,以为可混过大使馆的门卫,却被轻而易举地揭露,在两国交诟中,这是投奔敌国的行为,毫无疑问,这是叛国,犯了重罪。然而要重判,至少要有出卖情报之类的证据,这是司法常识,可他身处社会的最低层,没有任何情报可出卖,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只是为保命逃到苏联大使馆,岂能被收留?可这丝毫也没有减轻他的罪过。

在狼烟四起,遍地烽火文革年代,一个右派叛国投敌的案例,是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最佳教材,文革中的领导岂可放过这一机会,公安部门很快就把这一案例交给近代史所的群众进行讨论,名为征求民意,谁又敢说个“不”字!在磨刀霍霍的逼

视下,人人都不能不表态,就这样全所一致同意从重从快处以极刑,沈元因此被枪决,终年30岁。

文革后我来到近代史所,悄悄问过一些人,没有一个认为他是该当死罪的,言谈中都有深深的同情,有的还为当时的违心之论怀有内疚,可在当初就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帮他说一句话,哪怕说一句死刑缓办的也没有,一个也没有!假如能缓刑,那就可能保住他的一条命,一个少有的才华横溢的年青生命。可这只是后来人的一厢情愿,是天真的幻想,岂不知,文革中无端丧命的都难以计数,何况还是有端的沈元!以征求民意为名要所在单位讨论,实际上是狠抓阶级斗争教育,甚至是在钓鱼,考验每个人的态度,这是文革中的常事,此种行动说它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不为过。由公安人员坐阵,形势之逼人,气氛之严酷,绝不可能有人站出来为他说情,包括最欣赏他,在学术界勇于提出独立见解的黎澍,对他的死刑也没有表示异议。在黑云压城,万马齐喑的氛围中,有异议的也只能深藏内心,而不敢有任何表示。

黎澍是个有良知的学者,当初对处死沈元没



1966年8月红卫兵将苏联驻华大使馆门前的路牌“扬威路”改名为“反修路”

有异议,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沈元被揪,更加重了黎澍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名,他在1964年曾发表《让青春发出光辉》一文,列举一系列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在青年时期就勇于探索,作出贡献的事迹,鼓励年青人及早成才。就是这样一篇好评如潮,与沈元并无关系的短文,也被斥责为沈元张目,对年青人的热情期望被无情地践踏,有何天理可言!沈元之死黎澍也遭受刺心之痛,否则何以在文革结束后,是他,首先提出为沈元平反的问题。要知道这在改革开放初期,也不是没有风险的,事关“叛国”,谁又胆敢染指这一重大案件!有幸的是,刘导生已调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黎澍的建议很快得到刘导生的理解和支持。真是机缘巧合啊!是他俩赏识沈元,把他引进学术界,成就了沈元的声名。沈元在盛名之下遭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厄运,招惹是非,身遭文革浩劫,为避难而引颈就擒,如今也在他俩的努力下,力图放松沈元颈上的绳索,促使北京市公安局重新审定,作出罪不当死的结论,给予平反,了却这一冤案。

如今沈元早已成为枯骨,再也听不到为他不平,为他流泪的亲友呼唤,但这一结论对他的家人,对所有为他负疚的同仁,是一种解脱。这也只能是对后人的一种象征性的安慰,在文革暴政挤压下的人性,只能容有这一丝余地,留待今日重申,不可弥补的是,沈元永不归来了。

这已是远去的历史了,沈元也早已被人们淡忘,他的后事,家属的下落,也杳无音讯。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伤痛。因为像他这样被迫逃亡到海外而葆有爱国心的不乏其人。傅雷被错划右派,导致傅聪的出逃,而傅聪的出逃又加重了傅雷的罪名,父子之间的恶性牵连,祸端四起,肇成傅雷夫妇双双自杀,这是傅雷抑或傅聪之过?都不是,叶永烈在《傅聪缘何避走海外》一文中,袒露傅聪出逃的心情说:“1958年12月,我留学毕业,如果我回来,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当时我是被逼上梁山的。当然,对我的走我永远内疚的。”德国汉堡大学著名教授关愚谦也遭遇被迫逃亡的命运,文革中他冒充日本人避难西方,殃及妻儿亲友,被视为十恶不赦,可他也有一颗爱吾中华的心,多年来致力

于中德友好工作,并成为德中友好协会的负责人。他们都为当初的行为有深深的自责,可都以赤诚之心努力补救遗憾,续写了流亡后的下文,用实际行动表明,他们并不失为一名爱国者,为此也获得国家的谅解。1978年邓小平批示:“傅(聪)探亲回国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办理。”关愚谦的探亲归来也得到高层领导的同意,并受到国家的礼遇。

时至今日不禁要反思,多年实践而证明的爱国者们,在当年何以要冒“叛逃”的罪名远走他乡?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好人也会被暴政逼得无奈,甘冒人言之大不韪而自救救人,对此只能予以公道的评说。如今他们都已有了完满的结局,这不禁令人联想到沈元,可叹的是,他已永远没有下文了,生命的戛然终止,使他再无机会表现对国家的忠忱,留下的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刺心之痛。

(责任编辑 吴思)

来函照登

2006年第1期《炎黄春秋》刊出《上海交大首任校长唐文治》一文有误。交大从1896年到1907年的11年间,先后曾有沈曾植、汪凤藻等8位校长。到1907年才由唐文治继任。他是第9位(第10任)校长,不是首任校长。

今年,我国的5个交大都要庆祝交通大学建校110周年。如果按周金品文章以唐文治为首任校长,则要到明年才建校100周年。岂不腰斩了交大的11年历史?

吴美潮

本刊更正

今年第4期第9页右栏第3行,原文“有偿收购重组某些关键性的国有企业”,应为“有偿收购重组某些非关键性的国有企业”。

今年第4期《汪精卫的汉奸之路》一文,65页右栏第5自然段:“1938年8月,广州、武汉落入敌手”,此说不确。应为:1938年10月21日广州陷落,同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

王洪文、王效禹采访追记

● 金 凤

山东采访王效禹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的权,成立革委会。各地造反派闻风而动,纷纷夺权和成立“红色政权革委会”。山东省革委会成立较早,革委会主任是一名造反的地委级干部,名叫王效禹。

我当时在《人民日报》记者部工作,奉命到山东采访,自然要采访王效禹。他原是厅局级干部,和一般工人、学生“造反派”不同,他起来“造反”,有点不同一般。

电话打通,他欢迎面谈。王效禹大约四十多岁,中等身材,很善谈,谈起来滔滔不绝。

他不无得意地说,作为山东这样一个大省的第一把手,他的确非常之忙。但再忙,也要热情接待中央党报记者。

他谈到“文革”前遭到原山东省委(现称“主要走资派”)的排挤、迫害和折磨,他受到处分,下乡劳动改造(后来知道他是因渎职和生活作风问题而受到处分和下放劳动的)。他认为,山东省的“主要走资派”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他有所抵制,反而遭到迫害。因此,“为了保

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不顾一切,坚决起来造反!他有一定的宣传、组织能力,又了解一些领导干部的底细,很快当上山东省“造反派”的总头头,成为山东省红色政权革委会的主任。

他大摆他的“造反功绩”:如何紧跟中央文革部署,帮助各地“造反派”,不到半年夺了全省10多个专区、100多个县“走资派”的权,相应地成立了各地革委会。工作量自然很大。他谈到各派“大联合”如何困难,“走资派”如何顽抗,当地驻军又不支持等等。

他谈到当前要紧跟中央部署,着手恢复党的组织生活,首先要成立各地、县的党的核心小组。他说,青岛市“造反派”的力量很强,作为试点,他已任命青岛造反派头头、革委会主任杨宝华当



1967年2月3日,山东省革委会成立,济南市群众游行庆祝

青岛市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来抓恢复党的组织的工作。我顺口问了一句:“听说杨宝华是个工人,他是党员吗?”王效禹回答的有点尴尬:“大概不是。”我吃了一惊,忙问:“不是党员,怎么能当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王效禹脸不改色地说:“没问题,我可以让他突击入党。”我紧接着问:“怎么突击入党?杨宝华突击入党了吗?”王效禹没有想到我会打破砂锅问到底,有些为难地说:“我了解一下。”他拿起电话,找青岛市革委会主任杨宝华。只听他大声问:“小杨吗,入党手续办了没有?”那边杨宝华大声回答:“实在太忙了,还没来得及办。”王效禹大发雷霆,声色俱厉地怒斥杨宝华:“小杨,你真糊涂,这是件大事,有关你的政治前途,怎么能拖着不办?你马上写个人入党申请,报到济南我批,赶紧办。”我又说:“入党申请要在党支部大会通过,然后再报上级审批吧。”王效禹哈哈一笑:“同志,现在不是还没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吗,如何让支部通过?只能特事特办,我批就行了。”

听到这里,我很反感,这简直把恢复组织生活当儿戏嘛。一切都是“造反派”包办。非党员竟可以当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可以突击入党!把党组织玩弄于股掌之中!我禁不住长叹一声。

王效禹的确很重视这次谈话,从上午到下午,谈了整整一天,中午只吃了一顿便餐。他自然希望我好好写他一篇。

我心中对他已很反感,为了更全面了解他的情况,我找了当时担任济南部队司令员的杨得志同志。1952年他担任志愿军司令员时,我访问过他。

这次一见面,他开门见山地说:“听说你见了王效禹,印象如何?”我老老实实回答:“夸夸其谈,言过其实,心术不正,根本不像个老干部。他居然任命青岛造反派杨宝华当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杨宝华还不是党员哩,他让杨突击入党。”杨得志抚掌大笑:“当真是《人民日报》记者,说话一针见血。”他历数了王效禹干的许多坏事:残酷迫害省委领导干部;残酷打击他的对立面,也是造反派的工人;放任造反派打砸抢,抄家抄了不少文物据为己有;玩弄女学生和女工等等。他还挑拨离间省军区、各地军分区和济南部队的关系,指使造反派抢解放军的武器,引起大规模

武斗。

听了杨得志这些话,我进一步了解了王效禹,我决定一字不写。记者必须从实际出发,尽管王效禹是当时红得发紫的“政治明星”,我认为他品质很坏,将来不会有好下场。

但山东不能白来。从新华社山东分社了解到,山东省大型煤矿新汶煤矿抓革命、促生产搞得不错,我立刻坐火车去了新汶。

新汶的煤矿生产已恢复到正常水平,这在当时全国工业生产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实属难得。我访问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工人和技术人员,访问了家属,又下井实地考察。

我写了山东新汶煤矿抓革命、促生产,煤矿产量跃居全国煤矿前列的新闻。《人民日报》把它发在一版,还发了一篇短评。听说,周总理看到这一消息很高兴,让各地工业部门注意学习。江青则很不高兴,批评总理“抓生产压革命”。她还追查这条新闻是谁写的,鲁瑛告诉了她。她记下我的账。

上海见王洪文谈了半天,一字未写

1967年9月,我到上海采访。当时,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指示要搞好革命大联合,要解放一些干部。我到上海,找到一些“解放”了的干部,开了座谈会,给报社发去一个版的发言摘要。我单独访问了刚刚“解放”的原上海杨树浦区委书记张金标,写了一篇通讯,发在《人民日报》一版。

当时,上海最大的“造反组织”是上海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这时,正逢“工总司”成立一周年。他们欢迎记者访问。我决定采访“工总司”司令王洪文。他原是上海国棉十七厂一名保卫干事,如今是上海响当当的“造反派”。

我找到外滩汇发银行,这里原是上海总工会所在地,现在是“工总司”司令部。王洪文的秘书小廖带我穿过曲曲折折的楼道,来到一个房间门口。奇怪的是,小廖不从房门进去,却带我从一个巨大的窗户钻进房间。这实在出人意料,有点故弄玄虚。

原来,这里是“工总司”核心组开会、学习的

地方,一般是轻易找不到的。房间很大,一张长方形的餐桌两旁,坐了“工总司”核心组的十几个成员。王洪文三十出头,面容端正,看来文静,不大像杀气腾腾的“造反派”。他的助手陈阿大是个工人,长得膀大腰圆,是个打砸抢能手。

小廖到王洪文身边说了几句,王洪文站起来,表示欢迎:“欢迎《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我们。我们正在‘天天读’,读毛主席著作,这是雷打不动的每天必修课,请你坐下来参加吧。”

我想,真糟糕,我手提包中既没《毛选》,也没有语录,怎么学呢?谁知,他们根本不是学习,而是核心组每天的碰头会,正在商谈工作。我松了口气,否则会很尴尬。

他们东拉西扯,不知谈些什么。那个陈阿大好像提出,他看中一座花园洋房,希望能搬进去。核心组另一名成员王秀珍马上说,她住的房子太小,也想搬搬家。一下子,大家吵吵嚷嚷,都吵着要分房子,要搬家。王洪文看到有我在场,这样吵着要房子究竟太不像样,用手一摆大声说:“这事好办,回头你们开个单子,交给我看看就是,用不着在这里议论。我们还是好好议一议‘工总司’成立一周年,大会怎么开吧。”

他们拉拉杂杂谈了些意见。王洪文总结了一下,特别强调,要注意北京的动向,要紧跟中央文革的部署,坚决执行春桥同志的指示。

他说,春桥同志最近提出,现在是“造反派”最容易犯错误的时候。因为,我们已彻底打垮了“走资派”,彻底打垮了我们的对立面“赤卫军”。我们一定要戒骄戒躁,不要得意忘形。他说,春桥同志特别要我们保持工人阶级本色,艰苦朴素,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他希望大家好好议一下。

会场顿时沉默了,无人发言。我想,刚才大家纷纷吵着要瓜分资本家的花园洋房,这和张春桥的讲话,不是南辕北辙吗?王洪文对大家分房的要求不予驳斥,反而大包大揽下来,现在又提出要学习张春桥的讲话,这不是故意演戏吗?看来,王洪文和山东王效禹都是“一丘之貉”,造反起家,打打杀杀,争权夺利,简直和上海滩过去的大



流氓头子杜月笙、黄金荣差不多嘛!不过,王洪文他们的能量可比杜月笙、黄金荣大多了。他们简直就直接推翻了上海原市委、市政府,夺了他们的权,现在俨然是上海市的统治者,要几座房子不过是小菜一碟!

我一面想,一面冷眼旁观,他们如何表演。

果然,王洪文一讲完,他那班伙计纷纷献忠心,表决心,要认真学习,坚决执行春桥同志指示,不忘工人阶级本色……如此等等。总之,一片空话、假话、大话,说起来头头是道,毫不脸红。

快到中午,小廖和别的工作人员端来饭,王洪文和大家一起吃了,我也吃了。众人散去,我提醒王洪文,要和他单独谈谈。他看看表,说吃完就谈吧。

我们来到王洪文的会客室。

王洪文首先介绍了他的简单经历。他家在黑龙江省,他在家种过地,后来参了军,学习了保密专业,转业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当保卫干事。他得意地说:“我种过地,当过兵,后来又当了工人干部,我是不折不扣的工农兵干部。”果然,伟大领袖也为他这个“工农兵”干部吸引,竟把他选为“接班人”,这是后话了。

王洪文继续得意地大谈他的“造反业绩”。由于他是保卫干部,接触不少厂里领导干部的档案材料。“文革”风暴一起,他摇身一变成为“造反派”,抛出了厂领导材料,当了工厂造反派的头头。接着,他联络上海许多工厂的造反派,成立

了“上海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当时,上海工人另一派造反派“工人赤卫军”势力很大,不同意他们动辄打砸抢和迫害老干部的行动。王洪文他们要上北京告状。他们到了距上海不远的安亭镇,火车不开了,他们挡住所有经过安亭的火车,造成火车停运,同时炮打上海市委,制造了著名的“安亭事件”。上海市委向中央紧急报告,“中央文革”派张春桥到安亭处理。张春桥表态支持“工总司”的“革命行动”。上海市委垮了,“工总司”势力猛增。

接着,王洪文眉飞色舞地谈到他最得意的“血洗上柴”的“英勇战绩”。他说:“上海的走资派不甘心,保护他们的上海保守派工人赤卫军也不甘心,他们集结在上海柴油机总厂,要和我们拚死一搏。”

说到这里,王洪文那张相当端正文雅的脸忽然变得杀气腾腾。他兴奋地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大声说:“我们‘工总司’决不退让。我调来了十万工人民兵,进攻上柴,血洗上柴。据守上柴的赤卫军大约有一万人,怎禁得起我们十万大军的进攻?!可是,他们也十分顽强,和我们逐屋争斗,从上午打到下午。最后,他们死伤两千多人,我们也损失了几百人。我们拍了实况,你想看看吗?”

我连忙摇头:“不必看了。只是,我知道,你们和赤卫军原是一起造反的战友。你们苦守安亭时他们还支援过你们。你怎么下得了这样的狠手对付他们呢?”

王洪文冷笑一声:“喔唷,记者同志,我们决不当‘东郭先生’!俗话说,一山容不得二虎。还有,卧榻之旁,不容他人打酣。毛主席也教导我们,领导权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我本想开口问他,《毛选》四卷和《语录》里,什么地方有这样一句话。一想,算了,何必和他较真?“造反派”一向善于打《语录》仗,假造《语录》也不足为奇。

但面前这位长相温文的“造反派”竟对自己的阶级兄弟下如此狠手,实在让我嫌恶。

王洪文足足和我谈了4个钟头,他当然希望我为他写篇文章。他还似乎谦虚地说:“不要写我,希望你写写我们‘工总司’,拥有上百万工人造反派的‘工总司’确实值得一上《人民日

报》啊!”

我含含糊糊地敷衍他:“等我回北京向报社领导汇报后再说吧。”

他大约有些失望,但还算有风度,站起身送我出了密室,让秘书小廖派车送我回新华社上海分社。《人民日报》记者站早已和分社合并,我就住在分社。

其实,我心中早已打定主意,决不写王洪文,也不写“工总司”。我从内心对这些搞打砸抢、夺权乱党的“造反派”深深厌恶,怎么能为他们树碑立传呢!

回北京后,关于访问王洪文,一字也未向鲁瑛报告。有一天在走廊看到他,他问我:“在上海见到王洪文了吗?”他故作神秘地说:“他可是风云人物,听说还要往上走哩,你怎么不写写他?”我含含糊糊地说:“谈得不好,没法写。”搪塞过去了。

1973年6月,我从监牢出来。下半年开“十大”,王洪文竟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有人知道我采访过王洪文,怂恿我写一篇访问记。我摇摇头说:“事过境迁,不必写了。”有人还为我惋惜,说是可惜了这么好的题材和人物。

我可不这么想,我认定这种人决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尽管他当时已攀到政治权力的顶峰。果然,不到三年,1976年10月,王洪文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起完蛋了。

不是我有什么先见之明。凭记者工作几十年的经验,我早已学会了,决不赶浪头,决不吹捧崛起一时的“政治明星”,决不写事后让自己脸红的文章。有些时候,不写比写好!如果1967年我写了王洪文和王效禹,事实上是吹捧了不该吹捧的“政治流氓”,我心何安?!

记得“文革”前看了一篇作家周而复访问关向应的文章。关向应正在养病,桌上是一部《鲁迅全集》。关向应对周而复说,他最钦佩鲁迅先生的是,鲁迅决不会写他将来看了让自己脸红的文章。就是他决不写违心的文章,决不写趋炎附势,赶潮流的文章。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关向应的话我牢牢记下了,下决心这辈子不写让我以后脸红的文章。“文革”中不写王洪文和王效禹,只是向鲁迅学习而已。

(责任编辑 吴思)

我在西路军的经历

● 全 璞

笔者是西路军幸存者之一,依照自古以来的征战法律“赏存不赏亡”,也是得赏者之一。在每遇升迁和集庆的时候,笔者内心总是嚤嚤泣血,阵阵痛楚;脑海里常常泛起许多乡音亲切、面貌熟悉而一批接一批倒下去的战友的形象。要问何以会如此,得把我记忆所及,身历其境的河西战役始末叙个梗概。

近半个世纪前,飞渡黄河天险的确切日期是1936年10月25日,从甘肃省靖远县的河抱口(旧名虎豹口)开始。当时称“渡河部队”,包括原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九军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新组编的红五军。这些都是经过千锤百炼,征战万里,翻越雪山草地而保存下来的精锐部队。三个军的人数分别约为九千、七千和五千,加上轻便的总部机构(司、政、供、卫)千余人,共二万二千人。渡河部队的任务是整个“攻宁战役”或叫“取宁计划”的一部分,还有若干部队作为实现这一战役计划的后续部队,或支援策应部队。因此,渡河后的部队即沿黄河北岸向东北方向疾驰,直奔甘宁边的景泰、五佛寺、小红山一线。

甘肃、青海、宁夏的马家军阀(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调集数个旅的骑兵窜犯我一条山阵地。大战一条山的战斗打响了,我军在这一战斗中是获胜的一方。凭借旺盛的士气和蓄积多时的力量,予敌骑兵以重大杀伤,全歼其两个团,击溃其各旅。事实证明抗击敌骑兵是可以取胜的,我军也付出伤亡数百人的代价。首战告捷不久(也许是十一月七八日),攻宁计划作了重大改变,即撤销了原计划。

若果于此时撤回渡河部队——这本是很有理由的——那当然是全师而返,胜利班师。但事情没有能这样发展。渡河部队受命转向西北前

进,11月11日,在古浪附近正式宣称为“西路军”,任务是“打通远方路线”。这在当时,该是一个多么炫耀、多么有力的号召,像是满园满树的金苹果在欢笑招手!好吧,既是如此伟大光荣的任务,就全力以赴吧。若果从古浪、大靖一线(即受命时的抵达线)算起,到达预定的“打通远方路线”的边境地带,也只有两千多华里,按当时的行军速度(完全靠步行),途中不徘徊、不滞留,得食即走,不须两个月即可达到。可是,事情没有能这样发展,而又下达了攻取古(浪)大(靖)凉(州)永(昌)山(丹),创建走廊蜂腰地带根据地的重大任务。

这后一任务和前一任务貌似相联系,实则是极为矛盾的,是个鱼和熊掌一齐吞食的任务。这支已孤悬塞外的西路军就在这一带周旋,白白费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须知,这一个多月的每一天、每一小时都贵如金玉。因为,11月入冬后,朔风飞扬,战士衣单,难以抵御塞外的严寒,这且不说。为要创建根据地,就不能不分散兵力。往往为了攻占一城一镇(河西各城镇村庄都围有厚而坚的土墙),而消耗了大量的人员和火力。永昌城的攻占和坚守,使九军的大部分精锐基本损失了。

12月下旬,部队抵达山丹。我们于24日听到“双十二”事变的传达。读者容易记得,1936年12月24日,正是西安事变后的第12天,也是和平解决这一事变的方案完全付诸实施的时候。这时集结于走廊腹地的马家三军,也不能不被猝然发生的西安事变而震惊,而彷徨失措。若果我军于此时提师东向,无疑义可做到“半师而返”,即可有万人以上回到河东。当然,事情也没有能这样发展。在一阵庆贺“双十二”喜讯之余,随即接到命令:“限于一月(指1937年)内夺取甘

(张掖)肃(酒泉)二州,建立根据地,继续完成打通远方路线的任务”。依然是两个相矛盾的任务,不过此时这两个任务间的矛盾程度相对地减弱了些。因为,不论是第一任务或第二任务,执行起来都已不大可能了。这已是1936年年底,即是隆冬酷寒的季节,对于这支衣单力疲、孤悬塞外的部队,纵使能拖到玉门关外,恐怕一阵风雪也可以把它全部吞没;但去攻城略地,其后果也很严重。正所谓“行不能,止亦不能。”

1937年元旦前后,这支孤军依然旗鼓相当地向西进发了。这时五军接替九军担任前卫,约于一月一二日进占高台;有总直的少数单位跟进,入城者共五千余人。张掖、酒泉被马家军阀视为中心腹地,几乎投入其全部力量来争夺。经过八九个昼夜的浴血抗争,高台终于失陷,上至军长、下至马夫几乎无一生还。其他部队(三十军和九军余部)被阻于临泽县,相机攻占张掖已不可能,而援救高台也没来得及。高台噩耗传来,迅即转移到倪家营子。这是个百多户居民的村庄,我军一万三四千人在这里扼守四十多天,日夜奋战,一日数战,实在打得精疲力竭了,粮草柴水已无法解决;而所以要在这里困守许久,无非是要把塞外的酷寒冬季拖过。从这意义上讲,倪家营子的困守和在此前后的日伏夜行的做法,都是适当的。无奈大环境下这支部队的颓势已不能挽

回。

在倪家营子苦战(苦守)40多天之后,拉出来向东行,经两个昼夜抵达西洞堡,还约有一万一二千人,人们都以为这必是东返了。若果此时决计东返,可能有十之一二的人员能回到河东,即所谓“残师而返”。可是事情又没有能这样发展,而是令下:迅即回旆西转,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打通”任务。这时“打通”的要求似乎是很迫切、很受催促的一件事了。于是,这支疲不堪战的孤军,第二次返回倪家营子。为什么定要折回这里呢?因为攻占别处都要付出相当代价,倪家营子则不需要攻占,在我军撤离后,敌人进去尽情地烧杀蹂躏,已是“屋上无完瓦,地上无噍类”了,甚至连一口干净水也没有。

就在这样一个空村子里,我军第二次又扼守苦战了九个昼夜。于三月六七日撤出,经沙河遇阻转移至祁连山脚下一个小村庄——三道流沟。读者会想到,三月上旬在南方称得上“早春二月”,而在河西走廊,这种“早春”是没有的,依然是冰天雪地,寒风凛冽。

经过四五个月连续不断的苦拼恶斗,抵达三道流沟的还有八九千人。敌人死死咬住这支已逐渐失去战斗力的队伍,经过三四个昼夜的拼杀,溃围向后山退去。至半山的黎园口(三几户居民),敌骑兵前抄后合涌上来。全军上下人员无

一例外地参与奋战,真正是“以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临时战垒,前赴后继地用身躯阻挡敌人的铁骑和枪刀。竟日下来,八九千人被绞去大半;剩下的部队向山的更深处转移。第二天到达一个草高于人的荒山坡,名叫马场滩,真是牧马的好地方,可对于我们这些步行的人则大为不利。敌人追来,全体人员像



1937年,突围后到达新疆的部分西路军指战员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合影

头一天一样无分上下地再一次与敌人展开拼杀,竟日下来,三四千人又被绞去大半。这连日两场拼杀的情景,不妨用“尸横遍野,血流成渠”以概括之。任何凭吊战场的词文,或许不足以叙其实。何以会如此?就在于这支部队已是枪无弹,人无力,许多人伏下射击,待敌人抵面前,枪不能发,人已动不得了。

从马场滩退下来的一千多人,在一个雪线以上的山头——毛牛山集结。当夜,部队最高领导人冒极大的危险,奉命离队潜行,化装东返,说这是为缩小目标。所剩下的这一千四五百人,在新组成的临时领导(西路军工委书记李卓然)率领下,转移到石窝。追敌被暂时甩脱了。因为这深山巨石角落里,是人迹罕到的地方。经过一天多整顿,分东西两个支队活动。东支队四五百人,多数是伤病人员,不待说东进没几天,在红湾寺附近经一场激烈战斗,被敌人搞光了。西进支队由工委直接领导,算幸运些,经过40多天全无人烟的雪山行军,纵向穿过祁连山脉,抵达西边山口石包城(有三几户居民),计点人数,九百零几,这算是“走出来了”。

石包城至安西约两天多路程。此时倒感到些风和日暖的春天气息了,因为毕竟已是暮春季节。听到安西只有守敌一个连的不实消息,不曾放弃攻城略地的思想仍起作用,决定试攻占之。不意一打响,守敌约在两个团以上。请读者记住,这是1937年4月25日左右的事,当时,我军在全国范围内用团级以上为单位的进攻作战,这恐怕算得是最后一次了。可惜所有史书均不提及。试攻占不成,当然迅速撤退,半夜徒涉“水寒冰似刀”的疏勒河,水齐腰深,冰冻透骨(上流雪山、冰谷融化的水正滚滚而下),有些人因腿脚抽搐而倒下。渡河后沿着还未竣工的兰新公路向西疾奔。日午抵柳园(今敦煌县治)附近,再被敌骑兵追围,抗击至夜临,又突围西去,经三日夜的沙漠行军,终于到达拟定的“打通远方路线”的边境地方了。

见到前来迎接的人员,犹如远离的游子回到慈母身旁一样。计点人数,五百多一点,连迎接的领导同志也叹息说:“人数实在太少,要有千人以上,还可装备成一支队伍打回去”。是的,实在太少了,这五百多人中,真正能作为战斗兵的不

到半数。这即是说,一支能征惯战的大军(西路军)已不复存在了。

以上是河西走廊战役始末的概述。如有历史爱好者欲知其详,不妨进一步覆实核查。仅从这概略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一,我军在一个战役中牺牲两万多人,丧失三个军的精锐部队,通观第二次国内战争史,是少见的。二,这支部队在长达半年时间里,无日无夜不行军作战,艰苦异常,但无一人叛变投敌。三,所有人员在缺衣缺粮、无医药、无后方的情况下,每次临战都奋勇争先,毫不畏缩,人人亲眼看到敌人那样残暴杀害我方伤病人员(现张掖城边还有这样的万人坑多处),一上战场则视死如归,负伤决不下火线,必继以死战。四,在十分艰难、十分危急的时候,同志间、战友间的互助扶持和不伤害居民利益等传统纪律,都保持得良好。五,我军虽然大量歼灭了敌人(击毙两万以上,伤敌数倍于此),但敌人能够迅速补充,适当轮换和整顿,我军则全然没有这种条件。六,在战术指挥上没有重大失误,间或有之,也只占次要地位;主要是赋予的战略任务欠当,尤其是前期,两个任务互相干扰,结果是“打通远方路线”与“建立河西根据地”两两落空,教训深巨。

事已过近半个世纪了,似乎尚有不肯谈及此事者,有使这一段英勇壮烈的英雄史诗般的事迹永远湮没的危险。有些同志曾经想以此事迹为文著,都被“枪毙”。笔者写过《冲出绝境》一文,也遭此不幸命运。我不为这篇小文章遭“枪毙”而惋惜,那篇东西的的确确没有能反映出那英雄壮烈场面的事实于万一。笔者还写过若干短小诗词,意在悼念死者的伟大英灵,也稍稍慰藉自己的微小的心田。这些都无须叙及,这里仅录下多年前写的《悼念西路军宣传队》(注)的一首小诗,作为本文结束,未必算得过于繁赘之举。

沙渺渺,风凄凄,远离芳草地,只见雪纷飞。
稔知死者英灵别,安问生者怎样归?沙茫茫,风吹吹,心言难听到,精魄将何依?后死荣为先死悼,知为后死悼者谁。

(注)宣传队男女同志三十余人,于山丹城附近一次敌袭中全部英勇牺牲。

(全璞(汪小川)一九八四年)

(责任编辑 吴思)

邓拓逝世四十年祭

● 袁 鹰

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奸佞覆乾坤。

——廖沫沙挽邓拓诗

1966年春夏之交，中国上空阴霾密布，狂风呼啸，电闪雷鸣，压得人透不过气来。5月18日凌晨，邓拓含冤离世。那年他五十四岁，正是风华正茂的中年，就成为那场延续十年旷世大灾难的第一位殉难者。

整整一个春天，邓拓的心情都处在惶惑、愤懑以至震撼的状态中。从前一年冬天姚文元那篇批判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刮起的狂风，越来越猛，明显地已经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对着整个思想文化界和北京市委了，不是传来毛泽东主席对北京市委所谓“独立王国”的严厉批评吗？他惶惑不解：北京市委就在中央身边，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怎么可能“水泼不进”？接着，公开点了他的名，拿他的一些杂文随笔开刀，连篇累牍地批判他在《北京晚报》副刊的专栏《燕山夜话》和他和吴晗、廖沫沙合作在市委理论刊物《前线》上的专栏《三家村札记》，那种从字里行间断章取义、牵强附会、任意上纲、罗织罪名的卑劣手法，使他这个熟谙历史的人很快想起明清两代那些令人战栗的文字狱。昨天，报上又有一篇戚某的文章，竟无中生有地诬陷他是“叛徒”，更使他热血上涌，头晕目眩。冷静下来，他不禁认真思索：自己两次被捕经过，组织上早已作结论。这个戚某有什么根据将“叛徒”的帽子强加在他头上？工作的错误可以批评，文章的毛病更可以议

论，职务也可以免去，但是，人格不能受侮辱，共产党员的尊严不能受侵犯，“士可杀不可辱”，古往今来许多仁人志士的崇高形象经常屹立在面前。他要用自己的生命维护尊严，留下清白。

这天晚上，他决定给党留下最后一封信。在下笔以前，他先执拗地要妻子丁一岚带着子女先离开家一段时期，说“家里有姐姐照顾我，不要紧。”让心情沉重的妻子先去安睡。然后展纸挥笔，向党倾诉，按自己的认识、认真分析自己被批判文章的背景和不足，不同意那些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诬陷。

……文章的含意究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做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想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

……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甘心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就在他用生命的最后一息虔诚地三呼万岁

的时刻，作为那场大风暴标志的“五·一六”通知，正以中央文件名义飞向全国，打开了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文字狱的大门。

十三年后，1979年8月，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决定为“三家村”冤案彻底平反。决定指出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并强加以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种种罪名，完全是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的大冤案，应予全部推倒。决定下达后，全市人心大快，大家表示，一定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决不能再让林彪、“四人帮”这类的野心家、阴谋家逞凶肆虐，决不能再让“三家村”这样的冤案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演。（见1979年8月3日《北京日报》）。9月7日，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主持，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会，郑重为邓拓平反昭雪。那天，我奉报社领导人之命，起草一副挽联，记得上联是“闽海波涛，燕山风雪，三十载战斗年华，何期奸佞逞凶，千古伤心文字狱。”

文字狱是中国封建社会专制主义统治下的现象。延至当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新的形式、新的手法。邓拓就正好撞到这个枪口上。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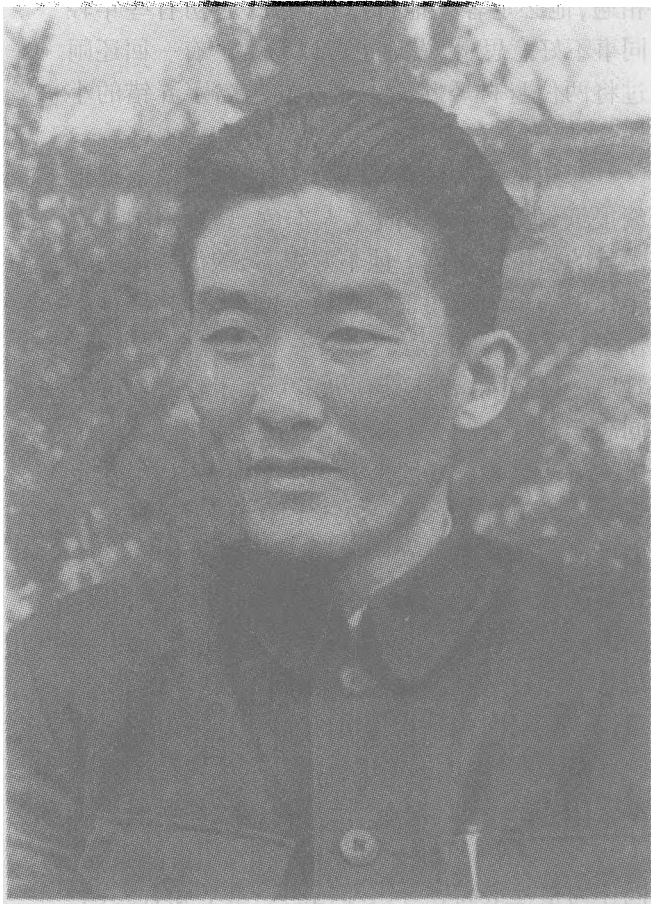
作为邓拓50年代在《人民日报》时期的主要助手、前《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的胡绩伟，在邓拓逝世二十年时写过一篇《平生赢得豪情在》，开头一段介绍了邓拓的工作和品格：

邓拓同志知识渊博，熟悉社会，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他不是一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指挥者，而是一个亲自动手主持编辑、写作和采访工作的实干家。他领导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对干部循循善诱，平等商讨，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有个时期，报社几乎天天都受批评，我们常常出大小差错，但他总是主动承担责任，尽量保护干部的积极性。对于来自某些方面的责难和干扰，他常常一人顶着，独自排解；他忍辱负重，胸怀宽广，处之泰然。他体弱多病，仍坚持带病工作，常常通宵达旦。他在战争中腰椎受伤，经常带一个钢架子；他手脚整天出汗，越用脑子，汗流得越多。几乎一个钟

头就换一块湿毛巾。真可谓是艰苦奋斗鞠躬尽瘁的典范。在他领导下，报社工作人员如鱼得水，心情舒畅，都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那时《人民日报》的同志同心协力，全心全意为办好报纸而努力。《人民日报》的很多同志都认为，这个时期是《人民日报》历史上最令人怀念的欣欣向荣时期。

我就是在那个“最令人怀念的”时期踏进报社大门，迄今已有五十余年了。

1953年元旦才过两天，报社人事科通知我们四个刚从上海《解放日报》调来北京的人，说邓拓同志晚上要同我们谈工作。我们听了有点惊讶，几个普通编辑记者，只须人事科通知到分配的部门报到上班就是，何用总编辑亲自谈话？晚上，不免惴惴不安地走进他的办公室。邓拓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位温文儒雅的学者。他让我们坐下，开口就说年前因为工作忙未能在我们到北京第二天就见面表示歉意，接着就用商量的口吻一一征询我们对工作岗位的意见。总编辑和



邓拓（1912—1966）

蔼可亲、平易近人,对我这样初到中央机关工作的人,尤其感受到一阵暖意,把窗外的严寒忘得一干二净。这件小事,至今还历历在目,想起当年同时去见总编辑的刘时平、钦本立、顾小岚三位,都已先后去世,不禁凄然。

我分配在文艺部(那时称文艺组)担任编辑,分工主管的副总编是林淡秋。50年代初报社在王府井大街前《华北日报》旧址,京城的平房大院,各部办公室分散,因而很少见到邓拓,不过常常从一些老同事口中听到对这位总编辑人品、风格和才华的赞美。他肩负重任,辛苦勤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在与报社同事相处中,坦诚恳切,毫无领导架子,即使要公务员、通信员办点事,也总说“请你帮我”如何如何。报社从副总编辑到司机、公务员,一律称他“老邓”,少数刚来的称“邓拓同志”(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末,对领导人都以“老×”或同志相称,从来不称职位)。1954年盖了四层楼,编辑部办公室都集中在楼上,才有机会常见到他。有时在楼梯上相遇,他必定客气地打招呼问好,起初有些年轻同事不好意思,慢慢地也习以为常。有一回还闹过将两位身材矮胖的中年女同志名字弄错的小误会,成为善意的笑谈。

邓拓从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在晋察冀根据地编报纸,但他一直不脱文人本色,具有中国正直学者的品格和本色。他不好虚名,淡泊权位。50年代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刚成立时,要他担任主席,这本来只是个名义并非实职,但是他认真地一再坚辞,要让具有更多新闻工作经验的老同志担任,后来只是由于中央决定,并以苏联记协主席历来由《真理报》总编辑兼任为例,才定下来。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原来已安排他为中央委员候选人,他得知后一再给中央领导同志打报告,恳切要求换掉他的名字,让给别人。这样的品德和风范,现在哪里还能见到?这是他的品德和素养使然,绝不是故意作秀、矫揉造作。那些年,报社大楼里确实是一片融洽相处、团结和谐的气氛,虽然也有过几次全党全国统一部署的政治运动,但还比较和风细雨,不似后来丁酉“反右派”斗争那样剑拔弩张,伤害同志,这同作为报社最高领导人邓拓的稳重平和有关,老同事们如今回想当年都依然不胜神往。

三

就是这样一位忠贞勤恳、鞠躬尽瘁的邓拓,1957年春天猝逢厄运。毛泽东主席忽然大发雷霆,以“按兵不动、不积极贯彻中央精神”为名,当众斥责他“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同中央唱反调”等等,忽而文雅地揶揄他是汉平帝,忽而粗俗地辱骂他“占着茅坑不拉屎”,忽而又鼓动部下造他的反。态度之严峻,措辞之凌厉,确是闻所未闻,也是《人民日报》创刊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大事。而实际情况只是他对当时所谓“引蛇出洞”的阳谋不甚理解或者不无反感,因而行动上有所踟蹰,不料竟遭到如此严厉的训斥。一时报社大楼里人心惶惶,仿佛春天里却到了寒冬。这位对党对革命从来忠贞不二的老共产党员,为了顾全大局,只得忍气吞声,再三作违心的检讨,并且请求辞职。但未被批准,仅由代表中央主管《人民日报》的胡乔木来报社在一次小型会议上顺便宣布“人民日报实行社长制,邓拓同志担任社长,吴冷西同志担任总编辑”。

邓拓虽然处在名义上是社长、却无编报大权的位子上,依然一贯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每天来上班,认真工作。就在社会上响应中共中央开展整风号召到处“大鸣大放”的5月初,给我们副刊拿来一篇杂文《废弃庸人政治》,他以某县给农民下命令让全县的棉花在同一天打尖和机关人事工作的官僚主义为例,批评“我们有的同志,不知为什么,天天忙忙碌碌,做出一些大可不必要做的事情,他们不管对什么都不肯放手,都要抓,而且抓得死死的。”他说:假若一定要把这些都说成政治的话,那么,这只能说是“庸人政治”。“凡是凭着主观愿望,追求表面好看,贪大喜功,缺乏实际效果的政治活动,在实质上都可以说是‘庸人政治’。这种庸人政治除了让那些真正没出息的庸人自我陶醉以外,到底有什么用处呢?”文字朴素,语气平和,不似那些日子其它杂文慷慨激越,尖锐犀利。可惜在滔滔者天下到处可见庸人、庸官的时代,“一士谔谔”的逆耳忠言,有多少人能听得进去?

这是邓拓给《人民日报》副刊的第一篇杂文。到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三年困难年

代,又写了一篇《从借书谈起》,借清初学者袁枚的《黄生借书说》一文中说到贫寒文士读书之难,皇家和富贵之家藏书无数,“然天子读书者有几?富贵人读书者有几?”从而引出一个真理:占有得多不等于利用得多,许多几乎一无所有的人常是用心最勤的人。为了优越的条件而自满,而骄傲,结果只能引导到失败。胜利永远属于那些在困难中不但不低头、反而发愤图强的人们。

邓拓学识渊博,是位历史学家,对明清以后的历史更有专长,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他说过新闻工作就是治当代史,希望报社编辑记者都应该研究历史,更应该以史为鉴。我自己就曾不止一次受到这种教诲和要求,他说,你不要只关心文艺,更要多读历史,最好能有计划地读完《二十四史》。很惭愧,我虽然对近现代史有兴趣,但从未认真钻研,读书也是兴之所至,胡乱翻阅,到现在也未能完成邓拓同志的要求,深负他的期望。1958年他到我们文艺部来蹲点,用当时的说法是“种试验田”,参加文艺部的工作会议时,很少谈文艺,除了关心杂文外,也不管具体选题,而是鼓励大家博览群书,利用报纸工作的条件,多读书,多充实自己,说这是副刊编辑的起码要求。同时要开阔视野,同各方面人士交朋友,依靠各方面专家办好报纸。勤恳真诚、推心置腹的言谈,文艺部一些老同事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四

邓拓是杰出的历史学家、新闻家、杂文家、书法家,但我以为他的气质仍是一位诗人。从青少年时代直到去世前几个月,三四十年间写了大量诗词,有的潇洒飘逸,有的浑厚深沉,但都是一往情深,真挚感人。比如当年《晋察冀日报》社有位来自武汉年轻有为的记者司马军城,也是一位有才华的青年诗人。1942年随报社一批同志到冀



东工作,在长城以南、滦河两岸游击区办报。邓拓同他情谊很深,在司马去冀东前,曾写诗为他送行,有“山中学道飘青鬓,火里拚金见至情,离乱旅途天野阔,轩昂战纛日边明”之句。1943年,司马军城给邓拓来过一封信。青年诗人从滦水边向西遥望燕山深处,意气风发地写道:“你看,朝晖起处,即我在也。”信到不久,就传来了他在敌人包围中壮烈牺牲的噩耗。邓拓展阅来信,夜不成眠,含泪写了一首挽诗:

朝晖起处君何在?千里王孙去不回。

塞外征魂心上血,沙场诗骨雪中灰。

鹃啼汉水闻滦水,肠断燕台作吊台。

莫怨风尘多扰攘,死生继往即开来。

这首挽诗,既有忧伤,又有怀念;既有哀悼,又有誓言;如怨如诉,可歌可泣,通篇都倾注着革命者对战友的深厚情谊,至今读了还是感人至深。

1948年6月,《晋察冀日报》奉命终刊,同晋冀鲁豫边区的党报合并为《人民日报》时,邓拓作为《晋察冀日报》负责人写过一首诗:

毛锥十载写纵横,不尽边疆血火情。

故国当年危累卵,义旗直北控长城。

山林肉满胡蹄过,子弟刀环空巷迎。

战史编成三千页，仰看恒岳共峥嵘。

战争年代，邓拓是党报负责人，十年间“战史编成三千页”，他的诗也都是“昂扬士气，激励民心”的战鼓。即使是写给丁一岚的情诗里，也一样能听到金戈铁马的鼓声和革命战士的心盟：

忆自滹沱河畔游，鹈鹕形影共春秋。

平生足慰齐眉意，苦志学为孺子牛。

久历艰危多刚介，自空尘俗倍温柔。

六年血火情深处，山海风波定白头。

建国以后，他的诗情更如春潮汹涌。大量诗篇，都是忠实地记录党率领人民进军步伐，记录时代的进程，为新生事物唱赞歌。祖国的山川风物，各行各业的英雄模范，千年文物，一代新人，都进入了他的诗句。报纸工作繁杂，他不大有空暇经常到外地去，但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让我们读到新作。他好似一位行吟诗人，一路走，一路唱，写的是亲身所见所闻，是人民喜怒哀乐。五六十年代的一些重大决策和措施，现在看来，未必成熟，甚至是走了弯路。但在当时，确实是撼人心魄的。而诗人邓拓，在短暂的旅途上，总是热情洋溢地赞美壮丽的山河和群众的力量，讴歌出土的春苗。诗篇中常常出现普通劳动者和基层干部的名字。他同这些同志素昧平生，但是听到他们的先进事迹，就毫不犹豫地挥动诗笔。

我还记得：1958年2月中的一个晚上，我在办公室接到邓拓的电话，他几乎是哽咽着低着声说：“黄敬同志去世了，我正在写一首诗，你请收发室来取吧。”收发室同志到他家时，他正好撂下笔。这首同样真挚感人的挽诗，第三天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

千里飞魂入梦惊，寒窗猛忆故人情。

五台烽火连天壮，四野战歌匝地鸣。

往事廿年归史传，心香一瓣吊忠贞。

新潮今日方高涨，革命长征又一程。

这首挽诗，对老战友的哀悼痛惜之情，溢于言表。回顾当年，瞻望未来，又充满了对革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的信心。他怀念战友，也正是为了并肩作战，像几十年来的风雨历程那样，跨上新的征程。如今捧读此诗，不能不沉痛地感到后面几句恰正是我们此刻缅怀作者本人的心情。

作为一名文艺编辑，我至今念念不忘的，是他那许多由于报纸宣传需要而写出来的急就章。

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一些重要的节日，报纸往往需要组织相应的版面，包括文艺副刊。这类约稿，时间紧急，常常不容作者反复推敲。因此有些作者视为畏途，也不愿意或不屑于撰写这类诗文。但也有不少作者是满腔热情地、诚心诚意地支持报纸的宣传，乐于写“遵命文学”的。邓拓离开报社去当北京市委书记以后，我们还保持着经常的联系，有什么要求，写封短简，或者打个电话，一般都是有求必应，按期交稿。元旦或春节的副刊版面，要登一首词，而且最好用《庆春泽》《东风第一枝》《春风袅娜》这类不常用的词牌（纯粹因为词牌这个“春”字），按说实在有点违反常情，不符合文艺创作规律。但是邓拓理解我们当副刊编辑的用心，总是欣然命笔。他的这些诗词未必首首都是艺术珍品，不朽杰作，但作者饱满旺盛的政治热情和火热的诗心，是我们经常感动和赞许的，到今天也依然值得大大发扬。急就章必定是粗糙的？未必。邓拓的这些“急就章”大都收在他的选集里，读者和评论家们可以自己来细细鉴赏。精雕细刻出来反而是苍白无力、缺乏生命力的作品，不也比比皆是吗？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就是对鼓手和歌手的召唤。

五

我要以特别浓重的伤感提到邓拓全部诗作中有非常意义、也让报社许多老同事至今难忘的一首诗：《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1959年初，他正式调离报社去北京市委担任书记处书记。2月的一个下午，报社举行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他在讲话时念了一首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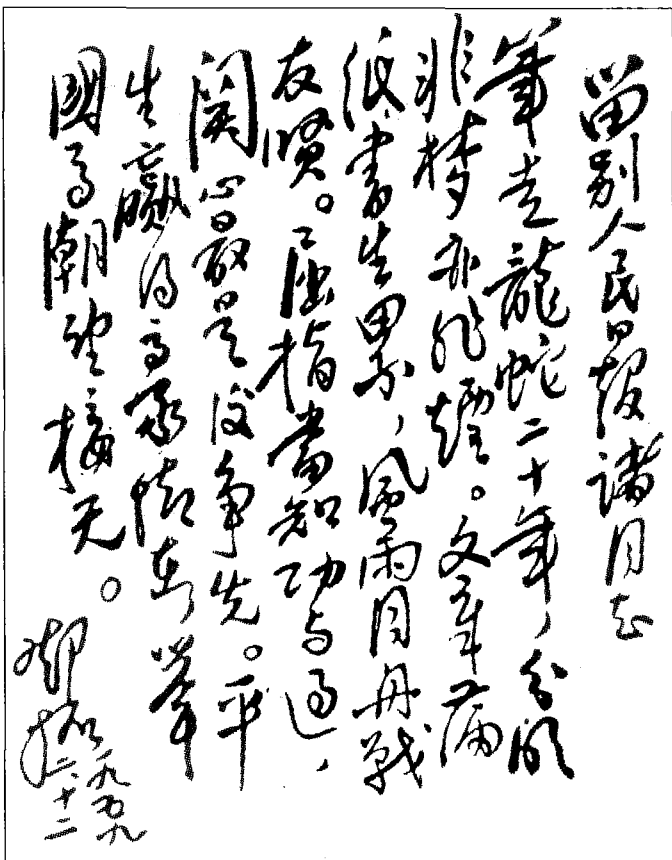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他一句一句念着，有的略加解释，如念到第三句时，他说前几天还有位老同志说他“书生意气未能无”，语气间有点自责，也有点自信，却一字不提两三年前那个“书生办报”的斥责。他在台上神态安详，感情真切，一如十年来多次在这讲台上作报告时一样，只是声调中略带一点惆怅情味。我们坐在台下，静静地聆听着，却是心事

如麻,感慨万千。我反复吟咏、咀嚼这首诗,尤其是“文章满纸书生累”这七个字,感到五味俱陈,这不是一般的应酬诗作,很有点像前人评诗中用过的“深情绵邈,寄托遥深”八个字。

欢送会刚散,报社内部小报《编辑部生活》的编辑就追到二楼邓拓办公室,他立即挥毫把那首诗写下来。两天后,小报登了这首诗,手迹也制了版,好心的编辑还将它印了许多单幅,许多同志将它压在自己办公桌玻璃板下,朝夕相对。几年后,狂飚骤起,大量的污水泼向邓拓的时候,林彪、江青一伙的党羽中有一名刀笔吏不知从哪里看到这首从未公开发表的诗,喜出望外,立即作为重要罪证引入文中,说它通篇都散发“反党情绪”。不少同志含着眼泪把这珍贵的手迹烧掉,也有个别跟人在文痞后边向它吐唾沫,但它却更深地留在许多同志的心头。一想到它,邓拓同志那清癯文雅的书生姿影,就来到我们面前;那略带福建口音的娓娓声调,就响在我们耳边,跟着也就都会有一阵揪心的悲痛。

70年代末,报社从车水马龙的王府井大街搬到东郊金台西路原北京机械学院旧址,是个占地三百亩的大院。办公场所顿时屋敞窗明、阳光充足,社长、总编辑的办公室自然比原来更加宽大。每天在大院树荫下来来去去,我常想要是邓拓活到雨过天晴、全民奋起的新时期,还不到七十岁,每天徜徉在绿树红花的大院里,坐在绿满窗前的书案前,读书撰稿、审阅大样,闲时挥毫泼墨,会平添多少灵感和诗情啊!抚今追昔,大家感慨良多。有些同志建议在编辑部楼前草坪上建一块邓拓的诗碑,镌刻他那首《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的诗,老记者陈勇进同志特别热心,四处张罗,并且具体找到了石料和石工,我也是竭力赞同的。可惜后来不知为了什么原因,终于未能实现,实在是件憾事。但是,他的丰碑立在所有《人民日报》老编辑、老记者、老工作人员心里,立在所有熟悉他、热爱他、仰慕他的正直善良的人民心里。2002年3月出版的五大本《邓拓全集》,凝聚了他毕生心血,不正是一块永放光辉的丰碑吗?“文字狱”的教训,更让我们刻骨铭心,那是由邓拓和成千上万忠诚正直的知识分子



1959年在人民日报社召开的欢送会上,邓拓即兴写就《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诗,图为邓拓手迹。

的生命、智慧和才华凝成的啊!

就在那次欢送会的当晚,在报社食堂举行一次小型会餐饯别。尽管他并没有远行,北京市委的办公楼同报社不过一箭之遥,但大家想到他不再能同我们朝夕相处,总是有点依依不舍。我端着酒杯走到他身边敬酒,邓拓从座位上站起来,握住酒杯笑着说:“我不会喝酒,你写一首诗给我吧。”我嘴里答应“好,我一定写”,心里也的确想写,而且步他的原韵,可是一直没有写出来。这一蹉跎就是二十年,二十年后写出来,却成了一首挽诗,再也不可能送到邓拓桌上请他“阅正”了。

血海冤沉不记年,星霜历历付云烟。

峥嵘气节追高范,锦绣才华迪后贤。

劲骨遭残宁愿折,蛾眉见嫉敢争先?

诗魂今日应无憾,泪溢银河注九天。

(2006年暮春)

(责任编辑 吴思)

带头上书反对毛、江婚姻的“党内海瑞”

——忆王世英同志

● 余宗彦

我是在延安马列学院第一班学习时认识世英同志的。当时,我只是个刚刚走进革命队伍的青年,而世英同志则是老革命。他长我十来岁,已经有十多年党龄,是位阅历丰富的老资格了。但是,他给我的印象却是像我们小青年一样热血方刚,冲劲不减。在他百年诞辰之际,我把他在延安时期给我印象最深的两件事和“文革”初期的一件事记叙下来,聊表我的怀念之情。

带头联名上书,反对毛、江结婚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在汉口经潘梓年、章汉夫介绍,于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取得介绍信,经西安于1938年2月底到延安,报名入陕北公学学习。可能是由于我在去延安前,曾阅读过《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无政府主义?》、《什么是工团主义?》等小册子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社会科学十二讲》、《人类进化论》等比较通俗的社科书籍,有一些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又由于我是由潘梓年、章汉夫介绍到延安的,政治上可靠的,因此,在4月间,我由陕北公学保送去延安马列学院学习。经过考试和中央书记处张闻天、康生谈话,我于5月进入马列学院第一班学习。

马列学院是我党为培养

理论干部、提高在职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而创办的。马列学院第一班的学员,既有入党多年、担任相当领导职务的老革命,也有不少像我一样加入党组织不久的年青人。当时大家吃住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学员之间非常平等,相互也无话不谈。世英同志是有家室的人,当然不可能完全同我们年青人一样整天在一起,因此有一段时间我同世英同志不像和同龄的年青人那么熟。但有一件事使我了解了世英同志敢怒敢言、疾恶如仇的个性。

延安不大,人们总有各种各样的消息来源和消息传播渠道。特别是受年青人瞩目和崇拜的党的领袖们的革命事迹和奇闻逸事,更是大家所乐道的。我上马列学院不久,就听说了毛主席要同

江青结婚的消息。世英同志自然也知道了这件事。世英同志在上海工作过,了解江青在上海时的一些不够光彩的事情,包括江青在上海从事进步工作时曾经被捕过,但在狱中表现不好;被组织营救出来后,她不再做基层工作,陷入了演艺界的争风漩涡,风流韵事不断;为争出风头,她在1936年蒋介石五十大寿时参加过为蒋献寿的演出活动等等。听到毛主席要同这样一个女人结婚,他坐不住了。

一天,世英同志向小组里的同志们披露了江青在上海演艺界的面目,并说,可能主



王世英

席不了解江青的情况,如果主席同这样的女人结婚,不仅有害于主席个人的威信和形象,也有损于我们党的形象。大家听他说江青在上海时被捕过,表现不好,后来又很风流,同时也看到江青到了延安打扮得非常特殊,和其他的女同志不一样,所以七嘴八舌地议论,说应该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反映情况,革命领袖不能和上海滩上的“戏子”结婚。特别是我们这些年青人,一向看不上某些到了延安就去找老革命的女同志,因为我们觉得她们这样做不是出于爱情,而是贪图虚荣,贪图享受。嫁了首长,她们就可以享受警卫员的服务,享受小灶。所以,我们这些自以为清高的年青人非常看不起她们。现在,江青这样的女人居然要嫁给毛主席,我们觉得她根本不配。

可能世英同志在小组里揭露江青的历史时,就已经决定给中央上书,如实反映江青在上海时的表现,尽力阻止江青和毛主席结婚。他在小组里说这件事,一是按捺不住自己的愤怒之情,一是想看看大家的反应。结果,大家的反应更坚定了世英同志的决心。很快,世英同志联络了他过去一起工作过的几位老同志,写了联名信,反对毛主席和江青结婚。世英同志的名字签在最前面,签名的还有陈雷、南汉宸等一些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可能是由于世英同志看我有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所以,他问我不敢签名,我说敢,于是我的名字也签在了后面。

当时,我入党不久,根本不知道党内斗争的复杂,把一切都想得很简单。在我看来,白的就是白的,黑的就是黑的,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党的领袖也可能犯错误,共产党员要敢于直言进谏。签名这件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我既没有什么犹豫,也没有什么思想负担。但世英同志毕竟是老资格了,他深知党内、革命队伍内的斗争也是复杂的,所以他并没有征求小组里其他同志签名,可能也是为了保护年青同志吧。

联名上书事件自然也传了出去,一时却没有结果。不久,大约是7月,由于抗战形势的需要,世英同志接受了去山西抗日前线的任务,后来又被派往阎锡山处的八路军办事处(那时已改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从他到马列学院学习到离开马列学院,前后不过两个月的时间。具有戏剧性的是,不久江青来到了马列学院我们这个一班学

习,这时她还没有同毛主席结婚。

由于大家知道了她和毛主席的关系,又知道了她的过去,所以都对她敬而远之。冷眼旁观,江青确实不怎么样。我们一起吃大灶,小组的人席地而坐,一个组只有一个菜一个汤,放在地上,大家围在一起吃。当时一个菜一般就是白菜或山药蛋,一个汤其实就是淡盐水,上面飘着几片菜叶,有几点油花。结果江青经常叉开双腿往菜碗前一坐,毫不客气地捞着汤里仅有的几片菜叶,还把仅有的一点油花也撇到自己碗里。由于她坐得离菜碗很近,弄得我们这些男同志都不好意思去夹菜,结果自然便宜了她。好在没过多少时候,因为江青来得晚,又没有什么理论基础,学习不够好,就被调到第二班去了。

没过多久,就听说江青还是和毛主席结婚了。看来我们的联名上书没有起作用。但是又听说,中央有决定,江青仅仅是照顾毛主席的生活,不得参与政治活动。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想,这大概与世英同志发起的联名上书有些关系,总算达到了部分目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世英同志没有看错江青。江青不仅政治品质恶劣,生活作风不好,而且心狠手辣,野心极大。可惜世英同志当时的上书没有起作用,不然“文化大革命”的危害可能会减小一些。

大胆上书中央,批评“抢救运动”

自从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地的青年知识分子大批投奔延安,改变了陕北根据地各个机关的人员结构。知识分子聚到一起,总是好发表议论,何况大家都感到延安是一个人人平等、精神解放的新天地,因此话题不论大小,不论是政治问题还是同志间的平等问题,都能引发一系列议论。整风运动就是要统一全党的思想,特别是要统一知识分子的思想。整风运动后期,延安开始的反“小广播”的斗争,主要就是针对知识分子们好议论、好评论的风气的,要求统一思想,舆论一律。反对“小广播”之后不久,又要求大家“向党交心”,一方面交待个人历史,一方面交待个人思想活动。“向党交心”要越详细越深刻越好。于是,有人是真正暴露灵魂深处的与党不一致的



七大代表小组讨论会,身后画圈者为王世英

思想和肮脏思想,有人则为了表现暴露深刻以便顺利过关,开始往自己身上泼脏水。这个运动的结果并不够实事求是,好像就是为了打掉知识分子的自尊和清高。

在这之后,由于出现了张克勤案,康生提出在延安国民党派遣的“红旗特务”多如牛毛,于是推动了由整风运动到“抢救运动”,即揪出革命队伍内部的特务和反革命分子,抢救被国民党拉下水的青年。

由于“向党交心”活动,使一些同志之间产生了知人知面不知心的感觉,所以抢救运动开始时,一天揪出很多特务,大家都信以为真。大家对延安有这么多种国民党特务深感震惊。随着特务越揪越多,同志之间相互都不敢信任了,议论也仅仅限于夫妻之间和极要好的朋友之间。不久,身边很熟悉的同志也变成特务了,自己也变成特务了,才明白根本没有那么多的特务。

当时我和我的爱人都在《解放日报》社。我爱人陈也竞的姐姐陈楚平是在南京搞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辗转来到延安的,一直被关押审查,所以陈也竞当然是有极大的特务嫌疑;而我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解放后我父亲被定为开明绅士),社会关系复杂,更有特务嫌疑了。由于我们都不承认是特务,于是成了被抢救的重点对象。开始我们感到冤枉和不解,陈也竞比较沉默,只是死不承认自己是特务;而我则比较冲动,经常和帮助的人争论,还帮别人辩护,结果我们成了顽固分子的典型。不久抢救运动在有些地方搞成

了悲剧,一些单位有不堪忍受“抢救”而自杀的,像在鲁迅艺术学院,自杀的还不止一个两个。但在有的地方到后来抢救运动则搞成了闹剧,比如我们所在的《解放日报》社,一些事情使我们感到又气又好笑:今天的积极分子,明天就可能被当成特务被斗争;而今天的特嫌,只要承认了自己是特务,不但第二天

就可以当斗争别人的积极分子,当转变的典型,还可以美美地吃一顿病号饭,名义是补偿思想斗争的痛苦。如果说开始的时候一些同志是由于经受不了没完没了的斗争,而被迫承认自己是特务,那么后来,同志之间相互都明白谁也不是特务,承认特务已经成为了一个走过场。以至于有的同志劝我,你承认了吧,承认了就没事了,不然连我们都不得休息地陪着你。还有的同志拿来枣饼给我吃,等我吃完对我说,你饼都吃了,总该承认是特务了吧。再到后来,比较认真的积极分子也开始懈怠了,于是,开斗争会归开斗争会,开完会积极分子与“特务”们相互拍拍肩膀一起去吃饭。

虽然抢救运动中发生了不少悲剧,也出现了一些闹剧,中央一些同志也有看法,但抢救并没有停止,上面的精神和处理意见还是很严的。由于我们夫妻两人一直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又由于我的家庭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我被定为特务。王世英同志从山西回到延安后,参加了审干工作,看到许多他所熟悉、了解的人,甚至和他一起从事过艰苦的白区工作的人都被定成了特务,他认为运动搞得过左了,于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写了《关于请求中央纠正抢救失足者运动过左问题的报告》,大胆站出来向中央反映运动过左的问题,并列举事实材料,为他所了解的被定为特务的人做担保。我就是他所保的人之一。

在那个时候能够出来保我,保其他一些同志,并且提出用党籍和脑袋担保,是需要勇气的。

因为他这样做很可能轻则被定为包庇坏人,阶级立场有问题,重则被打成特务头子,因为他在白区工作过。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勇气,我想一方面是因为他一心一意要维护党,维护党的形象,就像上书反对毛江结婚、维护党的领袖一样,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对同志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出于老革命对新参加革命的同志的爱护,出于对白区工作的同志的信任,相信由白区同志介绍去延安的青年,绝不是国民党的派遣特务,认为组织上应该相信和爱护这一批人。

世英同志的这一报告,不仅体现了他的勇气,体现了他对同志的深厚感情,还体现了他的政策水平。世英同志看到,在延安搞这样大规模的抢救运动,远远超出了干部审查的需要,不仅伤害了许多同志的精神和肉体,伤害了同志之间的感情,还会影响到其他根据地和白区工作,对党的事业造成破坏,实际上是做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反驳康生诬陷,力保革命同志

“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江青操纵“中央文革”,别有用心地利用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揪“叛徒”,使得在白区工作过的同志、特别是坐过国民党监牢的同志很多都被打成“叛徒”,致使一些同志没有死在国民党的枪口下,反而死在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批斗和监禁中。就是在这样的“红色恐怖”下,王世英同志不顾自己身处险境,不顾患有半身不遂之症,继续同江青、康生一伙斗争,尽力保护为党工作多年的老同志。我不仅听他讲过这方面的事,还碰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

“文革”初期,世英同志还担任着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一次,我到西单头发胡同33号世英同志家里去看望他,想和他谈谈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想法和看法。我去了不久,康生去了,我就回避了。事后,世英同志告诉我,康生这次去是谈全国妇联副主席章蕴大姐的问题的。康生一口咬定章大姐的丈夫李耘生是章大姐出卖的,要把章大姐打成叛徒,而世英同志也咬定章大姐是经受了严酷考验的好同志,她的丈夫是叛徒出卖的。结果双方争吵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康生是

喜欢到处卖弄他的才学的,他并不是第一次到世英同志的家里;而因为工作上的原因,因为要为同志申诉、打抱不平,世英同志也曾多次去过康生的家。由于世英同志刚直不阿,敢于直言,敢于上书,在延安“抢救运动”后期被毛主席称为“大老实人”,解放后又被大家称为“党内海瑞”,所以,康生对世英同志一直有所顾忌,而世英同志则经常不买康生的账。但是,这次争吵之后,可能由于康生已经窥到“文革”的底牌,所以不再登世英同志的门,并且也不再见世英同志。世英同志为了一些老同志的问题带病去中央党校找康生,康生明明在家,却让秘书挡驾,避而不见。事后,世英同志气愤地对我说,“好吧,你不见我,我也不见你,但是我有话还要说,我要对党对同志负责!”正是这种精神,支持着世英同志在“文革”中,在身患重疾、被迫害至生命垂危时,仍然想着要向总理反映真实情况,为坚持真理和正义不屈不挠。

后来才知道,世英同志写的材料都落到了江青、康生手里,使他们更恨死了世英同志,加紧制造莫须有的罪名迫害世英同志,致使世英同志于1968年春天被迫害致死。这一方面是江青、康生对于疾恶如仇的王世英同志的报复,一方面也由于他们对刚正不阿的世英同志无奈,因此指使手下干将往死里整世英同志,以搬开他们打倒老干部的障碍。可惜一身正气、一生为许多同志平反申冤的世英同志,却冤死于党内坏人之手。但是,历史是公正的。江青、康生最终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而世英同志无私无畏、光明磊落的言行将永远被历史所记载。

(王世英,山西省洪洞县人,1905年生,1925年加入中共,是参加过第一次大革命的老同志。他先后在上海、南京等地区从事党的情报、军运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抗日战争时期,同阎锡山的反共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及时向中央报告敌情,为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建国以后,他曾任山西省省长,以后在中央监委工作。“文革”中遭江青、康生残酷迫害致死。死时62岁。1979年中共中央为王世英平反昭雪。今年是他诞辰100周年。)

(余宗彦,1938年入党,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宣传部长) (责任编辑 杜导正)

工作着是美丽的

——纪念陈学昭百年诞辰

● 钟沛璋

十五年前，一颗新文学巨星在西子湖畔陨落。五四以来第一代著名女作家陈学昭走完她85年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病逝杭州。今年是她的百年诞辰。

陈学昭是我老伴陈敏的姑妈。虽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就见了面，后来因为远处两地，不久又先后被划为“右派”，很长时间没有来往。粉碎“四人帮”后，怀着崇敬的心情，我曾多次到杭州看望拜见已满头银发的长辈。只见她总是在伏案写作。在北京得知她西去的消息，直后悔未能在她生前多听听她的教诲。当她百年诞辰之际，展卷重读她生前亲笔书赠我们的一本本著作，真是感慨万千。

陈学昭为20世纪留下了14部散文集、3部长篇小说、6部短篇小说，论文、杂文、诗集、回忆录各一部。这浩浩荡荡数百万字的著作，生动真切地展现了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历尽坎坷沧桑，为实现自我、追求真理、探索人生真谛的心路历程。

陈学昭出生在浙江海宁盐官一个“诗礼传家”的家庭。父亲陈典常是清同治的秀才，毕生从事教育。长兄是清末海宁头名秀才，与他同时中秀才的还有后来成为民国国学大师的王国维。前年我去海宁寻访陈学昭故居，看到修缮得很好的王国维故居，就在近邻。陈学昭的四个亲哥哥，也都是从事教育的。陈学昭7岁丧父，母亲多病，后瘫痪。她幼年就是由兄嫂带大的。五四运动爆发，当时还是小学生的陈学昭与同学一起上街宣传反对卖国条约，抵制日货，接受新思潮的洗礼。但是在家，还是受男尊女卑传统的压制。这个

家庭对她来说是“极多的温柔，极多的爱，极端的刻板，极端的单调”。她看到旧社会的黑暗不公，不愿在家做“战战兢兢的小绵羊”和“寄居寄生者”，她写道：

“在这广大，空漠，扰杂的道路上，我踟蹰着，我徘徊着，到处都是不可扑灭的尘灰，到处都是难以选择的歧途……”

“我的心剧跳着，它奔出胸膛，直冲灰色的云天，飘摇在空间；我的热情燃着，火球似的烫着了这冷酷的大地……”

少年陈学昭15岁就远离家乡到南通、上海求学。在上海爱国女校读书时，参加进步文学团体“浅草社”。18岁参加上海《时报》公开征文《我所希望的新妇女》，得了第二名。在文章中，她讨论了妇女解放，认为妇女要自立，经济独立，才能有大发展，对社会有大贡献。她举了《娜拉出走》的故事，认为女性第一要紧的是做独立的人。

从1923年发表《我所希望的新妇女》后，陈学昭开始写作系列散文，给《妇女杂志》和一些报刊投稿。后来汇成第一本散文集《倦旅》出版。鲁迅曾经评述过“浅草社”作家们的创作特点，说：“那些觉醒起来的知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经一周三’，却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陈学昭的早期散文，以清新、优美的文字，把人物、情、景融为一体，在五四开创的白话散文星空中，陈学昭是一颗耀眼的新星。陈学昭也就此开始以卖文为生、追求独立人生的流浪生涯。

通过投稿，陈学昭结识了新闻界前辈戈公振

和章锡琛、周建人。又经介绍认识了茅盾和夫人孔德沚、鲁迅和夫人许广平、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得到许多前辈的鼓励和教导。《鲁迅日记》里就有30处关于陈学昭的记载。翅膀刚刚长成,陈学昭就决定远走高飞,去看看海外世界。1927年,22岁的陈学昭用自己的稿费筹得的旅费,独闯法国巴黎。在法国七八年的时间中,一面继续给国内写稿,当《大公报》的旅法特约记者,以取得生活和求学的费用。另一方面刻苦攻读法文,最后在法国克莱蒙大学攻取了文学博士学位。在这期间,她创作了《如梦》、《忆巴黎》、《欧洲杂记》等几部散文和《南风的梦》、《待婚者》等多部小说。她在法国结了婚,并有了一个小男孩。虽然如此,她还是感到身在异国,心系多灾多难的祖国和家乡的山山水水。1935年,她辞别法国的师友,登轮返国。

回到祖国,却是居无定所、报国无门,还是处于流浪的状态。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要求团结抗日的西安事变,第二年伟大的全民抗战爆发,极大地鼓舞了陈学昭,使她看到了希望。她看到能够领导抗战、求得解放的坚定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她决定全家奔赴延安。从此,她的人生道路也发生了根本的转折,从一个追求个人解放的个人主义者,转变为把个人命运与党和人民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革命战士。直到晚年,她与人谈起这个转折,心情还是十分激动,她说:“你们能理解我当时的心情吗?理解一个游子找到了党,找到真理时欣喜若狂的心情吗?如果说,我以前的追求多少带有盲目性,那么在以后,这种追求便自觉了,执着了。”

开始时,陈学昭是以重庆《国讯》周刊特约记者的身份进入延安的。她连续给《国讯》周刊写了许多通讯,向当时国统区的人民报告了她在延安真实的所见所闻,并结集出版了《延安访问记》。之后陈学昭就完全融入了这个革命圣地。在长达8年的岁月中,她或是当《解放日报》的编辑,或是在中央党校工作,或是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或是参加整风学习、大生产运动,都是全心身投入的。我曾看过历史纪录片中陈学昭在延安纺纱的片断。一个留法文学博士,手摇如

此古老、落后的纺车,似乎有点滑稽,但是陈学昭却干得十分认真。她说:“在纺纱中,我学到了一门实实在在的学问,这里除了共产党的书报上,古今中外的书本上都没有的,他教你耐心,教你不要主观,要切实切实,你要偷巧也是不可能……这就是毛主席指示我们的,老老实实的学问,实践的方向。”陈学昭纺出来的纱,都是一等的,还能换钱买一些糖果给她的孩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党中央决定派遣10万主力部队和大批干部挺进东北,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这时陈学昭也接到中央通知,要她从东北经苏联重返法国巴黎,去做国际妇联的工作。陈学昭欣然接受这个使命,并期盼着去巴黎与她在那里的亲密友人见面。经过颠簸的长途跋涉行军,到了东北。由于当时铁路不通和有人背后说她的坏话,出国被阻。后又接到通知:要她去张家口转北平,再到香港出国。到了张家口,得知那里将有大战,陈学昭决定重返延安。到了延安,发现延安也在外撤。陈学



1952年在龙井茶区体验生活的陈学昭



作者与陈学昭合影(1988年)

昭辗转陕北,渡黄河,在山西参加土改,之后又接通知重返东北,准备出国。到了哈尔滨,临出国前夕,又接紧急通知,决定不让她出国了。命运竟如此捉弄陈学昭。

在烽火连天的解放战争岁月中,陈学昭行军跋涉于东北、华北、西北解放区,身体受了严重的考验和损伤。在“常常一天一个地方的行程中”,陈学昭不但写了《漫走解放区》的15篇报道,为世人介绍了壮观的历史画面。还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她的名著《工作着是美丽的》(上卷),在大连出版。

陈学昭在法国留学时,常听法国姑娘爱说的一句话:“Qu'il est beau quand on travaille。”这句话直译为中文就是:工作着是美丽的。这句憧憬美好未来的话,给陈学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呀,一个女子要自立于社会,就要工作,以工作来创造未来,回报社会。从法国回来后,她就想写一部书,描述一个女子的奋斗历程。在延安时,她写了两万多字,感到不满意,撕掉了。有在法国勤工俭学经历、一贯重视知识分子的周恩来知道后,鼓励陈学昭说,应该写写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陈学昭在东北,一次过吉林,被邀参加一个知识分子座谈会。陈学昭发言的题目是《一个知识分子的道路》。一些人听了,鼓励她把它写下来。陈

学昭决心提笔重写《工作着是美丽的》。这样从东北回延安,又从延安回东北,一边行军一边写,没有桌子,就用背包当书桌,写写停停,停停写写,终于完成了上卷,是写到建国前的。

建国后,陈学昭谢绝要她在北京工作的挽留,坚持要回浙江,深入工厂、农村。她参加了土改,并长期生活在茶乡,创作了第一部反映我国农村土改的小说《土地》,和反映茶农生活的小说《春茶》。但是就在她自己的家乡浙江,她连续遭到了厄运。反右时,在一再动员发言之下,她说一句“省委对文艺工作不重视”,结果被突然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右派。陈学昭感

到无面目见父兄,不愿意给多年来了解她、关心她,她视之为父兄的中央领导和朋友写信。后来她见到邓颖超时,相抱痛哭,得知当时中央领导想阻止把陈学昭打成右派。但是因为当时省委有关领导说:“如果不把陈学昭划右派,我这领导做不下去。”这样,从反右到“文革”的二十年间,陈学昭一直过着非人的生活,受尽人间耻辱。如:晚上十点半扫厕所,早四点扫大街,白天挨斗。夺走因病痛用的拐杖,被迫趴在地上等等。直到“四人帮”粉碎才重见天日。陈学昭还是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完成《工作着是美丽的》下卷写作,在1979年出版。

陈学昭从她1924年发表第一篇作品《我所希望的新妇女》,直到1991年85岁去世前的封笔之作《可贵的痕迹》,长达67年的创作生涯,共为世人留下近三百万字的著作。奔腾汹涌的海宁潮,为人们送来了刚正不阿、百折不挠的钱江女儿陈学昭。她去世后按照她本人的意愿又把她骨灰撤回钱塘江。同时代的另一位著名女作家丁玲,在给陈学昭的一封信中,这样描绘陈学昭的一生:“你年轻时为一枝早熟的春兰,岿然挺立在石山上。闲花野草可以趁春风灿烂一时,而你却出淤泥而不染,亭亭玉立于晚秋。现在你已进入老年,却正如西子湖边的红梅,傲霜而怒放。”

这枝傲霜怒放的红梅，陈学昭瑰丽的一生，留给我们些什么人生启示呢？

一是如何生存。行为科学告诉我们，人的第一需要是生存，是活命。每一个想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特别是女性，都要面对如何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生存的权利。陈学昭少年时独立到上海求学，只有一身衣服。她就晚上洗了，白天还没有干就再穿上。一次回家，兄长看到她的铺盖包里少了一条被子（她借给留校的同学了），就要对她抡起拳头。她去法国留学既没有公费可得，又无家庭支持，完全得靠自己稿费。有许多时候只是用开水加面包度日。在延安大生产时不停地摇纺车，那不也是为了生存吗？反右时对陈学昭的决定是：开除出党，撤销一切职务，生活靠写作自给。能被这样的惩罚压垮吗？陈学昭晚年曾多次对人说：“过去我是为活而写，现在我是为写而活！”

一是如何对待恋爱婚姻。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恋爱婚姻。好的婚姻是幸福。坏的婚姻却是灾难。陈学昭在法国时有两个很好的男友。其中一位是蔡元培的儿子蔡柏龄。1948年陈学昭接到邓颖超转给她一年前蔡柏龄写给她的信，称陈学昭是“我极亲爱的女友”。他从当时在巴黎的中国妇女运动领袖蔡畅的口中，得知陈学昭尝尽艰辛，离了婚，男孩也死了，十分难过。听说陈学昭还要来巴黎，“这对我是多么的快乐，能够在这里再见到您是多么幸福！极亲爱的朋友，希望不久就能再见您！”两位男友对陈学昭都十分关怀、爱慕、呵护、对她都有很深的感情。但是陈学昭却同一个并不真心相爱，只是因为对方苦苦追求、出于对他怜悯的男子结婚了。之后不得不经受对方变心、迫害、离婚、丧子等等痛苦。周恩来在延安时曾对陈学昭说：“你没有什么错，只是在婚姻上做错了。”我想，就陈学昭这部分经历，就可写一部令人肠断的婚恋小说。

一是如何对待人情。人活在世上，就离不开人情交往。陈学昭是一位“人待我一尺，我报之以一丈”，真诚、直率、天真的人，一直到老了，都是如此。她赢得了许多真诚的友谊。从许多人写的真挚的怀念她的文字中，都可看到这点。但是她的直率、天真，却又尝够人心险恶之苦。陈学昭痛心体会到“要破坏一件事容易，要成功一件

事却千难万难，也就是说，做一件坏事没有人阻拦，但想做一件好事，却有重重障碍”。人之初，性本是善还是恶，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争论。只有人间和谐，才能人性向善。而我们许多年来，奉行的却是“与人斗，其乐无穷”。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做到，好事人人相助，坏事人人阻挡呢？

一是如何看待政治。现实生活告诉我们，人是离不开政治的。陈学昭在法国7年，天涯归客，投奔延安，认为是找到了真理，至死无悔。她在《告别延安》一文中写道：“让我永远学习毛主席思想。”建国以后，陈学昭的确就是按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指示的方向，深入工农进行创作。但是偏偏就是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文艺战线老战士，在她梦寐以求的新中国诞生以后，却一直处在厄运之中，遭贬谪、流放，受尽非人的待遇，非人的生活。陈学昭政治上错在哪里？有谁能像周恩来指出陈学昭婚恋上的迷津那样，指出她政治上的迷津呢？在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政治悲剧，我们应进行怎样的政治反思？

一是如何战胜疼痛。由于战争年代受到损伤，特别是反右和“文革”中遭受的非人摧残，陈学昭到晚年已一身是病。每天只能吃很少一点东西。特别坐骨神经痛，使她整日坐卧不安，写作极为困难。可是恰恰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学昭盼来了“迟到的春天”，可以自由写作了。陈学昭在这12个“迟春”中，写了12本文集，一年一本！直到她病危躺在病床上，还喃喃自语：“怎么办，怎么办”，想着她的写作。是什么巨大力量支持着陈学昭如此顽强地奋斗不息呢？我想还是她坚定的、今天已广为人知的人生信念：工作着是美丽的！

历史是前人，我们的前辈，不同年代的祖先，创造的。对凝聚前人智慧的创造，他们的经验教训，成功的或是失败的，后人要不断去认识、反思、总结，人类才能不断进步。认识历史，使人聪明。忘记历史，使人愚昧。例如使陈学昭遭受非人摧残的“文化大革命”，今年是40周年。我们是继续淡忘它，还是应该进行深入反思，这正是进步与倒退、聪明与愚昧的分界。纪念陈学昭百年诞辰，重读她的瑰丽一生，我深感有思之无穷的启示。

（2006年3月8日）

（责任编辑 致 中）

逆流而行： 杨度与君主立宪思想

● 傅国涌

1915年12月23日，蔡锷发动护国战争之前以唐继尧等的名义给袁世凯发了一份最后通牒式的电报，其中要求惩办十三个“帝制祸首”，即所谓的“十三太保”，除“筹安六君子”外，还有“七凶”（即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西南独立各省直到推倒帝制以后也坚持起码要惩办这几个人，但在1916年7月黎元洪、段祺瑞政府发表的通缉文告上，十三个人只剩下了五人，添上另外的三人，凑成八人，其余一律宽免。重读这个文告让人感到这真是一场闹剧。

被通缉的八人是杨度、孙毓筠、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加上顾颉、夏寿田、薛大可。榜上无名的人中，段芝贵是个小站出身的军阀，手里有兵，又有人力保；严复、刘师培是学者，也有人为他们开脱；胡瑛、李燮和是老革命党人，有人要求照顾；袁克定不算祸首不说，还为雷震春、张镇芳求情，当然他们也是带兵的军阀；袁乃宽姓袁，也可以不问。这样原来的十三个人中只剩下了五个人，大概觉得人数太少不好搪塞，就添了三个人。顾颉是约法议员、政事堂的参事；夏寿田是袁世凯的一个幕僚；薛大可则是一个报人，写过几篇帝制的报道，署名为“臣记者”。这八个人大致上都是：一、没有军阀背景的；二、不是国民党旧人；三、不是遗老重臣、硕学鸿儒。当然，北洋政府对他们也都是网开一面，通而不缉，所以八个人没有一个真的被捕的。

张勋当时曾通电反对惩办帝制祸首，他说：“君主民主，主张虽有不同，无非各抒己见，罪魁功首，岂能以成败为衡？”也算是为他自己一年

后的复辟事先辩护。

闹剧在历史上是经常重复出现的。仅仅一年以后，张勋率辫子兵进京，又和康有为一起演出了一幕复辟帝制的闹剧。在这次的内阁成员中，就有好几个洪宪帝制的余孽：袁乃宽是内务大臣、张镇芳是度支（财政）大臣、雷震春是陆军大臣、杨士琦是交通大臣。几乎都是要职，其中前面三人就是十三个帝制祸首中没有遭到通缉的，更显示出民国政治的荒唐，如同儿戏。

张勋事先曾邀请杨度进京参与复辟，被他拒绝了。张勋复辟的第三天，他向张勋、康有为公开发出通电：

“两公向以复辟主义闻于国中，此次实际进行，度以不自由之身，虽于事实毫无助力，然平生信仰君主立宪，姑于两公宗旨亦表赞同。惟尝审慎思维，觉由共和改为君主，势本等于逆流，必宜以革新之形式、进化之精神行之，始可吸中外之同情，求国人之共谅。且宜使举世皆知为求一国之治安，不为了一姓图恢复。至于私人利害问题，尤宜牺牲罄尽。有此精神胆力，庶几可望成功。而公等于复辟之初，不称中华帝国，而称大清帝国，其误一也；阳历断不可改，衣冠跪拜断不可复，乃贸然行之，其误二也；设官遍地，以慰利禄之徒，而宪政如何进行，转以为后，其误三也；设官则惟知复古，用人则惟取守旧，腐朽秽滥，如陈列尸，其误四也。凡所设施，皆前清末叶不敢为而乃行之于今日共和之后，与君主立宪精神完全相反。如此倒行逆施，徒祸国家，并祸清室，实为义不敢为。即为两公计，亦不宜一意孤行，贻误大局。不如及早收束，速自取消，……盖无程度之共和如

群儿弄火，而无意识之复辟又如拳匪之扶清，两害相权，实尤较缓。所可痛者，神圣之君宪主义，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

张勋复辟只有13天就宣告失败，杨度从1902年留学日本时就已接受的君主立宪思想在坚持了15年之后也彻底崩溃。虽然他忠于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见异思迁，不翻云覆雨，有他的政治节操，但至此他君宪救国的梦想完全破灭了。杨度内心的痛苦是自然的，他也认识到在共和国成立之后，再搞君主立宪已经是逆流而行。谭嗣同献身的戊戌变法本身就是悲剧，而他参与的洪宪帝制不过是一场闹剧，至于张勋复辟则是闹剧的余波而已。尽管如此，杨度对君宪救国确是真诚的，所以他还不失为是一个悲剧人物。

从代草《宪政考察报告书》到宪政公会

杨度1902年赴日留学，一年后，回国考取经济特科第二名。因有人指控他是康梁余党或革命党而被剔除，并遭到缉拿，被迫第二次东渡日本。1905年，被选为中国留学生总会干事长，剪去辫子。留日期间他接受了君主立宪思想，清廷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宪政考察报告书就是他代笔写的，内容包括东西各国宪政的比较、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实施宪政的程序等，对此后的预备立宪进程产生过一定影响。

1907年，他在日本创办《中国新报》，组织政俗调查会（后改名宪政讲习会、宪政公会），以设立民选议院为立宪运动的中心目标。

他在《中国新报》第一号至第五号连续发表长达14万字的《金铁主义说》，提出了“世界的国家主义（经济的军国主义）”学说，倡导政治革命，对西方的国会制、责任内阁制、人民的自由权利等介绍非常详尽，指出“人人可为权利义务之主体”。虽然显得有些乱，但还是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中国人所认识到的宪政思想提供了线索。他的理想是：

世界的国家主义——经济的军国主义——金铁主义（对内——富民 对外——强国）

具体途径为：

工商立国——扩张民权——有自由人民——政党

军事立国——巩固国权——有责任政府——国会

也就是说他主张由拥有自由的人民组成政党，产生国会，监督政府，富民强国。他的结论是“有政党以开国会，则政治革命之事以成”，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君主、国会、责任内阁三位一体的制度。

他还在《中国新报》等报刊发表了不少宣传君主立宪的文章，主张速开国会，国民自己负起立宪责任，反对开明专制，也不赞成由清廷立宪。他认为清廷是放任不负责任的政府，中国的前途应该寄望于人民。但他反对暴力革命，倡导政治革命，认为清廷是最易推倒的政府，舆论的力量就够了，以国民的能力促成清廷的倒台。杨度的君宪论“虽欠正确而意态温和，文辞婉约，不急不徐，引人入胜”，当时有不少人为他所吸引。近百年后再回头看他的这些主张，我们难道有理由



杨度

认为在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他的政见是一点价值也没有吗?

1907年10月,杨度回国奔丧。12月成立湖南宪政公会,起草《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请他的老师王湘绮作过修改后联络不少湖南名流联名上奏,开清末国会请愿运动的先河。当时的《东方》杂志说“国会请愿,首为国民发未伸之意者实为湘人”。

1908年春天,袁世凯、张之洞联名保奏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袁安排他在颐和园向皇族亲贵演说立宪精义,当场答复他们的数十条质询,极力主张开设民选议院,表示要主张到底,“生死祸福皆所不计”,引起朝野注目。这也是他和袁政治上结合的开始。

杨度不仅大造开国会的舆论,还在北京设立了宪政公会支部,号召三年召开国会。这一年梁启超的政闻社被禁止后,他继续在京城宣扬立宪、伸张民权。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和预备立宪时间表,以九年为期。杨度因此备受海内外舆论的攻击,虽然他公开声明对此他“未尝参与一字”,但他又为君权特重的规定作辩护,结果为立宪派、革命党双方所不容。在以后的国会请愿运动中他就销声匿迹了。袁世凯被黜后,他在朝廷也失去了靠山。

1909年他上奏请厘定君民的关系、行政立法的关系、中央地方的关系作为宪政实施的宗旨,没有引起什么重视。不久他就请假回乡,直到1910年资政院将要召集前才回京。在国会请愿运动热火朝天之时,他才打破了长久以来的沉默,奏请立即召集国会。他列席资政院开院大会,说明他参与起草的新《刑律》,是当时名动一时的三大演讲之一,让“听者神旺,记者腕疲”。

国事共济会

在1911年成立的“皇族内阁”中杨度是统计局局长,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来到袁世凯的故乡河南彰德,成为袁的一名幕僚。在随后的袁内阁名单里,他曾是学部次官(副大臣)。由于他与孙中山、黄兴和袁世凯都有密切关系,自认为可以居中操持一切。

11月15日,与汪精卫一起发起“国事共济会”,宗旨为“使以君主民主一问题,不以兵力解决,而以和平解决,要求两方之停战,发起国民会议,以国民之意公决之”。

以国事共济会君主立宪党领袖名义向资政院上陈情书,建议南北即日停战,召集临时国民议会来解决君主民主问题,清廷与革命军都应服从决议。

资政院曾三次集会讨论这一陈情书,由于议员们有分歧,更因为南方的反对,云南都督蔡锷就曾通电反对,《民立报》斥之为无聊的举动,所以没有结果。杨度后来自述这段经历“然其时全国鼎沸,选举难行,国会无由成立”。他们试图通过国民会议迅速解决时局的计划流产了,只得于12月5日宣布解散国事共济会,改变方式,直接与黄兴函电商讨南北议和问题。黄兴电复汪精卫,请他转告杨度,如果袁世凯能迅速推倒清政府,就推他为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因此加派杨度为参赞,随议和代表唐绍仪南下上海,秘密斡旋南北议和。目的就是希望利用杨度和黄兴的关系通过他们所带的国民会议方案。

按照杨度的设想,只有经过国民会议,袁世凯才不会背上篡夺的恶名;只要袁取得中国最高统治者的地位,暂时不必计较总统还是皇帝的名义。他离京南下前,就在京、津向各方面说明,到上海后还派人向各省游说:即使用总统名称,袁世凯仍可以为拿破仑,使共和再为君主,不料一语成谶。

1912年3月,他和北京新闻界人士、一些原资政院的议员成立了共和促进会,转而支持共和。有人说他如果真的认为共和不适宜于中国,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和梁启超一致,力持君宪主义,却是推倒清廷的内幕人物?他后来解释是满、汉情感既裂,已无弥合的余地,只有另造君统。又说“予在大总统幕中,亦不得已牺牲予平日宗旨,勉强与赞助,以免一时危亡之祸。”他的政见前后是有过一些变化,但大体上说他还是个君主立宪的信奉者。

《君宪救国论》

1915年3月,杨度写出《君宪救国论》托同

学夏寿田(为袁幕僚中三要角之一,是杨度举荐的)密呈袁世凯,因为他早已通过这位同门窥见袁称帝的野心了,所以才投其所好,想一言为天下先。袁阅后说:“姑密之。然所论列,灼见时弊,可寄湖北段芝贵精印数千册,以备参考。”还亲笔写了“旷代逸才”四字,由政事堂制成匾额颁给杨度。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惜换得假共和”。在中华民国成立的“共和万岁”声中,袁世凯窃得政权,建立独裁统治,公然复辟帝制。图为袁世凯在天坛祭天。

《君宪救国论》分上、中、下三篇,以对话形式阐述“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的观点。他称其为“救亡之策,富强之本”,而将民国以来的政局混乱,统统归结为共和的弊端。他认为人民的程度还不知道共和为何物,更不知法律、自由、平等是什么,贸然由专制直接进入共和,只能是富国无望、强国无望、立宪也无望。中篇着重提出了政治继承权的问题,认为只有君主立宪才能防止出现为争夺元首地位而发生内战。下篇是讲“假立宪,必成真革命”,详细列举了清朝假立宪导致灭亡的例子,指出必须真立宪,才能以正当安国,以诚实取信于民,“政府所颁,一字即有一字之效力,乃为宪政实行”。

其实,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和袁世凯之间的距离十分遥远。这才能解释杨度一直未得到重用的真正原因。他率先提出君宪救国论得到袁的赞许,只不过是起到了为袁称帝造舆论的作用而已!在共和都已出现的中国,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诚然是历史的逆流,但这个人不像一般政客毫无政见,一切从现实利害、升官发财这一角度考虑问题,其中也确实包含了他的某种理想在内。

筹安会

8月,袁世凯的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在《亚细亚报》公开发表《共和与君主论》,其实已在《君宪救国论》之后。不久杨度等六人发表《发起筹安会宣言书》,此后帝制论甚嚣尘上,短命的洪宪帝制呼之欲出。

这六人中有四人曾是革命党人,孙毓筠和杨度关系密切,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曾潜入南京从事革命活动,被捕下狱,杨度驰书两江总督端方营救过他。辛亥革命后出任过安徽都督,也是个风云人物。胡瑛与宋教仁是少年朋友,16岁就参加华兴会,萍醴浏起义失败后被捕下狱,在狱中还指挥革命,豪气干云,是个传奇式人物。武昌起义后他一出狱就自立为武昌军政府外交部长,后来还在烟台当山东都督;李燮和参加过华兴会、同盟会、光复会,是后期光复会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上海组织光复军,对上海独立贡献很大,孙中山任命他为光复军北伐总司令。

刘师培是著名学者,精研汉学,参加过同盟会,编过《民报》,鼓吹无政府主义,也出卖过革命党人。严复学贯中西,以翻译《天演论》等西方著作而闻名于世,是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与

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交情很厚。事后他说自己列名发起人,事先并不知道。只是杨度和他纵论时政时,他曾表达过自己的见解。不久,报上出现筹安会的发起书,他也在其中,他称这“何异拉夫政策!”人们似乎不太相信他的辩解,对这位中国留学界先觉的失节表示了极大的遗憾。

六人中杨度是个关键人物,他对君主立宪的信念一直没有放弃过,从留学日本时期到洪宪帝制的破灭,他的政见基本上是一贯的。所以相比之下,臭名昭著的“筹安六君子”中还是他比较可以理解。

杨度在有一万八百十一人签名的《筹安会请愿书》中提出国体问题应立即付诸民意机关表决,再以国民会议通过宪法。比起辛亥革命之初主张由国民会议来决定国体有所变化,但力主以民意方式促成帝制则是一贯的。

他踌躇满志地对记者说:“君主立宪本为予生平唯一之政见”,“与从前国事共济会之宗旨略同”。“至于鄙人宗旨,于‘君主立宪’四字,一字不可放松。立宪而不君主,必不足以固国本,鄙人所反对也;君主而不立宪,必不足以伸民权,亦鄙人之反对也。”表示他言行一致,从清末以来就抱定这一宗旨,十几年如一日。只要君主立宪成功他本人无论在朝在野,都将为这一目标而努力,“为一生之责任”。

事实上,筹安会出笼后,梁士诒紧接着就策划成立了全国请愿联合会,筹安会也就门庭冷落车马稀了,10月杨度就放弃了筹安会这个牌子,改组为宪政协进会,确定“此后本会方针,应注重立宪问题”。筹安会一共只存在了两个月。

书生气十足的杨度却自信自己有开创之功,新朝宰辅非他莫属。当袁世凯赶制龙袍时,他也向远隔万里的巴黎订做首相新装。新装还没制成,洪宪帝国已经夭折,这些衣装至今还存放在巴黎。

毕竟是书生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说袁世凯骂杨度是“蒋干”,蒋干在《三国演义》里是个容易受骗上当的书生。杨度的老师王湘绮称他是“书痴”,在《湘绮楼日记》里说:“弟子杨度,书痴自谓不痴,徒挨一顿骂耳!”(这则日记写于袁

世凯称帝时)他自己写诗也自称书生,有“书生襟抱本无垠”等句。胡汉民说他在日本留学时“读书甚勤”。还有人说他“有口才,一言既出,四座生风。”这些材料都提供了一个书生气十足的杨度形象。

今天我们再读他的《湖南少年歌》与《黄河》歌词,依然能够感受到少年书生的意气风发。《湖南少年歌》是1903年在《新民丛报》发表的,传诵一时,对湖南青年影响尤大。诗中自述“归来师事王先生,学剑学书相杂半”,号召“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陈独秀曾在《新青年》上发表过一篇《欢迎湖南人的精神》,其中也引用了两句因此而脍炙人口的诗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他能文章,有辩才,精通各国宪政,是个难得的人才。但他的身上缺了些英雄气,多了些书生气。在和梁士诒等形形色色、老谋深算的官僚、政客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窥见他的某些书生本色,在袁氏当政的民初政坛上他也从未出任过什么有实权的要职。1913年9月,熊希龄组织“名流内阁”,原拟杨度出任交通总长,杨还想推荐蔡锷为陆军总长,但梁士诒从中一作梗就没有成功,让他改任教育总长,他则以“帮忙不帮闲”为由拒绝了。袁世凯也仅仅授以参政院参政等闲职。所以纵观民国以来的几年,他是颇为失意的。

和梁士诒比较,他们同时考取清末经济特科,梁是第一名,他是第二名;在清朝最后的袁世凯内阁里,梁是邮传部次官,他是学部次官。但进入民国以后,梁一直春风得意,手握实权,是袁世凯的得力助手,在民国史上以“财神”著称。他们的仕途之所以完全不同,其原因正在于,梁八面玲珑,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杨则才气纵横,雄辩滔滔,仍然不脱书生气。梁城府很深,从不流露真感情;杨容易动真感情,对袁世凯他是真心想感恩图报的。

杨度组织筹安会,梁士诒马上授意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与筹安会争妍斗胜,甚至比筹安会更直接,声势更大,十三太保中的显赫人物如段芝贵、袁乃宽等都参加他的联合会。如果说筹安会还只是以研究政体相标榜,请愿会则是一个实际劝进的团体。

在杨度为同时代、不同政见的友人所写的挽

联中,我们也依稀看见他作为书生的一面。他对朋友、老师的情感,他的才华都毕露无遗。他的老师王湘绮说他“憨直”,不圆通。曾将他与蔡锷比较,认为杨度才高气傲,以澄清天下自许,往往是考虑不周,急于求成;蔡锷智虑深沉,胸怀大志而不露锋芒。如果蔡锷能与杨度合作,他们的成就不可限量。

蔡锷与杨度虽然政见不同,却也算得上是知己。他俩同是湖南人,在日本留学时“与杨度最善”,休假日必到杨度家吃饭。他所抱的军国主义,必须假手雄才大略的君主,才能有所作为。因而每与坚决主张君主立宪的杨度论政,“如水乳之调融。”

1913年10月,蔡锷“自请解兵柄为天下先”,到北京后“与杨度过从甚密”。当帝制论出来时,袁世凯对蔡锷甚忌,派人监视,但蔡“夷然如平日”,杨度等也说和蔡锷“有乡谊,且持论夙合,必无他”。“袁疑稍释”。蔡锷在他的遗嘱里自述平生之志,并为杨度开释,对他作了较为中肯的评价:

“本人少年时,美东邻强盛,恒抱持军国主义。是项主义,非大有为之君,不足以鞭策而前,故政体孰善,尚乏绝端之证断。后因袁氏强奸民意,帝制自为,逞个人篡窃之私,不惜以一手掩饰天下人耳目,爰申正义,以争国民人格。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

当时杨度作为“筹安六君子”之首正被通缉,所以这份遗嘱就隐而未发,不知杨度是否知道,但他在得知蔡锷的噩耗后写过一个挽联,极尽悲怆之至:

魂魄异乡归,如今豪杰为神,万里山川皆雨泣;
东南民力尽,太息创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

1916年4月10日,洪宪帝制行将落幕,杨度备受各方攻击,他在向袁世凯请求辞去参议院参政一职的辞呈中说:

世情翻复,等于瀚海之波;此身分明,总似中天之月。以毕士麦之霸才,治墨西哥之乱国,即令有心救世,终于无力回天。流言恐惧,窃自比于周公;归志浩然,颇同情于孟子。

文中把自己的心迹比喻为“中天之月”,清

澈明亮。又以德国毕士麦(今译俾士麦)和古代的周公、孟子自况,依然是那么高傲、那么自命不凡。20日他发表通电,表示“君宪有罪,罪在度身”,如果杀他有补于国事,他万死不辞。而且到了这时候他还反对要求“元首退位”。

5月1日,他对《京津太晤士报》记者说:

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政治主张绝不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孙、黄主张共和,我则著论反对。我认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违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除君宪外,别无解纷已乱之方。……梁任公是我的老同志,他一变再变。……国体问题,我应负首责,既不诿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且退一步言,政见不同,亦共和国民应有之权利。

记者说他“态度安闲,辞意坚决”。

杨度终生都没有忘记袁世凯当年的知遇之恩,虽然他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但他的君宪救国的抱负只有通过袁这样的旧权威才能实现。在袁的身边他一再劝他容忍革命党;劝他信任蔡锷,他曾极力向袁世凯推荐,“力言蔡锷主持建军工作”,希望他来改造北洋军;劝他以诚待人,施行真正的宪政。他毕竟是个书生。

袁世凯也许认为他书生误事,临终还说:“杨度误我!”杨度则在挽联中说:“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洪宪帝制的失败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以佛经自娱,在出世的超脱的佛学中重新思考人生、反省过去。以“虎禅师”为名写了不少论佛的杂文和偈语,其中有这样的话:

“无我即佛;一心无二即佛;自由平等即佛。随偈入世,满目疮痍,除救世外无事,除慈悲外无心。愿作医生,偏医众疾。”

看来他在佛学中领悟到的还是救世,所以他的佛学不是出世的,而是入世的。

临终前几天他还为自己写了自挽联: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
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责任编辑 吴 思)

中国社会名流皈依佛教现象剖析

● 吴江

前年五月间我游杭州灵隐寺,蒙接待的法师赠董其昌手书《金刚经》(影印)一部加《灵隐寺志》一套。《金刚经》自唐以来即为佛教的第一经典,其译文深奥难懂,而其意无非是说世上一切事都是无常的,如梦似幻。即所谓“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按:佛教所谓“色”是指形式上看起来是实在的事物)。回京后凑巧得到冯其庸兄赠送的他费五年之力重校评批的《红楼梦》一部,印刷装订都十分精美,我接受这一贵重礼物时曾指着案头的《金刚经》开玩笑说,贾宝玉出家时的第一课恐怕就是诵念这一部经典了。

当时我还正在翻阅杭州佛教协会出版的两本《杭州佛教》(季刊),也是灵隐寺法师赠送的。内中提到佛教居士的问题。过去不少社会名流成为佛教居士乃至出家为僧的故事我略知一二,例如在清代,本有志于社会改革的名士如龚自珍、魏源等最后都皈依了佛教,并受菩萨戒;民国,还有像苏曼殊、李叔同(弘一法师)这样的名流出家为僧。现在,刚逝世不久的梁漱溟和赵朴初居士是尽人皆知的,梁漱溟先生非正式佛教徒亦非居士,但他年青时一开始研究的就是印度佛学,并曾一度想出家为僧而未果,后来成为社会活动家但仍称自己的思想是受佛教的启发,并终生素食不辍。

这些事过去都留在脑海中来不及思考。不知怎的,这次碰到上面的事,脑海深处的这些记忆都跳了出来,促使我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并找一些谈佛的书

来读,汤用彤的,梁启超的,赵朴初的,方立天的,等等。我想,这大概也和人的年老有关,年青人是不大会去想这个问题的。

我以为,这个问题须从中国传统的思想和学术的大背景说起。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系统。儒、道两者是中国本土的,释(即佛教)则是从外面传入的,传入不久势力增大。鲁迅在《而已集》一书中曾说过,中国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而不憎道士。道教在汉唐时期确曾很有势力(这首先是因为唐朝皇帝攀老子为自己的始祖),元朝时也吃香过一阵。而且,中国古代有一个时期,士大夫的思想根基不外儒、道两家,有人在朝则为儒,在野则为道。但道家势力终于逐渐衰微,古代中国思想界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儒、释的天下。而作为中国主导思想的儒学,自孔孟之后,经历了两大变化:一是汉代的引法入儒、儒法合一,或称“内法外儒”,开创了所谓“儒学独尊”的局面;再就是宋代理学家们的援佛入儒,这更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件大事。本来,隋唐以降,由于长期战乱,佛教的禅宗思想鼎盛,“成佛”、“养神”、“修持”的出世思想弥漫人心,统治阶级中人物亦不免。

这里就先简单说一说佛教思想。

佛教源于印度,其创始人释迦牟尼所处的时代和中国孔子的时代约略相当。古印度人认为人生是苦,是一种迷误,佛教就是要灭苦,使人“觉迷”,它对人生是否定的。佛教出现各不相等的教乘,主要是小乘和大乘。小

乘讲三句话：“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涅槃即解脱之意。但小乘着重于个人的解脱，是“独善其身”。大乘在小乘的基础上形成，除了那三句话之外，还讲两句，叫做“不舍众生，不住涅槃”，主张不生不灭，它要普度众生，人人皆可成佛（人人都“觉迷”），可谓“兼济天下”。乘借喻为船，小乘如小船，只能一人乘坐，一人超度；大乘如大船，不仅要超度自己，还要超度大众，而且只有大众能度，自己才能得度。故小乘称罗汉道，大乘称菩萨道。虽说有这样的区别，但大致说来，佛教是以灭苦为初因，以出世为手段，以“觉迷”为目的。佛教的所谓“佛陀”，即智慧之意，而智慧与否就在于能否“觉迷”。汤用彤先生说：印度的宗教是“因理及教，依教说理”，就是说，佛教除它的一套迷信的修炼程式外，还有它的一套学理，有它的逻辑思维和哲学思想，这为其它宗教所不及。如佛教不讲造物主，不讲神，更不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佛教认为万事万物皆由因缘和合而起，而因缘，用现代话来说，就是关系和条件。条件变了，缘尽了，事物也要变，所以人生须“随缘”。梁漱溟在他最后写的《人心与人生》一书中，称佛教是“最高级的宗教”，是“唯一圆满之出世法”。梁启超说：佛学实际上“乃智信而非迷信，乃人世而非出世，乃兼善而非独善”。孙中山也说：“佛学乃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辅科学之偏”。甚至大科学家爱因斯坦

也说：“未来的宗教应该是宇宙性的，它超越一个人化的神，无需死板的教条与教义，包括自然现象和精神领域，集一些自然的和精神的经验而成一体。佛教符合这些条件。”从学理上说，这要算是对佛教的最高评价了。当然一般人看佛教达不到这种水平。

佛教很早传入中国，它和儒学（且不说道教）的交流与冲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逐渐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禅宗、天台宗就是中国化了的佛教），为中国群众乃至许多士大夫所接受，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之一。儒学是不是宗教？这个问题是有争论的，我同意梁漱溟的说法：“孔子不是宗教，可是历代的皇帝都把它好像当做宗教一样，所以有孔庙，念书人都要拜孔子，本来不是宗教的孔子，却把它打扮成孔教。”（见《梁漱溟晚年口述》，东方出版中心，第288页）那末，儒学是什么呢？简言之，儒学是中国封建伦理政治学说，或曰纲常名教，是封建宗法等级思想的表现。佛教认为人生就是苦，因此其主旨在灭苦。儒学则是要发现人生的乐趣，“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宋儒就专标榜“寻孔颜乐处”，这也是儒学区别于佛家的一个地方。佛教在中国传播，最重要的就是要闯过中国的纲常名教这一关，还有“沙门应否敬礼王者”，以及适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套。东晋以降，佛教渐渐适应中国环境，也就渐渐兴盛起来，尤其在中国江南一带，俨然成一新文化（我

所游的灵隐寺也是那时开始建造的）。到隋唐，佛教达到了鼎盛时期，许多士大夫都成了佛教信徒或佛门居士，草圣怀素也是一位和尚书法家。我读过的一本《佛教与晚唐诗》（作者胡遂）就记述了晚唐那个不太平时诗人多与佛家打交道并以禅意入诗，慨叹那个时候人生诸苦中最大的苦是“求不得苦”（“求不得苦”是佛教八苦之一），如“求不得”功名之苦，“求不得”金钱和女人之苦，等等。晚唐的大诗人许浑的那两句名言即“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就是悲叹当时的乱情，一切由盛变衰，揭示出一个“空”字的无情。

到了宋代，儒学为了解决自己的危机，重建儒学的权威，吸取佛学思想中可资自己利用的东西，主要是建立心性之学，将心、性、理三者联为一体，以孔门的心法为基础，仿照佛学的本体论（真如）建立自己的“理”的本体论，而孔门心法和禅宗的所谓佛门心性说原是大体相通的，都是向内追求真理，不过彼此所谓“真理”的内容不同而已。佛家讲“苦”、“灭”、“空”，讲“人生无常”，因此最好是“无生”。孔门讲“天地之大德曰生”，讲人生不是苦的，而“立人之道，在于仁义”。它特别把佛家的“灭欲”接过来，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佛家“灭欲”是为了自己求解脱，宋儒讲“灭人欲”则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压制人民的正当需求，其为害就大得多了。这个影响是巨大的。总的说，宋儒家（即理学）不仅在本体论

方面而且在心学方面也接受佛学的影响,明代批判宋理学的黄绾说:“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

因此,宋以后中国读书人所读的并据以应科举考试的书(“四书”),大都是由禅入门的书,不论今文经学之书也好,古文经学之书也好。今文经学是冲击古文经学的,在社会停滞期间或转型期间常主张改革。龚自珍和魏源是同时代人,即鸦片战争前后的人。两人都是今文学家刘逢禄的弟子,林则徐的挚友。龚自珍呼吁改革,猛烈抨击时弊,其诗文为以后的康梁维新派所推崇。魏源则和林则徐一样是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前驱人物之一,他编《海国图志》,首次在中国传布外国的地理历史知识,并翻译西文书籍,传播西方思潮。但这两人最后都皈依佛门,受菩萨戒,成为虔诚的佛门居士。其原因何在呢?除当时儒释通融的思想大背景外,主要原因在于时政腐败,保守势力猖獗,任何改革主张都难以实现,觉得前途无望,因此最后在愤愤不平之下遁入了空门。“看破红尘”,此之谓也。

如果说,龚自珍、魏源两人在当时的情势下遁入空门这件事还比较容易理解的话,那末,苏曼殊、李叔同两人的遁入空门就有些令人费解了。因为一则,此时已推翻帝制,进入了民国,算是改朝换代了(以绘画著称的苏曼殊在民国以前当他十二岁时就已削发为僧了)。当然民国后也有一些封建头面人物和封建军阀在失意或失

势后成为佛门居士,这大抵属于装模作样,不值一提。但苏曼殊和李叔同两人都曾留学国外,接受新学,并都有风流浪漫名士之誉,擅诗文,懂艺术,李叔同更是中国现代戏剧和音乐美术的创始人。他们怎么会走上信佛当和尚的道路呢?

原因当然是复杂的。这里单说李叔同。李叔同正式出家当和尚成为著名的弘一法师,是在1918年,在苏曼殊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当时李叔同在国内的文化艺术界已经很有名气,欧阳予倩等还是在他的带领下在戏剧界出道的。他抛弃家庭,抛弃数十万家财,抛弃两个妻子(一个是结发妻子,一个还是刚从日本带回来的异国妻子),于1918年夏在杭州大慈山虎跑寺出家。“金刀剃尽娘生发,除却尘劳不净身”(剃度时念的偈文),毅然过起云水生活来了。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读过一本写弘一法师生平的书(名《悲欣交集》,陈慧剑著),此书没有正面分析清楚这个问题,只说他具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明知难以修成也要刻苦修炼,种植善根。弘一法师自己这样说:“有一点,我以为无论哪一宗哪一派的学僧,都非深信不可,那就是宗教的基本原则,就是深信善恶因果报应的道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同时还须深信佛菩萨的灵感。”弘一法师的修炼是极苦的,他“以生当死”,谢绝外缘,下死功夫念佛。他更以“持律”严谨著称于当时佛界。书中许多处透露出弘一法师对

于社会上人的追逐名利并为此你争我夺、贪婪作恶的行为深为不满和厌恶。

李叔同的出家为僧和当时的时局也当然大有关系。民国后,中国不但没有强盛起来,反而政治更不安定,国家更不统一,军阀割据,内战不断,民不聊生,因此所谓共和完全是一个虚名,乱局甚于清末。这时不要说像李叔同这样的人了,就是比李叔同在政治上思想上还要进步一点的戊戌维新派人物严复(他在维新活动时期是宣传西方文化思想、提倡西式教育、批评宋儒学最有力的人物),民国后,也因政治腐败、国家衰乱日甚,他的思想几乎全面倒退,由维新派退回到帝制复辟派,由反宋儒学退回到推崇宋学,推崇“孔门圣学”,说“窃尝究观哲理,以为时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严复说这话的时候,恰当李叔同出家不久。史料虽没有说严复也有出家为僧的念头,但严复的重归于宋学也就等于说他重新倾向于“禅”。事实上,严复在其晚年与佛门的交往唱和是不少的。

这里还可以提一件事。当抗日战争起,郁达夫曾在福建鼓浪屿访问弘一法师,并有诗赠法师。郁诗中有“中年亦具逃禅意”句,说明郁达夫在中年时期也曾有“逃禅”之念。由此可见当时像弘一法师那样的“逃禅者”的知己是不少的。

到了1949年革命后的新社会,情况当然大不同了。就佛教本身说,信教自由列入中国宪法,寺庙依旧遍布各地,“文

革”中虽曾遭遇过一次惨重的“法难”，但恢复很快。尤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在为金钱拼搏中更加相信命运的摆布，不少寺庙的香火比过去更盛，朝佛的善男信女成群结队而来，其中有普通的老百姓，有珠光宝气的富商巨贾，也有坐着官车争着前来朝拜（尤其在岁首争着前来烧头炷香）的达官贵人们（其中不乏贪官污吏而欲拜佛求平安者）。这里就隐伏着社会和佛教本身的某种危机。不少地方还发起了佛教旅游，青烟一缕广结“善缘”。但是真正属于社会名流的人选择“出家”的却已很少听到了。我们的社会并不是没有苦难，尤其在过去各项“运动”中挨整受苦的人很不少，这些人中有选择自杀的，有走其它绝路的，却未闻有选择“出家”的。右派分子中曾有一个较出名的文人叫储安平，他被打成右派后失踪了，遍寻无着，各种传闻中虽也有“出家”的说法，但至今并未证实。

那末，今后社会是否还会出现社会名流或知名人士“出家”为僧或成为佛门居士之事呢？我看这仍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科学无法穷尽宇宙的奥秘，因此，必有宗教存在的空间，而且宗教也必将日益成为宇宙性的——诚如爱因斯坦所说，佛教最具有这种条件。另一方面，和其他宗教不同，佛教的特性是它不仅仅是单纯的信仰（说信仰也是泛信仰主义），而是有它自己的一套比较细密的学理，而且与社会状况和人生问题（尤其在生死、祸福问题

上）有较多的联系。梁漱溟先生在他的《人心与人生》一书中所说的话是有道理的，他在书中甚至还引用了费尔巴哈的话。他说：“生死、祸福，事最莫测难知，而事之最牵动扰乱人的感情意志者恰恰亦在此。费尔巴哈有绝妙的话说：‘若世上没有死这回事，那也就没有宗教了。’”而佛教正是在“了生死”这件事情上最下功夫。

生死祸福善恶患难等问题的存在，加上社会动乱不宁、统治不得人心、最易牵动人的感情意志，乃至促使宗教思想蔓延。在中国，无论在文化上，在人们信仰习惯上，佛教最易迎合人们消极失落的情绪，只是如今在佛教已作为一种合法的社会团体与当局不能不发生一定关系的情况下，凡有一定声望或一定社会地位的人要想自由出家为僧并不那么容易。但有一种情况必须注意，现在佛教本身也正在发生变化，有人称之为“佛教的现代化”。并举出例子：在某些信奉佛教的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许多佛教徒已是高层知识人物，留学的博士也不少，他们从事教育等服务社会的公益慈善事业（不限于办神学院），成效显著，因此信徒也随之增多，他们日益溶入公民社会而成为其中特殊的一部分。

在我们的社会，事情可能也会发生同样的变化。只要佛教的活动本身不脱离正确的社会方向，爱教而又爱国，并与人道主义精神相契合，共同为世界和平而努力，这样除了佛教界本身会出现一批社会知名人

士外，也可能吸引某些社会名流或知名人士为之尽力。在今天的状况下，有人出家修行或当居士并非是为了去寻找“出世”和“剃度”的精神寄托，或去追求“芒鞋破钵随缘化”那种受苦境界，这只是浅层次的，而可能是为了跳出污浊，跳出某些政治恶斗，求得心地平静做一个虔诚向善的人，甚至为驱除人心中的种种贪欲邪念、灭掉人性中天然具有的某些野兽因子，作出贡献。因为人是从动物界进化而来，因此人性中总或多或少地会含有一些兽性因子，这是恩格斯所说的话，而这话是符合科学的。佛教修炼的重要目的之一，我看就在于灭掉人性中所具有的某些恶的野兽因子（包括权力野心、各种贪欲邪念等），使人成为真正纯粹的人，真正为社会做好事的人，真正为世界和平而尽心尽力的人。

佛教在中国经历了千辛万苦才实现了中国化，现在又面临着现代化的任务，而这是使佛教宇宙化的关键性一步。可惜目前在我们宗教界尚缺乏这种有前瞻眼光的人才。但我相信时代将会把他们培养出来。

当我说上面这篇话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不久前离世的赵朴初居士。赵朴初之死，并非是他已成了“佛”或神，也不是像佛教所说的世间又多了一个“中阴子”，而是说，赵朴初居士的一生已为做一个真正纯粹的人、为众生种善根、为人类求和平、做出了好的榜样。他作为佛门居士最后修炼成功亦即主要表现在这里，这也可算是

“功德圆满”。

我最后想说的是：我这个俗家人的这种说法究竟如何？是否恰当？或者只是妄闻“禅关”？则须请文化界以及佛学界名士不吝赐教——须知这也是一种缘分啊！

附言：我先将这篇文章向文史专家陈四益先生请教，蒙他就此提出了一些显然比我高明的好意见，现一并将其意见附在下面，供读者思考。

2005年3月10日

附：陈四益关于佛教问题 回复吴江的信

吴江先生：

所赐大文已经拜读。皈依佛、逃禅，是古已有之的事情。今天如何看待这样的事，实在是一个大问题。过去有点简单化，其实中间有很多复杂的情况。

为世间苦难太多，因而祈佛，是较普遍的一种，于平民中为多。无子的求子，无财的求财，无功名的求功名，不平安的求平安，此生无望的求来生。总之，希望借佛的力量来达到人力无望达到的目标。这类人，即我们所谓的迷信。这中间还应当包括一些作恶多端的人，因为自知作孽甚多，希望祈福消灾。

在知识阶层中，情况也有不同。

原本入世，有致君尧舜、治国平天下抱负的人，在政治圈中翻了几个筋头，最后失败了，也会从治天下跳往“了自身”。这是中国读书人常有的两条

路——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中国自身文化中，儒道两家的人生哲学也是各执一端。佛教传入后，先是与道家思想通融，后又与儒家思想通融。

在民族矛盾或阶级矛盾激化的情况下，逃禅也可以成为保持气节的一个地步。清初明末遗民的逃禅，很具有代表性。陈援庵先生《明末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有详尽的论述。

佛学还成为改革者借用的思想武器。一个“无常”、一个“平等”，恐怕是近代不少改革者热衷佛学的一个重要因素。龚自珍、梁启超、章太炎等，大概都有这个因素。章太炎曾以大乘佛法诠释《齐物论》，以为“齐物者一往平等之谈。详其实意，非独等视有情，无所优劣，盖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乃合齐物之义。”他认为齐物的思想与华严、法相之旨，吻合无间，可见是看重它的“平等”观。他还说，今天要用华严、法相二宗改良旧法。怎么改良？他讲，一个是“普度众生”，认为佛家主张“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于人，在道德上最为有益。”这是要破利己。另外，“佛教最恨君权。”大乘戒律说，国王暴虐，菩萨有权，应当废黜。又说，杀了一人，能救众生，这就是菩萨行。这是要破专制。

无常，即为实行变革张本；平等，正为推翻君权立论。不仅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在鼓吹变法革新时都借用过佛学理论。此事苏渊雷先生

《论近代我国佛学研究的主要倾向》有较详论述。

所以，佛教并不一定只是迎合消极的人生观，它也可以引出革命性的结论。就像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并不只是为现存秩序辩护一样。

现代逃禅的少了，我想主要是禅也无可逃。朴初先生是官方允许他做宗教工作才稳当居士的。如果不是这样，其他人不要说当居士，读几卷佛经在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的时代也是一大罪状，弄不好就被整得呜呼哀哉。苏渊雷先生是华东师大教授，他于佛学素有研究，但亮出居士的名头，是在文革结束之后。现在“居士”已经不少，不过情况也大有别。连和尚现在也有玩政治的、化缘弄钱的，真正于佛学有心得的不多。居士更无论矣。

先生以为佛学修炼有益于人性的完美，甚是。但老庄、墨家、儒家学说何尝没有这样的作用？问题是人到这些学说中，要寻找什么。善寻者得其正，不善学者得其邪。至于宗教的位置，只要科学不能穷尽一切未知领域，就有宗教的余地。而人类确实永远无法穷尽，因此，说一万年以后也不会消灭宗教，大概是不会错的。

对佛学我素无研究，上面这些话，不过是先生责我发表意见，所以写下了这些半是转述、半是臆测的读后感。无根之谈，见笑于长者，也不会觉得难为情了。

四益顿首

2005.3.24

（责任编辑 杜晋）

毛泽东总结一生的谈话

● 于光远

我在2003年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下》看到如下的记载：

1975年10月1日国庆二十六周年到来时，那天上午，毛泽东没有看书，也没有睡觉，独自靠在床头上，静静地想着。突然，他自言自语道：“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最后一个‘十一’了。”他随即转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平静地问：“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个‘十一’了吧？”工作人员说：“怎么会呢？主席，您可别这么想。”毛泽东认真地说：“怎么不会呢？哪有不死的人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泽东岂能例外？‘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

1976年初农历除夕之夜是毛泽东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张玉凤回忆道：

“毛主席这里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

“他在这天，依然像往常一样在病榻上侧卧着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这就是伟大领袖的最后一次年夜饭。”

饭后，我们把他搀扶下床，送到客厅。他坐下后头靠在沙发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入夜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的鞭炮声，他看看日夜陪伴他的几个工作人员。远处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就这样，我通知了正在值班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准备好了几挂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会儿。此刻的毛主席听着这爆竹声，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们都明白，主席的这丝笑容，是在宽慰我们这些陪伴他的工作人员。”

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喜欢怀念往事，常谈起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事情，愿意看这方面内容的电影。一次，银幕上伴随着高昂雄壮的乐曲，出现人民解放军整队进入刚攻克的某城市、受到市民们热烈欢迎的场面。渐渐地，毛泽东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先是阵阵抽泣，随即失声大哭，工作人员只得将他搀扶退场。有时，他还要来一些旧照片反复看。据工作人员回忆，对两张旧照片，毛泽东看得津津有味：一张是他穿着打补丁的裤子在延安给一二〇师干

部作报告（1942年），另一张是他骑马行军于转战陕北途中（1947年）。

从这年5月起，毛泽东的病情不断加重，身体极度衰弱。6月初，他突患心肌梗塞，经过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这一年，毛泽东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又一次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

“人生七十岁古来稀，我八十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关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谈话，我曾经得到过一个关于这个谈话的两页的材料，我完全记不起来是怎样得到这个谈话的，又没有看到书面的来源，它的真伪我没有把握。现在我看到了新出版的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逢先知、副主任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最后一节“临终的日子”，其中根据张玉凤的一篇文章，把这件事情写得很清楚，我看是真的，是他的政治遗嘱。讲了他的一生，也讲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毛泽东同志这番话，充分表现出他的复杂心态。他把“文化大革命”列为自己一生当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对毛泽东同志这个说法，我以为“显然是不适当的，也不符合实际”。但是我以为是准确的。《毛泽东传》说“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多么重。明知对这场‘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而他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怎么交这个班？”我个人觉得他没有如《毛泽东传》所写“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安”，而是对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情的观点至死不变。

这年6月下旬，也就是毛泽东这次谈话之后不久，毛泽东同华国锋谈话时，写下“国内问题要注意”几个字。这

是他生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国内问题”指的是什么呢？他没有具体说明。

“四人帮”抓住这句话大做文章。1976年7月间，王洪文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称：毛主席最近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我看国内问题还是要批邓。全国运动有几种情况，一种搞得好的，一种比较一般，还有一种是问题比较多的。这后面两种，占全国多数，都需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特别是第三种不解决不行。国务院有些部，军委有些部门，

也是这样。解决的办法要像有的部已经做的那样把主要领导干部换掉。对王洪文的这种“解释”，毛泽东同志没有作任何答复。

1976年7月6日，毛泽东同志又一位老战友、德高望重的朱德在北京逝世。江青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追悼会，我在远处看见她。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江青。过去还算好看的江青，现在是一个丑八怪了。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	满 妹	39.00	7.00
胡耀邦传	张黎群等	50.00	7.00
改变那个世纪的人和事丛书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	50.40	7.00
——梁漱溟与毛泽东	汪东林		
——亲历一九五七	徐铸成		
李宗仁回忆录(上下册)	李宗仁口述 唐德刚撰写	68.00	8.00
周恩来的晚年岁月	刘武生	38.00	6.00
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	马立诚	36.00	7.00
斗室中的天下	资中筠	30.00	6.00
《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	徐庆全	48.00	7.00
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	中共党史出版社	285.00	20.00
红墙大事——共和国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上下)	张树德	69.80	8.00
文化大革命简史	金春明	28.00	6.00
走进怀仁堂(上下)	董保存	55.00	7.00
林彪的这一生	少 华 游 胡	28.00	6.00
国事忆述	陈锦华	48.00	7.00
从陈独秀到毛泽东	冯建辉	22.00	6.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 锐	18.00	6.00
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	杜润生	35.00	7.00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熊向晖	29.00	6.00
陈独秀风雨人生	朱 洪	28.00	6.00
梁漱溟问答录	汪东林	25.00	6.00
刘少奇蒙难始末	图 们 祝东力	17.00	5.00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	邓 野	29.80	6.00
农业学大寨始末	宋连生	28.00	6.00
工业学大庆始末	宋连生	30.00	6.00
周扬与冯雪峰	徐庆全	28.00	6.00
走出个人崇拜——一个年代的反思	冯建辉	16.50	5.00
25年——1978—2002 中国大陆			
四分之一世纪巨变的民间观察	王 安	26.80	6.00
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江 涛	40.00	7.00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	宋 波	40.00	7.00
侵华日军主要将帅的最后结局	朱晓艳 班惠英	40.00	7.00
党史札记(一集)	龚育之	28.00	6.00
党史札记(二集)	龚育之	35.00	7.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	35.00	7.00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
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
代购、代邮服务。

《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 本书是作者在2003年出版的《文坛拨乱反正实录》的姊妹篇。《文坛拨乱反正实录》是从政治意义上勾勒新时期文坛回春的脉络，而本书则从史料的角度，以“纪事本末”的体例，梳理新时期文坛拨乱反正过程中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诸如“四次文代会报告起草过程”、“苦恋风波”等的来龙去脉，解密了诸多早春文坛档案，是一部当代文坛的史料著作。

《李宗仁回忆录》(上、下) 我国变乱百余年，民穷财尽，今日差得此和平建设的机会，我们断不应再使内乱出现于中国。至愿红色政权好自为之，毋蹈吾人昔日的覆辙。我个人戎马半生，雅不愿再见铜驼于荆棘中也。
——李宗仁

《周恩来的晚年岁月》 作者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兼周恩来研究组组长，系统地阅读过大量档案材料，访问有关人士，发表过不少研究成果。本书将“文革”时期周恩来为尽量减少“文革”所造成的损失、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的史实展现给读者，有助于读者对这段复杂历史和周恩来这位人民总理的理解。

《红墙大事》 作者从事党史和军史研究近20年，接触了许多当年的档案文献及当事人，本书记述了共和国历史上许多鲜为人知的重大事件的酝酿、争论和展开；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制定和实行。以史实为准绳，以文献为依据，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向读者真实地展示了那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现代中国民主观念误区之我见

应克复

在实现民主过程中,我们还面临着某些思想迷雾,陷于某些认识上的困惑。这些迷雾与困惑,多少年来都影响着中国民主政治的顺利推进。

一曰民主的阶级性

民主是有阶级性的。世界上没有抽象的民主,只有具体的民主:或者是资产阶级民主,或者是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是在否定资产阶级民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型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

此论以民主的阶级性否定了资产阶级民主,为所谓“无产阶级民主”进步性、合理性提供了神圣的理论依据。

这一理论误区导致中国在民主的认识和实践走过了很长的弯路,或者说,它使中国的民主建设陷于长期的停顿状态。

最早陷入这一误区的大概就是陈独秀了。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以倡导民主与科学成为思想界领袖。1919年1月他疾呼,只有德(democracy)和赛(science)“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治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并誓言,即使为之“断头流血,都不推辞”。1919年12月他还说,“我们现在要实行民治主义(democracy),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可是,到了1920年9月就改口说,德谟克拉西“是资产阶级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两个月后在《共产党》月刊创刊号上他号召:“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建设劳动者的国家。”

陈独秀这一重要的思想转变的导因是十月革命后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使他完全否定了他自己原来对民主的主张。

但是,最早从“民主阶级性”的认识误区中走出来的,可能也是陈独秀。

他在1940年9月《给西流的信》中写道:“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如果说无级民主与资级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内容”。11月在《我的根本意见》中进一步写道:“‘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陈独秀已省悟到,将民主区分为两种互相对立的类型,抬高一个,否定一个是错误的。可惜此时陈独秀已不是五四时期叱咤风云的陈独秀。他贫病衰老,偏处江津小城,又拖着“托派”的身份,只有他的老朋友胡适才加以重视,予以刊布,高度评价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稀有的重要文献”,他说:“在‘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这十三个字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制度的生死关头。”

这样的重要文献在1949年之后一直尘封,主旋律是大力张扬民主的阶级性,至少我们这一代人在这种教育下,对民主的阶级性一直深信不疑。大概又经过了一个甲子年,中国的思想界才有人对民主的阶级性提出

质疑。

李慎之经过“反右”、“文革”，“才慢慢体会到原来实质民主必须有形式民主作保证，两者只要真干而不是假干，就不应该、也不可能有任何差别”。他还说：“前两年（1999——引者注）读了陈独秀在1942年逝世前的言论，我更恍然大悟，根本没有什么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不同，也没有什么旧民主与新民主的不同，民主就是民主。”

现在我们发现，最早否定民主阶级性的应当是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他在1918年生命弥留之际口授了“政治遗嘱”，也简单地说到这个问题：“民主即人民的权力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的，也不可能无产阶级的，因为资产阶级也好，无产阶级也好，只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且远非是一大部分。”“资产阶级民主，即使是打了折扣的，毕竟仍然是民主。”他谴责“不受任何限制的阶级恐怖”却标榜为“无产阶级民主”。

二曰民主不能照搬

照搬不照搬，这是一百多年争论不休的老问题了。不过，过去不叫“照搬”，叫“全盘西化”，意思差不多。

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西方文明的亮点（核心）是民主：启蒙时代以来的民主理论与近代以来的民主制度。

学习西方民主，现在谁也不表示反对。问题是“不能照搬”。

“不能照搬”是对的。某一国家的制度模式不能照搬，也没法照搬。比如，能将美国的一套政治制度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吗？不能。或能将英国的一套政治制度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吗？也不能。可是，谁主张过这种生搬硬套式地学习西方民主呢？没有，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因此，这种“照搬”说，是无的放矢。

那么，西方的民主制度能不能照搬呢？

西方民主制度是指西方各国不同的民主制模式（如英国是议会制，美国是总统制，法国是半总统半议会制，瑞士是委员制）中所实施的共同制度，主要有选举制、议会制等。也就是，民主的不同模式中有共同的制度框架，即异中有同：异是各自形式，同是共同规则。

不能照搬的应当是各自形式。但是，如果对共同规则即共同的制度框架也言称照搬，就要分析了。因为，对制度框架，用“照搬”一词不确切，应当说是学习、借鉴。照搬也是学习的一种方式，但那是一种低级的、简单的学习方式，是模仿、移植、引进。对于物质生产中的科学技术可以采用这种方式，制度就不行。学习、借鉴外国制度，有一个两种制度对接的问题。要将外国的制度移植到中国，就要对中国原有的制度弊端进行一番改造，抛弃制度中不适时宜的成分，添加符合民主原则的制度基因，如果基于对原有制度采取革新态度的学习与引进，也称之为“照搬”，也要反对，那只能说是拒绝借鉴西方民主制度了。

比如，民主就要进行选举。选举本身是一门学问，其中包括经验的积累，还有民众的习惯，在实践中需要摸索试验，不断完善。你不能把针对选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的改进意见斥之为“照搬”；将之斥为“照搬”，不就是拒绝民主吗？

现代民主制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是看你是否选举制、议会制等基本制度。这些制度我们都有，但对照民主原则相去还远。改革迫在眉睫。改革，谁都在吆喝。真要改掉这些制度中的非民主成分，又遭“照搬”的责难，“反对照搬”又成了阻止改革的挡箭牌了。

反对照搬的一个王牌理由，是“国情特殊”论。

我最近读到延安时代就成名的马克思主义权威艾思奇的一段文字，可以回答“国情特殊”论。

他说：“近代中国的一切反动思想，都有着一个特殊的传统，如果要给它取一个名字，那也许可以叫做思想上的闭关自守主义……不管它的外表形式怎样千变万化，它的基本内容不外是这样的：强调中国的‘国情’，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抹杀人类历史上的一般规律，认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只能依循着中国自己特殊的规律，中国只能走自己的道路。”艾思奇还指出，这种不断翻新的“国情论”，是近代以来中国守旧派与顽固派“所应用着的根本思想武器”，其目的“在于保存这种旧的国情”。

百余年来，中国国情一直变动不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不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情更有大变。搞现代化，建设小康社会，融入全球化，无不在深刻改变着中国国情。对改革者来说，重要的是改革国情。不是不应有国情意识，而是不应以国情为借口，堵塞改革者的口，捆绑改革者的手脚，拖延中国民主化的进程。

三曰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

这是对民主的误导。

民主有这么一条原则：多数决定；但不可能简单地理解为“少数服从多数”。两者有原则区别，不能混同。

“少数服从多数”与“多数决定”两者都有按多数意愿行事的意思，似乎类同，原则区别在哪里呢？

关键是在少数与多数的关系上，两者是截然不同的。

“多数决定”是，在有关国家（或共同体）公共生活的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按多数人意愿行事，但并不要求少数跟在多数后面，去迎合多数。作为少数，不但可以不服从多数，而且可以与多数唱反调，反对多数。这是少数的权利。中国的“左”祸年代，这种少数的权利是受到蔑视的。敢于行使这种权利的人，往往会遭到迫害，顷刻间大祸临头，因此，每逢党内和国家事务中的重大决定，往往出现“一致通过”的团结盛况。这称之为“少数屈从多数”恐怕更为合适。“多数决定”意味着对于重大国务决策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与选择，其中少数者不会因与多数意见不同而惶恐不安；他们处之泰然，他们无所顾忌地表述自己的意见，他们的这一行为是正当的，权利是神圣的。当然，在决定通过后，每个公民，无论少数、多数都必须遵行，但并不意味着，少数就此应当放弃自己的意见；他们仍可以坚持自己的意见，还可以自由地宣传自己的意见，这是民主制的一项重要原则，保护少数。保护少数不仅仅是保护少数人的权利，而是也为着维护共同体全体公民的利益（至少是一部分公民的利益不致受到湮没）。因为多数的决定并不一定正确，而真理往往首先为少数人所发现。所以，民主制下的自由与宽容，保护少数异见，不失为使人类少犯错误的一种理性方法。由此可见，保护少数的原则其意义并不亚于多数决定，在某种情况下，甚至比多数的决定更为重要。

“少数服从多数”，要点在“服从”。在这一潜在思维驱使下，少数的权利无形中受到约束与侵犯：他们不

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更不要说与强势的多数进行争辩了；他们不敢行使反对权；他们只能违心地附和多数。加之，在强调团结一致、集中统一的政治氛围下，在有关党和国家重大决策时，“一边倒”、“一致通过”是不可抗拒的潮流。这种奇特景观在民主制下生活的人是不可思议的。从理论上讲，当少数意见被否定之后，他们仍可“保留”自己的意见；而面临的现实是有形与无形的压力、甚至冷遇、歧视，记录在案，秋后算账……如果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他们便是批判的靶子，管你是将军，还是共和国的主席。

这种无视甚至践踏少数人权利的现象，被西方政治思想家称为多数人的暴政（如托克维尔），多数对少数的思想暴力（如柏林）。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专政，希特勒的法西斯专政，都上演过这种血腥暴政，至于思想暴力更是习以为常了。所以，要求全体服从的民主往往无民主可言。

从概念上看，民主集中制缺乏严谨的科学性，逻辑矛盾不难发现。民主本身包含了集中，除了无政府状态的大民主没有集中的结果，有秩序、有规则的民主，最后必然产生集中。因此，称为民主制就可，再加上集中，是同义重复，画蛇添足了。

不过，我们应当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民主集中制，看待这一制度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一制度是列宁创建俄国共产党提出的组织原则。1903年，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上最初提出的是“集中制”。在接受了卢森堡批评之后，1904年列宁将之修改为“民主集中制”。之所以强调“集中”，是为了适应当时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中国共产党也是在敌强我弱与列宁相处大致相同的历史环境下从事革命斗争的，加之又从属于第三国际，因而同样地将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组织原则。这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历史环境和条件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为了适应新的历史状况，党的这个组织原则我认为同样需要与时俱进，将民主集中制改进为民主制，以承担起更艰巨的领导责任。

（责任编辑 吴 思）

（上接 76 页）而谁也无法垄断历史。任何个人的权和势都是暂时的，相对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历史是什么？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实。事实是最有力量的，它最后总要顽强地按本来面目表现自己，所以，时间老人是公平的，历史是公正的。使它们公正的

力量是人民群众。相比任何个人来说，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永恒的，无限的。

不相信“历史是人民写的”的人，醒醒吧！不要给自己找麻烦，更不要给自己的子孙制造心灵上的痛苦。

这是一种很高的觉悟。（责任编辑 吴 思）

在1966-197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按国家宪法选出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没有通过任何法律手续,一下子就被莫须有的罪名打倒和整死了。他在去世以前,丢下一句铿锵有力的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当时,他的这句话当然不能公开,但是,是有知道的人的。这些知道的人中,当时都没有把这句话当回事,钦定的案子还能翻得了吗?不可能。中共中央还作了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大家是举了手的,中央的决议还能不算数?这么一件看上去铁板钉钉的事,到了中共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案子平反了。以后,刘少奇的纪念铜像在他的家乡立起来了,北京还举办了《刘少奇光辉业绩展览》,展览共分四个部分,第四部分的栏题就是“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刘少奇的这句话将成为一句历史性的名言,传下去。

有些有权有势的人眼里是没有人民群众的,他们从来不相信“得罪了人民群众会历史上过不去”这个简单的道理。他们坚信历史是一团泥,是可以由自己随便捏的。这种人忙于让人为自己写文章、出书、拍电影,把自己化妆打扮得好好上加好,一贯正确,以为这就能够流芳千古。

还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在太行山里采访。一位县委书记指着他书架上的三本书对我说:“我把几年的工作都印了书,白纸黑字,看他们以后怎么能否定我?”我翻了翻,没发现里头有一篇他工作失误和作风不正的检讨。实在遗憾得很,生活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我走了没几个月,他的事发了,下台了,他工作中的错误和道德品质上的缺陷都抖搂了出来。那三本书不仅没能救得了他,反而成为他不能实事求是对待自己的一个笑柄。由于私心太重,他做了一件大蠢事。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1991年解体为俄罗斯、乌克兰等15个国家)的领袖斯大林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是历史是无情的,儿戏不得。一本苏联共产党史(过去简称“联共党史”),是斯大林执政时出版的,当时被认为是一本“千真万确”的历史书。这本历史书里,斯大林一贯正确,好得不能再好。但是,斯

谁也无法垄断历史

冯东书

大林死了,历史就开始逐步恢复原来的面貌了。那本联共党史就再也拿不出手,连改都没法改。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还有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因为在下面向群众做了调查研究,提出了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让”不合时宜的正确意见,便被打倒了。后来彭德怀、张闻天还被整死了。打倒他们,当时也是有党中央的决议的,看上去也是铁板钉钉的。但是1978年末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李锐同志把自己在庐山会议上亲身经历的笔记整理成《庐山会议实录》。它一出版,原来看上去很铁的决议,就铁不起来了。彭德怀的高大纪念铜像现今也在家乡立起来。北京也开了纪念他的座谈会,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号召大家“学习他实事求是,光明磊落,无私无畏,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北京郊区的一个特级监狱,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关押过中共中央高级领导彭真、彭德怀、贺龙、黄克诚、陆定一、谭政、罗瑞卿、万里、刘仁、林枫、陈再道及邓洁等一批高级干部。当时条件下的专案组在审讯中做了许多坏事,还用了许多刑法。当时决策干这种事的人,

都以为别人永远也不会知道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他们定的纪律是十分严厉的,他们自以为选的办案人、管理干部是绝对可靠的。但是,就是那里警卫部队里的一位指导员,他实在看不下去,良心使他把看到的事都冒险记了下来,后来出了一本《特监轶事》,把丑恶都抖了出来。这种事一再发生,有人以为是做得不够机密,假如当时把李锐整死,不就没有后来的《庐山会议实录》了吗?自然,整死一个李锐是很容易的,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不就被整死了吗?但是,天下的事没有那么简单,你整死了这个李锐,还会有另一个张锐、王锐挺身而出。现在街上不是又卖着一些类似《庐山会议实录》的书吗?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是除了官方史书,还有许多非官方的史书吗?不然,古时官方史书里不记的事,我们现代人是怎么知道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天下没有永恒的权力,没有无限的权力,因(下转75页)

中央与地方： 郡县制和西方政体

● 尹振环

毛泽东说：“斯大林严重破坏法制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文选》293页）这不仅是因为郡县制（或“秦家店”、“秦政制”、“秦政”）的国家政体与西方不同，而且地方政体也与西方不同。所以我们需要关注郡县制的地方政体，与近现代形成日、美、英、法诸国地方政体作点粗略比较，看看有哪些不同，哪些相同。

一、权力来源不同

郡县制下，省主要官员以及省以下地方主要官吏皆由皇帝特旨任命。明清时，省内道府以下官员虽可由督抚保奏参劾，但任免大权均由皇帝恩准。四品以下授官时，由各部带领引见，表示为中央任命，权力来自帝王。在西方联邦制的国家，如美国、德意志联邦、瑞士、澳大利亚，他们的理论是地方政府权力来自公民，中央政府权力来自地方。如美国，照他们的说法，美国联邦中央的权力是各州让予的（《独立宣言》说：十三个过去英属殖民地“州”，各为“自由独立之邦”），而不是相反。美国宪法生效后各州地位才发生变化。但州之主要官员，不是由中央任命或内定的，州长、副州长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或选举选举人产生），任期四年。其他如秘书处、检察长、财政厅长、审计长，或由选民选举，或由州议会与州长任命。州以下政府受州控制。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二战以前，府县是国家代理人，知事是作为国家代表而存在的。而其下面的市、町、村的政权与议会，是作为反映地方意志的代表而存在，有一定自治权。随着二战的扩大，知事的权力完全支配了地方。战后日本府、县成为中间团体。日本宪法第八章地方自治，

核心是知事公选化，成为地区强有力的代言人。在西方单一制国家，如英、法、意大利等国，他们的理论是中央政府权力来自公民，地方权力来自中央。尽管如此，也不是由中央包办地方政府的组成，如英国地方政府，由地方议会任命各种委员会组成，任期四年，地方议会议员也是任期四年，每年改选三分之一，四年全部改选。这些国家的地方议会，是地方政策的最终决定者，这一点是相通的。法国则不同，它长期以来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省政府主要官员由中央任命（但他们又是执行地方意志的官员）。同时中央各部还向各省派驻代表，设机构，监督控制省的工作。只有省市议会由选举产生。之所以法国几次由共和变帝国、帝制复辟，看来都利用了这种政体。之所以法国1875年终于战胜王权，帝制没有再度复辟，那是因为中央政府已受制于议会、法制及新闻媒介。美国的州与其下面的市、县，也不完全是隶属关系，也有不同程度的自治。1875年密苏里州通过的州宪法第九款规定，较大城市可以制定关于他们地方政府的自己宪章，其他州不同程度上也作了效法。

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同

郡县制下，在中央是集权，控制、防范、监督；而地方政府是作为中央派出机关而存在的，所以必须唯命是听，绝对服从，一般说，地方政府并不代表地方的特殊利益。如宋代地方最高行政机关为“路”，路下为州、县。路以“安抚使”为长官，主军政；又设“转运使”，主财赋、治安、监察；设“提点刑狱”，掌司法；设“提举常平使”，主赈灾和盐铁专卖。这四个官都是中央派到地方来监督与指挥地方军、政、财、刑的，他们互不统属，互相监督，

直接对皇帝负责。就这样,还不放心,又于各州府设置了“事得专达”皇帝的“通判官”,以监督知州、府尹。其总的目的是为了防范地方集权,形成割据势力。“省”原来是中央的御内侍机关,元代之所以将地方最高行政机构称之为“行省”,意指行动中的中央机关。清代省与中央的关系可概括如下:(1)皇帝诏旨可以不经任何曲折,直达地方,必须不折不扣执行;(2)一省岁入之款,报明候部拨,地方不得专擅;(3)督抚大员只能决定徒刑以下案件,流刑以上皆须送中央决定;(4)省、府、县考试,地方官只能充提调监临,主其事者仍为皇帝钦派之学政;(5)通过八旗驻防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严密军事统治网,凡要隘城市皆开军府,派将军拥兵驻守,既可随时镇压人民反抗,也起牵制地方官员的作用。

西方近现代,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建立在共同遵守宪法及法律基础上的。通过宪法,将铸造货币权、建军权、宣战权收归中央,使地方不可能形成“国中国”,在这个基础上,地方享有充分自治权。战后的日本,在美国等占领军占领下,进行了“占领改革”。其地方自治,是在中央集权下实行的。其都道府县市町村及特别区,都是各自独立的自治体,不存在上下级和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1947年4月,日本通过的《地方自治法》,对中央和地方各自的行政范围有明确的区分。在美国,联邦与各州的权限划分是由宪法及有关法案明确规定的:双方应具有哪些权力;禁止中央、禁止各州使用哪些权力;双方共同行使哪些权力,都具体一一列举规定;“凡宪法所未授予联邦,或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皆由各州或人民保留(宪法)”;在宪法规定范围内,中央和州,独立行使职权,互不侵犯;关于双方的权力关系需要变更,则必须修改宪法;如果双方发生权限之争,则由最高法院裁决。另外,监督州以下的各级政府,是州政府的专有权力,一般来说联邦政府无权干涉州以下地方政府的的活动;而州对地方各级政府,只行使监督权,而不能行使直接管辖权。英国这个自治传统悠久的国家,也有对地方的监督控制,除了中央设立专门的机构进行此项工作外,各部也管理各地有关事务,而控制地方的主要手段是:财政拨款、行政监督、立法审查。但这种控制监督具有双向性:地方通过选举、公民投票、新闻媒介制约中央。

三、职能之侧重各异

古今中外地方政府的职能都具有双重性,即社会职能与阶级职能。孟子说:“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参预),吾何以助。”说明远古时,政府以社会经济职能为主。郡县制后,随着阶级对立的加深,政府已以阶级统治与剥削职能为主了。从秦汉之郡守,到清之总督、巡抚,其主要职能可综为五:(1)布宣德意,抚安齐民,劝民农桑;(2)综治文武,修民政刑;(3)察举官吏,监督地方;(4)进贤劝功,举孝廉;(5)兴学、掌教育。所谓“德意”、教育,所谓进贤劝功,“举孝廉”,不过是进行皇恩浩荡,三纲五常的思想统治和网罗封建统治人才。具体之职能也可概括为:(1)布施教化;(2)劝课农桑(财政之源,政权稳定之基);(3)赋役钱谷;(4)决讼断狱;(5)除奸防盗。而县以下的基层政权的统治、控制、剥削、催税、催差役、连坐的职能就更露骨,从商鞅的什伍连坐,到王安石变法县下设都保,宋南渡后保下设甲,其任务都是“联比民户、以机保伍”,互为监保,严密控制,以寄兵政。甚至到了民国,孙中山先生倡导“自治”,并未付诸实施,到了蒋介石,与古代也形似神同。总之郡县制的地方政府是以压迫与剥削、政治与思想为主,它不过是触角遍及各个角落的统治网。

一般说来,单一制国家也好,联邦制国家也好,地方政府职能实际上具有双重性,即执行职能和领导职能。前者指执行中央政府统一的政令、政策,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和指导;后者指地方政府对所辖区域,进行管理和领导,促进地方事业的健康发展,保护地方的特殊利益。郡县制下,地方政府只能以执行职能为主,甚至只能有执行职能。把它看成统治阶级的工具、镇压的机器、彻底体现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的意志,是恰如其分的。

西方近现代地方政府职能逐渐以执行社会职能为主,其阶级剥削与镇压职能是通过实行社会职能实现的。地方政府代表和维护其地方性、特殊性。美国州政府的主要职能:(1)公共卫生;(2)公共福利;(3)公共安全;(4)建筑、维护、管理公共工程;(5)管理农业、保护自然资源;(6)管理私营企业;(7)管理电报、电话、供水、电气、铁路、航运等公共事

业;(8)管理专门职业;(9)解决劳资纠纷,等。市政府除了上述职能,还有饮水供应、消防、娱乐职能。其他县、乡、镇和特区政府,职能比较简单、特殊,大多为本地区服务性的职能。特别行政区因其特区性质而定,如学校区以管理学校为主、卫生区则主要是处理垃圾等等,同时也进行广泛性的社会服务,如保护自然资源、供水、防火、公墓、住房、城市更新、污水处理等等。在日本,把地方行政范围分为“国有事务”与“委任事务”,前者如市政建设、公共设施、市场、住房、公园、治安等等;后者则是中央政府交给地方政府经办的事,如失业对策、国土综合开发、户籍管理、国会议员选举、征税等等。在英国,地方各级政府的职权与管理事务各有侧重:郡级主管教育、社会福利事业及社会治安;区级则主管住房及环境保护、文体体育等事宜;市郊区级与乡村级则主管保养公路、公共运输及有关乡村事宜。这些说明,西方地方政府的职能侧重点大不同于郡县制。

四、地方政权组织的异同

郡县制的政权组织形式呆板、缺乏西方地方政体的灵活伸缩性。

首先,从地方层级看。我国唐以前行郡(州、府)县两级制,而在郡以上设监察区,后来监察区演变为最高一级地方固定行政区,成了三级。宋、元初实行路、府(州……)、县三级制,后来元又派出“行中书省”,作为中央临时派出的机关。但不久行省变成常设固定地方最高行政区,形成四级地方政权。明、清采取省、府、县三级制,明朝因省过大(如山东包括今之山东辽宁、陕西包括今之陕甘宁),因此又产生九十多个道作为监察区;清除了道之外,又将省划小。所以两千多年层级划分无实质变化。英、美、法、日,也是实行三级或两级制,但不搞一刀切:美国罗得岛州,因面积小,不设县;路易斯安那州废除县设教区;许多州随着城市发展,县的数目大减。英国在郡、区政府下,有的设教区、有的则设社区,比较灵活。

其次,郡县制下的隶属关系是固定不变的,单向性的。直接隶属于上一级政府,没有横向隶属关系。西方隶属关系无固定模式,具有双重性、多样性:既隶属于同级(横)立法机关,又隶属于上级

立法机关(纵)。美国纵向隶属关系较弱,横向又是分权制衡制,而不是隶属关系。法国省政府直接受中央政府领导控制,而较少受到地方议会的监督控制。

其三,郡县制的政权组织形式及权力制约形式,由秦至清,大同小异,名称变化繁多,实质变化很少。西方近现代地方政体能适应客观需要,采取多种形式。如美国州,取三权分立制衡式;县则取立法行政合一式(因面积小、无必要三权分立);市则有三种政权组织形式:(1)三权分立的“市长议会制”; (2)立法与行政合一的“市委员会制”,即由市民选举市委员会,开会时履行市议会之职能,散会后各委员又都是各行政部门的首长;(3)“市经理制”。即由选民选举市委员会,作为立法机关,然后由市委员会聘请经专门训练的市政专家为市经理。市委员会对市经理有聘任、监督、罢免权力,市经理对市委员会负责,并有权任命官员及工作人员。由于它有一个统一而高度负责的行政首长;由于市经理非专家莫属;由于它摆脱了行政与立法分权而造成的对峙;由于它不是对选民而是对委员会负责;所以效率高、优点多,不仅美国一两千个市县采用此制,而且许多国家也纷纷效仿。

其四,地方政府区划的出发点不完全相同。在西方,便于管理,便于自治,利于发展经济文化,利于国防,尊重历史传统及民族风俗习惯,符合地理环境……是其地方政府区划的主要出发点。郡县制下固然也不无考虑到上述某些方面,但更重要的是:监察之便与不便;控制之易与不易;能否上下相别、左右相制、内外相雄。唐将州府划为“辅”、“雄”、“望”、“紧”,就是根据州府所处战略地位、自然险恶远近来划分的。宋代将凡是帝王即位前居住、任职过的州,在即位后即升格为府,就是从利于提高皇权出发的。到清代,对于行政区划,煞费苦心,打破根据山川自然形态进行区划的旧制,认为“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湖南湖北为一而洞庭之险失,合浙东浙西为一而钱塘之险失,汉中隶秦、旧州隶楚、又合内江外江为一,而蜀之险失。”(《圣武记》卷十二)因而清代根据不能使某一地区据险以抗中央的原则,调整和增加了省的区划,使之互相牵制。如使陕西一省地跨秦岭南北。徐州本为山东门户,而使之隶属江

苏,武汉岳阳可以互相控制,而使武汉属之湖北,岳阳属之湖南。剑阁汉中本为一完整的自然形势优胜区,而必将剑阁属于四川,汉中属于陕西。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务使地形交错,使一方受制于他方,防止割据,便于控制,并不考虑经济文化交流便与不便。(赵希鼎:《清代各省的政治制度》,《历史研究》1980年第三期)

可见郡县制与西方近现代地方政体,相差整整一个时代——古代与现代。

五、三分自治,七分中央集权,地方可以控告中央

地方自治理论,在世界还是农业时代就已经形成了。今天已经进入到信息瞬息万变的时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日益密切,地方政府能否最大实现自己的利益和主张,取决于与中央的关系。由于各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央和地方相互依存关系更加紧密,20世纪后,中央对州,州对地方,加强了行政管理。上个世纪30年代,自治运动开始消沉,其它限制国家权力的国家,地方自治也日益减弱。所以有所谓“当今是中央政府掌握很大政策主导权的时代”,“三分自治,七分集权”之说。而属于中世纪遗产的郡县制,也应改造。中央与地方不应再是君与臣的关系。该逐步推行普选,使地方官员必须对地方负责,成为地方代言人,他的升迁陟黜,要掌握在地方人民的选票上。而地方大计的最后决策,要掌握在地方议会手中。当然也要对中央负责。

参众两院的质询、弹劾、以及媒体的监督,就有某种地方可以控

告中央的含义。这里说的是地方可以直接控告中央。下面2005年9月7日《参考消息》这则《未能如期制定新节能标准,美能源部被十五州告上法庭》的消息,就是一个实例:

《路透社纽约9月7日电》由纽约州检察长埃利奥特·斯皮策牵头的15个州市今天起诉美国能源部没有制定家用电器能源效率标准。该标准将节约大量的能源。这些州和纽约市说,能源部违反了国会的规定,没有在法律规定的最后期限内为22种电器制定更高的能源节约标准。斯皮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在能源部对7月1日要求它采取行动的通知书不予理睬后,该案件被递交到曼哈顿联邦法院。斯皮策说:“随着石油和天然气价格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以及全球变暖的影响日益明显,联邦政府没有确立重要的能源节约标准,这非常令人失望。”斯皮策和纽约州环保局局长彼得·莱纳说,以2002年的使用量为基础,像冰箱、空调、烤箱这类电器的新能源效率标准能让美国的用电量在25年内减少3%至12%,相当于13座至42座发电厂的发电量。18年前,国会通过法案,要求制定更高的家用电器能源效率标准,并责令能源部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提高标准。

(责任编辑 吴思)

《随笔》2006年第3期目录

雷颐/铁路与政争

——以李鸿章修铁路为例

冯锡刚/郭沫若与章士钊

张鸣/名士王闿运的脾气和疯气

羽戈/杨度的帝王术与宪政梦

宋志坚/嵇康的冤屈

何满子/《艺文谈荟》自序并各辑弁言

朱正/重读《为了忘却的纪念》

章诒和/写给不看戏的人看

——《伶人往事》自序

高信/昨日玫瑰(三题)

鄯烈山/西风残照大寨行

半夏/造反的因由

苏晨/实事求是

朱家泰/让猴子吃香蕉

沈东子/身为中国人的骄傲与困惑

何怀宏/法兰柴思——读铁伊

如箏/从影片中的“金刚”情结说起

张心阳/读克尔恺郭尔哲学寓言

周英杰/从俾斯麦的远见说起

房向东/美国的忏悔文化

苏福忠/杰克·伦敦与超人

何兆武/必然与偶然

——回忆钱宝琮先生的一次谈话

绿原/周绍良片段

黄波/真实与幻影

——朱自清的1948年

闵良臣/汪曾祺喜欢孩子们的“胡编”、“胡闹”

柳士同/束星北与陈寅恪

龚刚/陈寅恪三题

郭济访/参禅悟道说废名

地址: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随笔》杂志

邮编:510075 电话:(020)37606288-510

邮发代号:46-90 欢迎邮购,免收邮费,每册定价6元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好听力 好生活



总 部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甲16号

电话: 010-64074641 64076583

传真: 010-84046652 64055026

邮编: 100009

服务聋人 造福社会

声望全国连锁助听器专业验配机构是西门子听力集团与北京市声之望听觉技术有限公司共同在华设立的专业验配连锁服务机构。本机构以西门子公司为依托, 将世界上最先进的验配、检测及助听器分析设备引进中国, 开创了中国区专业听力连锁服务的先河。

在中国, 听力服务及保健是一个相当年轻的行业。**声望全国连锁助听器专业验配机构**自成立起, 本着“服务聋人, 造福社会”的宗旨, 向国人全面宣传并推广防聋治聋、科学验配的科学知识; 本着“亦商亦善”的服务理念, 与中国的慈善事业结缘同行; 以“搭建学术交流平台, 推进全民听力保健意识”为目标, 进一步提升听力产品的人性化, 服务的中国化。

声望全国连锁助听器专业验配机构已走过了八年的历程, 专业技术日臻成熟, 专业化和人性化的服务, 在中国乃至全球听力行业树立起了“**声望**”, 也使众多弱听人士“**回声有望**”。本机构从事一线验配服务的员工, 与西门子听力集团(中国)本部五百多名在华员工一起, 根据中国市场需求, 设立并完善客户服务、听力培训、市场营销、商务管理、人力资源、技术支持等运行系统, 并在全国开设数百家连锁机构, 实现全国联保, 使西门子听力集团成为在华集生产、销售、服务的一体化企业。



声望全国连锁助听器专业验配机构

网址: <http://www.sw-tl.com>

耀邦与我们共青人

邓拓逝世四十年祭

谁也无法垄断历史

中国社会名流皈依佛教现象

我在西路军的经历

中央与地方：郡县制和西方政体

ISSN 1003-1170



0.5 >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5.80元